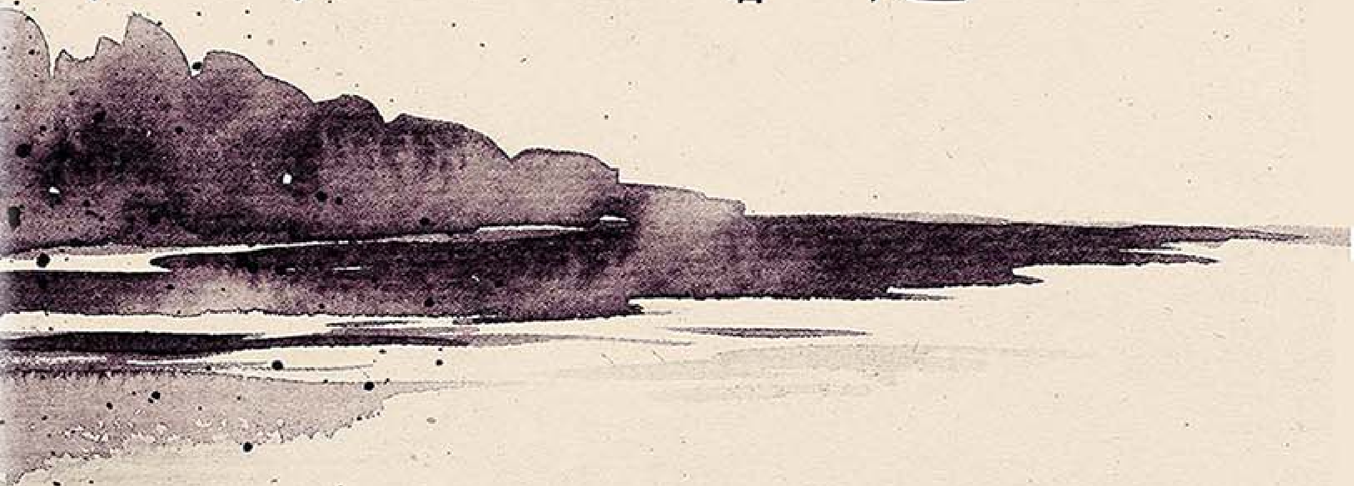
On China's Rise by

River Charles

查尔斯河畔论中国崛起

方晋◎著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查尔斯河畔论中国崛起

作者:方晋

ISBN:978750868178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前言

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有一条查尔斯河，蜿蜒流向大西洋。入海口的两岸分别是坎布里奇和波士顿，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布兰迪斯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等高等学府。河两岸绿树成荫，各种颜色的教堂穹顶隐约其后，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望之心旷神怡，确实是一个思考问题和做研究的好地方。

2016年秋天，我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做访问研究，研究的题目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目前看到的各种答案似乎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许多人仍坚信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我对这个问题关注多年，一直想做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基本的研究思路已经形成，但在相关理论和素材方面还有欠缺。因此，我决定利用这次去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拜访美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他们进行访谈和交流，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访谈对象以研究国际关系、历史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为主。这是因为，崛起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地位的提升，其他国家特别是现行的霸权国——美国如何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此外，西方国家在崛起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政府领导层曾专门就这个问题组织学习。此外，中国崛起的基础仍然是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速不断走低、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和政策取向也需要讨论。

目前，美国也面临着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在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同样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不可避免地给中美

关系以及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我长期研究美国经济，以前也多次到美国访问，但多属于走马观花、盲人摸象。这次赴美访学，特意多走一些地方，包括以前很少去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多体验一下在美国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我在美期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选举结果深具颠覆性。从我与一些美国专家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多数人都以为希拉里将赢得美国大选，这反映出学界精英对美国社会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判断有误。这实际上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近距离观察和了解美国的机会。我把这些观察和体验写下来，整理好对部分学者的访谈，并先后发表在一些媒体和微信公众号上。国内一些朋友读过以后，觉得很有价值，建议我结集出版。我思虑再三，深以为然，于是有了本书的出版。

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关键时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内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外提出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来没有与我们这样靠近。但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一旦应对失当则可能前功尽弃。作为一个从事政策研究的工作者，我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国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我把过去三年在相关领域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重新修订之后一并放进来，从国内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经济之基，供大家批评指正。

这次能够赴美访学并开展研究，首先要感谢我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领导卢迈秘书长和其他同事。基金会的工作很紧张，我离开这半年他们为我分担了很多，而且在国际交流、政策研究和社会实验等工作中取得了新的进展，比如邀请基辛格先生在美国大选之后访华并就中美关系进行交流，在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就婴幼儿营养改善开展大规模政策评估等，我在心怀感激的同时也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此外，还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也称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教授以及他领导的中国项目的教职员工，为我这次访学提供的机会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在此期间，我还有幸结识了许多在哈佛学习和访问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本人获益匪浅。其中一位学者，在本专业领域很有学术见地，我曾向他请教“李约瑟难题”和科技史方面的问题。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专家，却甘愿在哈佛的图书馆当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而且拒绝使用手机，家里也不接互联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让我想起《天龙八部》里的少林寺扫地僧。或许，哈佛还有很多这样深藏不露的“绝世高手”吧。

此正“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次去美国访学的最大收获，就是拜访了许多知名学者，他（她）们学识渊博，耐心细致，和蔼可亲，不仅认真回答了我的问题，还对我的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她）们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德怀特·珀肯斯、埃尔赫南·赫尔普曼、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文安立，历史系教授艾玛·罗斯柴尔德、塔玛尔·赫尔佐格，政府系教授江忆恩，费正清中心教授傅高义，环境系教授迈克尔·迈克尔罗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康奈尔大学教授考希克·巴苏，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遗憾的是，有几位教授的访谈不能对外发表，但我对此表示理解并依然向他们表示感谢！上述14位教授中，有4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4位英国人，2位以色列人，1位加拿大人，1位挪威人，1位中国人，1位印度人。把全世界最好的学者网罗过来，这或许就是美国大学领先世界的原因吧！

最后还要感谢《比较》编辑室的吴素萍女士，“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中央党校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赵磊教授以及《中国经济时报》的吴思立编辑。上述访谈以及访美考察还有我过去三年所写的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开放和崛起的评论文章，大部分都发表在这三个

平台，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帮助和支持。还有《财新》传媒的杜珂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编辑和校对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系统性研究，本人争取在明年完成。届时再请大家不吝赐教。

方晋

2017年8月

论崛起

格雷厄姆·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是理解中美关系的最佳视角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首任院长，国际问题专家，“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著有《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核恐怖主义：可预防的终极灾害》《李光耀：大师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洞见》等书，还担任过多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顾问，两次获得非军事人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美国国防部公共服务特别奖章。在他的领导下，肯尼迪政府学院由一个尚未成熟的小型学术项目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专业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院。本次访谈内容刊登于2016年10月24日“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微信公众号，《环球时报》予以转载。参与交流的还有哈佛大学中国访问学者金三林、王晓明、赵静、范世涛。

问：你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来描述一个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时出现的结构性紧张关系，特别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但是，你真的认为，今天的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已经达到19世纪末德国对英国以及公元前5世纪雅典对斯巴达的威胁程度了吗？毕竟，中美两国在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差距还很大。

答：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最佳视角。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对美国的威胁，与当年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以及雅典对斯巴达的威胁是类似的。当然，中国目前在军事上和技术上还落后于美国。中国的目标是赶超美国，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成功而已。比如说，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在哪里？在中国。如果习近平主席

的想法能够落实，中国在所有的技术领域都将成为世界第一。对此我表示理解，谁不想当第一呢？同样地，中国在军事上没有美国强，不是因为中国不想，也不是因为中国不努力，而是还没有做到而已。

中国人很喜欢说“中国特色”。我不知道中国能否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和他的同事们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学习过大国兴衰的历史。我认为中国可能比西方人更聪明，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历史感，他们会从历史中学习，避免别人犯过的错误。

问：你的研究显示，自1500年以来，在16次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12次最终导致战争。但是，最近的三次案例都没有出现战争。我们是不是可以抱有希望：时代不同了，全球化以及各国经济依存度在上升，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答：是的，时代不同了。你说的案例中，有两次出现在核武器时代。在冷战时期，如果不是因为核武器将导致共同毁灭，很难想象美苏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即使有核武器，美苏两国也好几次差点开战。我写过一本关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书，当时肯尼迪总统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如果真的开战，这又是一个导致战争的案例。

战后德国的重新崛起，真是一个和平崛起的案例。德国接受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使它几乎不可能实现军事崛起。德国现在的军队，只是用于检阅，不是为了打仗。但如果欧盟崩溃——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德国会再度军事化，就可能对邻国产生威胁。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爆发战争，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我认为，中美之间如果开战，双方一定是疯了。人们事后一定会说这简直是发疯，但马后炮很容易。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鼓吹战争，

而是要理解使战争变得更加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问：最近你和尼尔·弗格森教授共同建议，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总统历史学家顾问委员会。这是不是因为美国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不像古老的中国那样认识到历史的价值？问题是，面对同样的历史材料，不同的人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避免曾经的历史错误出现？

答：我们有时候说，美利坚合众国更应该被称为美利坚健忘国（字母缩写同样是USA）。人们对历史没有概念，不知道什么是从哪里来的。而中国人似乎扎根于中国历史之中，这当然与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是相称的。习近平主席非常了解历史，非常喜欢学习历史，这是陆克文说的，他很了解习近平主席。

历史没有唯一答案，它告诉我们事物是复杂的。有时候这样做合适，有时候那样做合适。但通过学习历史，你可以发现前人犯过的错误，这使你没有理由重复相同的错误。你也可以找到历史规律。规律告诉你，当一个新兴大国试图取代守成大国的时候，就会导致紧张，如当年的雅典、德国和今天的中国。所以，今天看到中美关系紧张，你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历史已经告诉你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尽管存在紧张关系，并不是说一定要打仗。

问：特朗普现象在美国政治中的兴起是否意味着美国民众的孤立主义倾向不断加剧？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她会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吗？

答：如果我研究美国国内政治，我会把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支持者放在一起，后者差不多也代表了一半民主党人。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群体，但他们对外交政策的共识大于分歧。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孤立主义者，他们显然对于“愚蠢的对外战争”会持谨慎和保留态度。知名

电视节目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把他们称为广泛反对愚蠢战争、糟糕的贸易协定以及非法移民的民粹主义者。

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准确的评价。我们不应该用传统意义上的孤立主义来看待今天的民粹主义，因为我们不可能大幅度地脱离全球化思维和国际贸易。但在未来，你会看到更少的贸易协定，甚至没有新的贸易协定。很难说这将如何影响外交政策。希拉里的观点很早就形成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未来，任何一位总统想把军队派往世界某个角落去打仗都更难了，除非发生重大事件。不要忘记，美国人民虽然可能会沉睡很久，但一旦被惊醒，所有这一切都会迅速发生改变。“二战”初期，美国公众完全不想参与，尽管罗斯福总统认为应该介入。1940年的时候，国会甚至投票禁止义务征兵制。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的民意一夜之间就全变了。

文安立：中国能和平崛起，但应交好邻国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挪威历史学家，主攻冷战史和东亚史，著有《全球冷战史》《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等。其中，《全球冷战史》荣获多个奖项，《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被英国《卫报》评为2012年最佳历史书。本次访谈内容刊登于2016年10月26日的“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微信公众号，《中国经济时报》予以转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金三林参与了此次访谈，对本文亦有贡献。

问：你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大国权力的转移以及“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相关。有意思的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开头写道，战争是因为斯巴达恐惧雅典的崛起而造成的。但是在书的结尾，他又说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双方都在谈论战争。也就是说，战争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美两国目前的情况和当时相似。在当前的美国大选中，你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的情况很糟，许多国家正在利用美国的弱点，因此我们需要站出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不仅包括经济振兴，也包括军事重建，尽管美国实际上一直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武力的国家。在中国，年轻人抱怨自己的国家被围堵，得不到西方应有的尊重等等。这是我对中国和美国感到担忧的地方，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对抗。

迄今为止，中国在和平崛起上非常了不起。这不是一个疑问，而是一个事实。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将来会怎么做？我认为，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待邻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强硬。我对此感到担忧，因为合作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美国目前正在举行大选，而中国2017年将迎来十九大。中国未来的政策怎么走，特别是在东亚地区政策，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很关键。在全球范围内，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力量。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力量，但在其他领域还不能和美国媲美。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如果能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其中一个国家的关系取得突破，都将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

问：中国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强硬，我个人认为这背后有美国因素。在2010年以前，中国与邻国关系非常好。但自从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中国与邻国开始产生一定的争端。由于中国经济增速远远超过美国，因此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完全没必要在这个时候挑起争端。但美国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不愿意给中国时间。

答：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美国的政策更多的是被动反应式的。尽管奥巴马提出“亚洲再平衡”，但没有多少实质举措。实际上是亚洲的小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担忧，所以请美国来帮忙。2016年春天我花了不少时间访问东亚地区，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在日本、韩国（这可能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了）大幅下降，再往南，越南、菲律宾甚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想与中国合作，他们很想，但民众普遍觉得中国过于强硬。认为美国在背后操纵一切是一种危险的想法。中国需要自己的朋友，不要管美国。日本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但韩国和越南真的愿意与中国合作。

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吗？当然！中国有和平崛起的策略，但需要把这一策略运用在本地区。事实上，区域外的国家也在观察中国在本

地区的表现。2016年春天我去了墨西哥，该国非常愿意与中国加强友好关系，以平衡与美国的关系。但他们说他们正在观望中国怎样对待自己的邻国，因为一旦中国真正地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将预示着中国会怎样对待其他国家。

问： 你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

答： 现在看来将会是希拉里当选。她将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并给予美国在本地区的盟友以更多支持。这显然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困难。但我仍然认为希拉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如果让我说她最像历史上哪个美国总统的话，我会说最像尼克松。她可能会打破过去的传统，采取破冰式的创举。这是我想到的唯一可能对中国有利的一个因素。我建议中国应该早一些主动接触希拉里政府，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不是那些一般性和抽象的问题，比如说朝鲜问题。这可能会起到作用。

问： 中国能从西方崛起的历史中学到什么经验和教训？中国为什么在18世纪晚期衰退，而西方特别是英国进入工业革命？

答： 我或多或少同意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理论。中国没有变化，而是欧洲的一小部分国家发生了变化，实现了快速发展。其背后的原因是廉价能源——煤炭的易得性，这导致利用廉价能源技术的发明和创造的涌现。所以，西方能进入工业革命一定程度上是靠运气。英国就有最便宜的煤炭，这是地理因素，与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没关系。当然，英国有一个能充分利用廉价能源并进行发明创造的社会，这也很重要。

另一个因素是部分欧洲国家从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洲殖民地中获得了好处。这个因素没有本国的创新和发明重要，但如果否认其对西方崛起发挥的作用那就错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携手并进的，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那么，中国这边同期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对于英国的入侵准备得如此不足。我认为是在乾隆统治时期，中国在周边地区卷入太多不必要的争端，如果这些资源能够保留住，当英国人来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中英双方的海军有明显的技术差距。但在陆军方面，1840年的清军和英军是旗鼓相当的。英国人一登陆，他们与精锐清军的对抗就陷入麻烦。可以说，中英双方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组织和技术上，而这种差距在鸦片战争后进一步扩大。

问: 中国在国门被打开后，也想通过工业化追赶西方，但却失败了，与此同时日本却取得成功。我们能不能说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能够鼓励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答: 清朝能否像日本那样快速地改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如果19世纪中叶没有发生太平天国运动，我觉得不能排除清朝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实际上，我对于民间出现的工业化、创新、教育和增长是非常钦佩的。虽然在国家层面出现混乱和失败，但在国家之下，是可以看到巨大的活力和创新力的。比如说，中国在接触到西方现代物理学后的一代人内，就培养出了一批世界级的物理学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迈克尔·迈克尔罗伊：如果特朗普政府退出气候合作，中国怎么办？

迈克尔·迈克尔罗伊（Michael McElroy），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曾任哈佛大学环境中心主任，地球与行星科学系系主任等职，代表作包括《能源和气候：未来愿景》《能源：展望、挑战与机遇》等。本次访谈内容刊登于2016年12月9日的“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问：你认为由于资源约束，人类进步和经济增长有极限吗？

答：在短期内，我不认为有极限，总体上我是一个乐观派。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尽可能合理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我们有可能成功，但也有可能犯错误。我最近写了一本书《能源和气候：未来愿景》，目前正在翻译成中文。我在书中强调的是，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之外，开发可持续能源所面临的机遇。这些机遇是存在的，挑战也有。例如，中国有巨大的风力发电的潜力，但主要集中在中国北部；中国也有丰富的太阳能发电的潜力，但主要在中国的西南部；而电力需求主要在沿海地区，且这两种能源都不稳定。如果不刮风，风电供应就会下降。因此，挑战就在于如何调节其不稳定性并将这些能源有效地传输到终端市场。这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环保问题。否则，中国将继续依赖煤炭，而烧煤不仅造成空气污染，也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何况，中国的煤炭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中国需要实现自身能源和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问：你认为目前能源和资源产品的熊市会持续多久？化石能源长期保持低价将如何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现在的情况是天然气的价格非常低，比煤炭还低，而且更加清洁。如果不考虑气候变化，从煤炭发电转向天然气发电是好事，目前也正在发生。但是，烧天然气虽然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但仍然产生二氧化碳，气候变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天然气价格这么低，对风电投资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美国，自然条件最好的风力发电场实际上比天然气更有竞争力和有利可图。投资天然气的难点是，你需要预测未来天然气的价格和生产成本，而投资风电，所有的成本就是前期的资本投入，因为风是免费的。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天然气还是可再生能源呢？也许我们两者都需要，因为天然气可以是风电和太阳能的补充。

在中国，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大量的页岩气储藏。也许，中国将来会有，但目前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中国提出，2020—2025年实现天然气在一次能源占比提到10%以上。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从俄罗斯和中亚进口大量天然气，以及液化天然气。

如果美国成为一个天然气净出口大国，美国国内的天然气价格将会上涨。目前，美国国内天然气的价格非常低，甚至低于生产天然气的边际成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出口天然气的机会不多。美国可以通过管道向加拿大出口，但加拿大的需求太小。如果向全球出口，美国需要有液化天然气码头，码头目前正在建设中，但还没有建好。如果美国天然气价格上升，再生能源就会变得更有竞争力。

问：如果特朗普实施能源独立政策和退出气候协定，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影响？

答：我认为，他在竞选中提出的很多口号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他说过要重振美国的煤炭行业。但美国煤炭行业的就业人数非常少，只有6万人。他也说过要振兴美国的天然气行业，这和前面说的振兴煤炭行业是直接矛盾的，因为天然气价格比煤炭低。如果不考虑环保因素的话，任何投资者都会选择天然气。因此，他说的话是自相矛盾的。我能理解他为了选举，需要西弗吉尼亚州的选票，煤炭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的承诺是很难兑现的。如果他真的想帮助西弗吉尼亚州那些依赖于煤炭生计的穷人，最好的办法是对这些人的培训和教育进行投入。从联邦预算的角度，对6万人进行补贴是很小的一笔开支。

和十年前相比，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前，我也写了一本关于能源的书，也翻译成中文，当时我关注的是怎样打动美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在当时，能源独立和气候变化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十年前，美国越来越依赖于石油进口，对美国的国际收支也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我们很清楚，美国是从中东、委内瑞拉以及那些不是特别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进口石油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过几次石油禁运事件，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因此，美国人很担心石油进口问题。

现在，情况完全改变。由于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开发，美国如果想能源独立，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美国已经成为石油产品的净出口国，比如美国现在向欧洲出口柴油。

国际市场对原油价格非常敏感。现在，原油价格是每桶45美元，如果开始上涨会出现什么情况？美国会增加原油生产，因为页岩油开采取决于原油价格。过去，原油价格基本上由欧佩克以及美国的需求，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需求所决定。但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对原油需求的减少，以及美国石油生产能力的提高，国际油价上涨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美国有能力生产很多石油。因此，对于今天的美国而

言，能源独立已经不是一个大问题，而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关于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我注意到他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他竞选时期的立场似乎在后退，对于“气候变化是否人为造成”也持更开放的态度。我希望这种变化能持续下去。从积极的方面看，多数美国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曾经对美国各州做过调查，看他们对可再生能源的态度。我们发现，50个州当中，有47个州对可再生能源有鼓励政策。因此，在州的层面，对气候变化的支持是非常广泛的。如果特朗普退出气候协定，这会严重打击美国的信誉，我希望他团队中的理智人士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选择退出。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实际上是美国和中国，这是两个大国，而且做出了重大承诺。如果美国退出，中国也不会退出。美国退出就好比美国对中国说：拯救世界的责任归你了。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问: 如果美国从气候变化的承诺中后退，中国应该怎么做？是否应该做得更多，比如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责任？

答: 我认为，促进全球贸易体系对中美两国都有利。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新政府会怎么做。我希望如果出现政策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边际上，而不是趋势上。对于中国向美国倾销产品、影响美国就业，进而会出现贸易争端，我认为这不是个大问题，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中美两国高层需要对气候变化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美国政府像走马灯一样。特朗普有四年执政期，也许还会有四年，但不可能超过八年。美国总统的权力也受到国会的限制，虽然目前参众两院均由共和党控制，但有不少共和党参议员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非常认真的。

即使我们考虑最坏的可能性，即美国新政府不打算和中国合作，两国的合作仍然会继续。例如，在哈佛全球研究院的支持下，我们开展了专门的中国项目，研究2030年和2050年中国的经济、能源和环境问题。2030年相对好预测一些，而2050年会有各种可能性。这个项目得到哈佛大学以及中国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而这种合作模式完全可以在更高层面上推广。即使美国政府退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除了在国家层面，也有很多国家层面之下的合作。世界上许多城市都携手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因此，国家层面之下的国际合作也是很重要的。

和美国相比，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更加严峻，原因就在于中国更加依赖煤炭。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关掉所有火力发电厂，然后用核能取而代之，这需要时间。中国有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计划，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我和我的同事正在做的，就是帮助中国找到实现上述目标的策略。我们有相关的技术专长，符合中国所需，我们会继续提供帮助。如果美国后退，中国应该量力而行，做得太多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向可再生能源过渡，中国还需要做很多，而且中国也不是唯一有这种需要的国家。比如印度很快就要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虽比中国落后10—15年，但增长很快。

我曾经很荣幸地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服务八年。这是1992年成立的机构，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成员各占一半。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然后我们直接向中国总理汇报。我认为该委员会非常重要，这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极佳途径，可以让中国政府官员听取外国专家的建议，外国专家也可以了解到中国能源和环境领域的重要问题。如果特朗普政府退出气候合作，我强烈建议我们搞一个类似国合会这样的机制，中国方面参加的是政府高层和专家，国外代表不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而且要有来自私营部门、气候变化和学术领域的代表，然后像国合会那样成功地运作。

尼尔·弗格森：民粹主义、西方衰落与中国崛起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英国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主攻世界史、经济史和金融史、英美帝国主义史。代表作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巨人》《世界大战》《货币崛起》《文明》等，最近获得基辛格先生授权撰写《基辛格传》，第一卷已出版。曾于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本次访谈于2016年10月21日刊登于“比较”微信公众号。

问：阿诺德·汤因比曾经说过，当一个文明不能有效应对自身面临的挑战时，该文明就开始衰落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曾经也研究过西方文明的兴起与衰落。你是否认为近期出现的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代表着西方衰落的最新例证？

答：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曾经在西方上升时期也出现过。许多人把今天与20世纪30年代做类比，我认为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我们更应该看19世纪末期，在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类似我们今天看到的民粹主义在大西洋两岸都爆发了。

当时的美国出现了暴力的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国际金融的运动，最终导致美国平民党（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其实在该党成立之前，这场运动就导致旨在限制中国移民的1882年《排华法案》的通

过。当时欧洲的民粹主义者也一样，不过那里有更加强烈的反犹情绪，因为当时普遍把犹太人与大银行挂钩。

因此，在西方上升阶段我们就看到了民粹主义。好消息是，尽管那个时代的民粹主义者在限制移民和自由贸易等方面达到一定目的，但到了20世纪初这一运动基本过气和失败了。我本人预测这次运动轨迹会与上次非常相似：民粹主义会兴盛一段时期，但取得的成果有限，最终会失败。原因很简单：民粹主义的政策主张是错误的。民粹主义政策不管在哪里尝试，一般都会失败。

关于西方文明的衰落，我先后在《巨人》《文明》以及《大退化》三本书中有所涉及。我的基本论断是：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在20世纪达到顶峰，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西方的自杀行为，对欧洲列强来说尤其如此。从某种程度来说，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而且也曾风光无限：它赢得了冷战，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说法，似乎还赢得了历史。

但美国有三大问题。首先，美国并不是按照帝国的框架来设计的。所以，美国越想成为一个帝国，比如在阿富汗、伊拉克有所作为，情况就越糟糕。我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内在矛盾，它有很强大的力量，却缺乏一种可以让它推行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大英帝国当年的资源更少，却更加成功，相比之下，美国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其次，美国在2001年后遇到一个严峻的挑战：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迸发，却无法有效应对。美国到今天都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这看起来是个宗教问题，其实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问题。

再次，我们在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确实看到了制度上的退化。我在《大退化》一书中指出了这样几个方面：公共财政、政府规制、法治和教育。在这些方面，美国的体制显然要比以前差很多，肯定比20世纪80年代要差。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谈论西方的衰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西方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当然，衰落也是相对的。如果中国不是从1978年以来出现奇迹般的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就不会那么突显，即当中国如此成功地实现发展的同时，西方表现出这些问题，所以西方的相对衰落是显而易见的。

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如果我被选为美国总统的话（这当然不可能，因为我没有出生在这里），我至少可以尝试改善公共财政并大幅放松政府管制，我肯定会努力弥补法律体系的缺陷并改善美国的教育状况。我可以通过很多特朗普做不到的方式“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我仍然要应对一个在东亚兴起的强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对手在经济总量上如此接近美国，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管理好同时出现的西方衰落与中国崛起。

问: 在你的研究中，你说过一个“仁慈的帝国”对世界稳定和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它提供了秩序和自由贸易等国际公共产品。当年的大英帝国如此，后来的美国也是如此。你认为未来的中国能否扮演这样的角色？

答: 提出一个帝国可以是仁慈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美国大学的学者们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会愤怒地把双手举起。因为历史上的帝国干过很多坏事，比如暴力、奴隶制，而且帝国往往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我不否认。但我的研究也显示帝国除了这些坏处之外，也有好处，比如某些帝国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使统治者和民众都受益。

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帝国按照表现列表的话，你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和纳粹德国，它们干了很多坏事，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最后甚至把自己也毁灭了，这些属于真正失败的帝国。在另一

个极端，你可以看到那些长期持续地提供公共产品，甚至说是扩散文明的帝国，它们改善了被统治者的生活水平。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都可以归为此类。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帝国，世界将会怎样？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欧洲没有罗马帝国将会怎样？会更好还是更糟？答案显而易见，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罗马帝国的欧洲是多么糟糕，研究显示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个灾难，欧洲因此更加贫穷、更加落后。同样，如果我们想象19世纪的东南亚和西非没有法国的统治、印度没有英国的统治会怎样？显然情况会更差，因为本地的统治者不可能像英法帝国那样对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和教育进行投资。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19世纪帝国的存在使资本可以以较低的利率流向落后国家。因此，我所说的一个“自由的帝国”（liberal empire）可能对世界有利的观点应该是说得通的。

你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已经在这样做了。我认为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非正式的帝国雏形。我两年前去过赞比亚，看到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定居的中国工人和管理者，还有显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和医院。我认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扩张。中国肯定不会称为帝国，因为这种扩张看起来不是遵循一种既定的计划，而是自发投资和移民形成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会重演西方的历史。因为帝国多多少少都是有机形成和发展的，从移民、投资、先进的技术开始，然后变得更加正式，因为在海外的投资必须得到保护。中国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但我可以想象有一天中国会到达这个阶段。同时中国也有一些官方的项目如“一带一路”，其既有经济考量，也有战略意义。再者，中国还建立了像亚投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同样是经济和战略意义并重。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和19世纪的欧洲以及20世纪的美国有相似的地方。区别在于，中国现在的国内体制与当时的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当年法国人把输出西方文明作为使命，而英国人很清楚地要求被统治者最终接受英式法治和议会民主。中国的扩张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其中不包含输出文化的目的，目前的做法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按理说，中国应该输出自己的制度，但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问: 你认为中国的复兴与古代中华文明的遗产有没有关系，正如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复兴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

答: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华文明比任何其他文明都成功。今天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讲同样的语言、拥有共同的文化，中国从一个帝国演化成一个民族国家，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力量。尽管中国经历了多次内外部的攻击，中华文明仍然能持久和存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讲英语的人在对外移民方面更成功，英语世界的文化多样性远超中文世界。

在罗马时代之后，欧洲是分裂的，从来没有统一过。当然，我在《文明》一书中提出过分裂是某种优势，因为它带来了竞争、激发了创新，而中国的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某些规模不经济。但看看今天的世界，你就不能不思考为什么某些文化比别的文化规模大很多？传播更广泛？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小国。欧盟有11个成员国人口少于600万，而中国超过600万人口的城市都不止11个。尽管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很多，但这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残余，而大英帝国已经不存在了。

真正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已经占据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和亚欧大陆一大块面积的中国还能继续扩张吗？如果能，怎样扩张？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用英语讨论这个问题，这说明英语更加容易学会，而且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当年英国人花了很多时间强迫别人学英语，因

此，中文要取代英语成为主要的国际交流语言会非常困难，正如人民币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要货币会需要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

路径依赖是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是一个奇特的学科，我们一般都研究变化和中断，如危机、战争、革命，很少把精力放在那些枯燥的年代。但在历史上的多数年代，事物的变化是很小的，由于惯性的存在，很多事物得以维持，即使超越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美国的地位也是如此，即使不改革，即使其公共财政和政府规制越来越糟，它还能维持很久。

如果让我设想一下100年后的世界，我会权衡刚才所说的历史惯性以及目前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发展的科技创新的力量。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前有两方在斗争，一方是可以称之为天生愚蠢的民粹主义；另一方是能够创造人工智能的新技术。哪一方将获胜？

1882年，美国的民粹主义者挡住了中国移民。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今天的美国会成为一个更加中国化的社会，因为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移民可能会来到美国。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领导的加利福尼亚州一场规模不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却对历史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使美国到目前为止都保持为一个以欧洲人后裔为主的社会。

我认为，我们的世界将取决于民粹主义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全球化走向。他们能放慢全球化的脚步吗？他们能让全球化停下来吗？还是说技术进步与全球化这一组合太强大了，民粹主义者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但如果要打赌的话，我会赌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因为民粹主义是一个简陋的工具，而且不太好用。但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低估民粹主义者改变历史的能力，不管我们有多么讨厌他们。

塔玛尔·赫尔佐格：南北美的差异不是殖民历史造成的

塔玛尔·赫尔佐格（Tamar Herzog），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以色列人，主要研究欧洲早期现代史、拉丁美洲殖民史和法律史。本次访谈内容发表于2016年11月20日的“比较”微信公众号。

问：在15世纪和16世纪，为什么最先发现新世界和开辟亚洲航线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而不是经济上更发达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荷兰和英国？为什么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又落后了，而荷兰和英国在贸易竞争中后来居上？

答：这是一个无数人试图回答，并给出了无数个答案的“百万美元”问题。让我给你一个最可信的答案。当时，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和伊斯兰世界拥有更好的航海技术以及投资于海外事业的资本，但是它们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所独有的政治资助。也就是说，政治权力的拥有者愿意资助那些商人，使他们可以自由行事。毕竟，这些新发现是商人而不是政府完成的。例如，哥伦布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人，而葡萄牙人也是和商人一起去的非洲。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支持这些商人，给予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管辖权。有些人认为宗教也是一个因素，因为许多参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的人想去扩大基督教的信仰。15世纪的时候，伊比利亚人并不像今天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边缘化的力量，他们拥有逐步形成中央政府的政治结构。当时的英国政府结构是相当先进的，但伊比利亚人肯定比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有更先进的政府结构和政治资助体系。

他们后来为什么又落后了呢？首先，把葡萄牙和西班牙区分开很重要。葡萄牙人拥有一个主要由贸易据点组成的庞大帝国，甚至在巴西，城市也都是孤立的贸易据点，直到18世纪，葡萄牙人才开始向内陆扩张。简言之，葡萄牙帝国是一个由贸易据点和航海线路组成的商业帝国，货物和人在其中流动，其权力也是流动性的。而西班牙帝国非常不同，它成了一个拥有庞大领土的帝国。人们一说起西班牙帝国，总是想到美洲，但西班牙在欧洲同样拥有大片土地，如今天德国与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以及荷兰。西班牙人对于帝国的态度和我们今天假设的完全不同：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大西洋派。对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而言，他的心思都在欧洲，美洲则被置于脑后。也许他是错误的，西班牙的未来在美洲，但他一直都积极参与欧洲政治，而不是帝国政治。当然，他也非常关心宗教问题，特别是宗教改革后如何强化天主教的问题。我认为他并不重视经济问题，他显然也不关注美洲问题。

因此，西班牙人对帝国的认识和葡萄牙人非常不同，也与我们今天对帝国的认识非常不同。今天我们认为，尽管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征服和暴力活动，西班牙帝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和当地不同的群体联合与合作，无论是商人、军人、政治家还是贵族，他们认为从属于西班牙帝国可以改善他们的前景。他们觉得从一个小的政治实体转向一个大的政治实体对他们有好处。因此，我们不再把西班牙帝国想象成绝对主义或是充满暴力的帝国，而将其视为很聪明，能够和当地团体合作，给予每个团体相应的位置，让它们不停地彼此竞争，都想成为国王宠爱的“好孩子”。西班牙帝国是一个多中心的王权，而不是权力全部集中在马德里。简言之，西班牙帝国是由相互竞争的多个中心组成的，和你们历史书上看到的形象可能不一样。过去那种绝对主义的形象只考察正式的政治结构，而没有考察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实际运作的。历史学家通过阅读法律文书，得出了这些文书所描述的帝国结构的文本结论，但现实从来都不是这样运作的。今天，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要问的是，人们在那种正式结构中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怎

样改变了那些结构。如果你来问这些问题，得到的帝国形象会与以前非常不同。

西班牙人给予殖民地精英很多特殊权益，包括财政和荣誉上的。他们并没有用西班牙人取代当地精英，至少一开始没有。他们保存了当地的权力结构，在上面又增加了一层西班牙的权力。西班牙人不仅在美洲如此，在欧洲领土也是这样。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思路和北美的殖民者非常不同，北美殖民者从来没有这样对待当地的印第安人。在南美，抵达的西班牙人承认当地存在的原住民世界，他们称之为“原住民共和国”（the indigenous republic）。该共和国有首领，有政治结构，其自身的法律可以在殖民统治下存续。当然，这些政权不能做任何严重违反天主教教义的事情。只要不是明显违反教义，西班牙人承认原住民的政治结构和法律，也允许他们拥有一种公司式的结构。但19世纪新的自由共和国成立之后，共和国以公民平等的名义解散了原住民的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的一员，原住民能生活下去，但作为个人，他们无法在社会中竞争。因此，原住民的边缘化是在19世纪以后加深的，不是在殖民统治时期。

为什么荷兰和英国在贸易和竞争中后来居上呢？我认为西班牙人的心思不在掠夺资源，这又回到我前面说的菲利普二世不是大西洋派的问题。掠夺资源当然很重要，但西班牙人没有把这个当成主要目标。西班牙帝国的目的是建立霸权，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空间、一个统一的世界。当然，西班牙人需要资金来完成这一目标，但他们的殖民扩张，至少在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掠夺资源的机制，而后来的帝国则不同。

我认为，是荷兰和英国率先把经济活动作为殖民扩张的核心。在18世纪以前，商业和贸易也不像后来那样对荷兰和英国那么重要。到了18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而西班牙没有。今

天，我们对殖民主义的看法是外国人到了当地然后掠夺资源，但早期殖民主义不是这样。

有一些研究试图回答殖民地的资本对英国工业革命是否做出了贡献，结论并不肯定。同样，有些研究考察奴隶贸易产生的利润对工业革命的贡献，但奴隶贸易是否有利可图也不确定。

我自己的研究显示，早期殖民主义最重要的影响是让欧洲人觉得彼此有共同点，产生了欧洲人作为一个群体的认知。在殖民地，欧洲人开始认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有共同的身份和共同的道路。早期殖民主义也给欧洲人带来了一种优越感。在此之前，比如读《马可·波罗游记》，你会发现他并不认为自己比中国人优越，当时的欧洲人并不认为自己天生比别人优越。但当他们开始地理发现和控制其他民族之后，欧洲人开始觉得自己很特殊。因此，早期殖民主义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掠夺的经济好处，而是为后来这样做打下了基础。

问: 你认为拉美和北美地区今天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是由于西班牙和英国等殖民统治者所建立的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宗教和文化的遗产吗？

答: 这又是人们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北美和拉美的差异起始于美国正在形成的18世纪，以及拉美许多殖民地获得独立的19世纪初期。在这一时期，西属美洲殖民地比美国要发达得多，这才是西班牙的殖民遗产。例如，当时的北美连一个像样的城市都没有，波士顿可能是最大的城市了，人口不超过1.5万人。北美除了哈佛，没有正经的大学，也没有西属美洲那样的城市社会。英国人那时只控制了北美大陆很小一块地方。相比之下，拉美地区有许多重要的人口、文明和学习的中心。无论是人均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化等各个方面，西班牙给拉美留下了一个比北美更好的地方。

对我来说，19世纪是一个关键。这个世纪，美国腾飞而拉美衰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拉美国家将其归罪于殖民主义很容易，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19世纪对于拉美地区而言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充斥着内战和政治动乱。而对于美国，19世纪是一个建立在原住民苦难基础上的迅速扩张的时期。我经常告诉学生，两次大战期间，近一半希望脱离苦海的欧洲移民选择了南美。也就是说，即使到20世纪初期，欧洲移民仍无法判断是北美更好还是南美更好。我不是现代拉美问题的专家，但我认为北美和南美的差距不是殖民历史造成的。

问：为什么拉美国家容易陷入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这又是一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原因，这种社会结构造成的文化空间，让人产生集体思维而不是个人思维。在拉美国家，从属于某个群体，如家庭、本地社区和城市的感觉，非常强烈和有意义。相反，北美人可以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轻易地从国家的一端移居到另一端。我记得看过一篇对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采访，他一直都住在意大利的摩德纳（Modena），一个并不很大的城市。记者问他，你可以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为自己建造豪宅，为什么还和父母一起住在他们摩德纳的老房子里？帕瓦罗蒂回答，这是他的城市，他每天下午还可以和当年的同学一起踢足球。当时帕瓦罗蒂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非常有名，但对于他来说，能住在自己的家乡，和朋友在一起，比在纽约拥有顶层豪华公寓更重要。

因此我认为：在某些社会，人们成长中得到的理念是，人是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行事的个体；在另一些社会，人们在成长过程中相信，他们属于某个群体，他们的成功取决于这个群体，而群体的成功也取决于他们，这种思维会导致民粹主义，因为人们停止个人思考，而把群体凝聚力作为核心，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确实，民粹主义以领袖

为核心，但也使那些追随领袖的人产生对群体的归属感以及被保护感，而不是孤独地面对世界。我不是一个政治学家，这是我对民粹主义的解释。

问：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建立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马克斯·韦伯提出，新教是北欧国家比南欧国家经济更发达的原因，但我想会不会是因为北欧国家经济更发达，它们才选择新教呢？

答：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两者同时存在。有些人选择新教是因为信仰，有些人是因为物质利益，而两者又相互强化。马克斯·韦伯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在脑子里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新教，连他自己都承认并不存在。他通过识别各种新教的美德，创造出一个拥有所有这些美德的“稻草人”。他提炼了新教精神的实质，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新教。

历史研究的难点在于，你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一个因素从其他因素中剥离，然后进行实验。总是存在很多因素，而实验是不可能的。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手中掌握了真相，但我属于那些认为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一批历史学家。我们试图想象生活在过去是什么样子，过去的人面临什么样的选择，他们怎样看待世界，而且我们是从朋友，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去想象。我们确实要考虑事实和信息，但我们不会去编织宏大的理论。

有一段时期，有些人希望历史能成为类似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但看看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你就知道经济学家对于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不管他们怎么说。今天，历史学家也从“我们知道”这种说法向后退。在我上本书的结尾，我提出历史研究是一个虚心的工作，多数历史学家已经不再给出答案了，而是说事实远比我们相信的更复杂。这就是历史研究要传递的信息。我个人还认为，历史可以让人思考那

些没有被采纳的选项，认识到没有任何事情是注定的，人类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很多时刻的很多决定造成的结果。

问：谁真正塑造历史？英雄还是大众？

答：我和我丈夫有个很大的争论，他认为至少有些时候，个人塑造历史，而我一直跟他说不，因为即使个人有很大权力，他仍然需要支持者。例如，我们争论如果希特勒在“二战”早期就被刺杀，世界大战是否还会继续。我总是在想那些数以百万计的支持希特勒并允许他做那些事的人。个人只有在一个很小的环境中才能发生变化，如与朋友和家人。但如果个人想造成巨大的改变，他必须有许多合作者。最终，是这些合作者带来改变，而不是个人。我把责任从个人转移到支持他的那个群体中。

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你身份以及对生活的理解。因为我研究历史，我对生活的理解不同于别人。历史还给你力量，去思考许多选项，如果你看历史你就知道存在多种可能性，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做不同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历史是开放的，因为它让你思考现在不是必须，未来还可以塑造。我很反感人们说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因此我们就必须怎么做。历史告诉我们的是，有很多选项，有很多时候人们做出错误决定，但从他们的角度很难判断哪个选项是正确还是错误。还记得2008年金融市场崩溃吧？太多人失去了一切，但也有些人发了大财。因此，即使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都让不少人获益。

故事永远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简单。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总是描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过去，认为孩子们应该从中得到道德上的教育，对此我感到不安。因为这样使历史变成紧身衣，用来解释现在，并明确指出未来。每个国家为了培养国家意识都这么干，要让历史学家说这不是历史本来的面目很难。于我而言，历史是一个可以让你幻想差异性和可能性的地方。

黄亚生：中印是龙象之争还是龟兔赛跑？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目前，他正在主持关于中国和印度私营经济发展、外商所有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动因、创业环境、科技发展、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研究项目。2003年，他与哈佛大学教授塔伦·卡纳撰文称，印度的发展模式优于中国，因此印度将超过中国。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多讨论。13年过去了，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终于超过中国，这个问题再次引起关注。本次访谈内容于2016年10月13日刊登于财新网，以黄亚生教授口述实录形式呈现。参与交流的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金三林、王晓明、赵静。

我是研究制度的，先不讨论印度和中国比较的问题，我们先从制度经济学谈起。制度经济学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一派认为制度是外生的。前者认为，制度会随着经济发展自动调整和优化，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他们认为制度不是不重要，而是一个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得到解决的问题。另外一派认为，制度是外生的，制度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也不完全如此，制度本身的设置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学术界包括美国学者都以第一种观点为主，这是因为对制度进行量化难度很大，因此没有人能够对这个问题做数据分析。但过去10—15年，以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为主，学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量化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经验，在控制了

其他因素之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制度变革在前，经济增长在后。现在这个结论已经逐渐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上风。

我当时写文章也是从制度的角度看待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我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可能主要就在于，我认为制度是外生的，他们认为制度是内生的。我认为，制度是会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制度也不会完全受经济发展的制约；相反，制度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论是制约还是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的基础条件肯定比印度好，包括教育水平。但我不特别看重基础设施的优势，而更看重制度的作用，因为基础设施是内生的，而制度是外生的。从制度的视角来看印度，印度经济基本是以民营、私营企业为主，印度的法治有很大问题，但总体上仍是一个法治国家。印度也有腐败，但其腐败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腐败，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官员的腐败。基础设施是内生的，是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解决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内生的。全球的规律都是这样，不是外资刺激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刺激外资。因此只要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教育可能是外生的，虽然印度的教育基础薄弱，我也经常批评他们，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国不断加大投入，教育也在不断改善。

制度包括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与中国相比，印度改革起步晚，而且也不是很彻底，但其基本方向是对的。只要印度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问题都会得到解决。而中国要想改革，必须逆反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其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一直都在走下坡路，中国后来成立了国资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两相比较，一个沿着既定的方向往下走，一个要逆反现在做的事情，肯定是后者更难，因为政治成本会非常高。

我们当时做中印比较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一个技术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印度和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国家比

当然显得慢，但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包括那些7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国，印度的增速排第四。因此印度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只不过和中国比就不那么出色了。但很多人觉得，印度比不过中国就是一个灾难，这显然就不对了。

从基础条件看，印度在很多地方都比不过中国，而且很多差距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比如，我们在做一个研究，研究人对国家的认识和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的关系。印度历史上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认识，文字的出现比中国晚很多，很多历史资料都没有留下来。现在印度有了电子身份证，在没有电子身份证之前，印度政府对印度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大概有40%是统计不到的，说明其组织能力很低。但是在教育水平、政府组织能力、基础设施这么差的情况下，印度每年还能取得4%～5%的增长，这是相当不错的。

研究经济发展，不应该将A国与B国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而应该与其各自的发展潜力做比较。如果A国发展潜力低，但实际表现不错，而B国发展潜力大，但实际表现与其潜力不相称，这样比的话，印度表现是相当好的，而中国的表现相对而言要逊色一些。

为什么这样说呢？“二战”之后，人均收入水平能够赶上或是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都在东亚，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所以同在东亚的中国理应做得更好。当然，你可以说前三十年中国有政治上的冲击，但这就回到制度问题了。

印度的发展潜力低，但表现不错，是因为其增长主要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三要素是投资、劳动和生产率。一般来讲，投资的贡献永远是第一位的，生产率提升一般排第二。中国有投资优势，而印度主要靠生产率。我现在也做印度的项目，发现其企业管理水平非常高。显然，以生产率提升为基础的增长更加可持续。当时我也是看到这一点，才做出这一判断的。当然，结论是否正确，还要靠时间来检验。

当时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本来一直是渐进式改革，但后来在政策上出现这么大变化，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我一直都说，如果印度能超越中国，不是因为印度做得好，而是因为中国做得差。印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没有搞大规模刺激，没有房地产泡沫，其金融体系总的来说比较稳定。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话，印度就有可能超过中国。我说的是发展水平，不是发展速度，印度现在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中国了。

德怀特·珀肯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

德怀特·珀肯斯（Dwight Perkins），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和东亚经济，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亚洲中心主任等职，代表作包括《发展经济学》《东亚发展：基础和战略》《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等。本次访谈内容刊登于2016年11月28日的“比较”微信公众号，金三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问：中国目前正在就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开展辩论，作为研究东亚经济的专家，你能否谈谈产业政策对东亚经济增长究竟做了多大贡献？

答：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前二三十年，一个正确实施的产业政策肯定是一种合理的手段，但是不是最好的手段我不知道，只要你能模仿比你领先的国家，并做出一些调整，然后避免重蹈前人的错误。这些事情是政府能做的。

我对韩国的了解比对日本更多。朴正熙政府致力于韩国的工业发展，部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部分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军事威胁。对于一个长期以8%～9%的速度增长的国家，很难说产业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随着经济越来越复杂，创新越来越成为增长的关键部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产业发展基本上都要依靠创新，而政府在创新方面是不擅长的。

我觉得中国也在接近这个阶段，政府干预的副作用越来越大。我相信政府的干预在一些领域仍然是有效的，但今天中国最具活力的领域绝不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领域。中国今天已经发展到这一阶段，不需要政府告诉企业家应该投资什么。在阿里巴巴创立的过程中，我相信马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咨询国家计委的意见。

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非常不同，当时韩国的产业政策很受日本影响。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写过一本书，是和韩国开发研究院一起合作的。我去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采访了韩国产业政策的设计者吴源哲，他于20世纪70年代初担任韩国重化工业政策委员会主席，曾经特地去日本和欧洲考察。该委员会决定哪些产业需要重点发展，产能应该是多少，具体生产地点在哪里，然后他们把计划交给私人部门来完成。他们选择了那些最大的私营企业，即所谓的财阀，相信财阀能完成任务。

如果没有政府干预，韩国的私营部门有没有可能自发地发展重化工业呢？这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当时的韩国政府说我们不做任何干预，取消所有的产业管制，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那将会怎样？也许韩国的经济一样会发展得很好，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从政治上来说，当时的韩国不可能那么做，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这样做。我可以帮中国制订一个计划，让中国建立纯粹的市场经济，取消所有不必要的管制，中国经济表现可能会非常好，但在现实中这永远也不会发生。

问题在于，这些管制是阻碍还是促进产业发展。韩国也有很多阻碍产业发展的管制，负责这些管制的官僚们非常糟糕。我记得为了能在韩国多待几天，需要延长居住许可，为此我到韩国相关部门跑了四趟，而在很多其他国家，这是一次就能搞定的事情。对于外商投资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个美国大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该公司为了能进入韩国市场，所提交的申请文件足有两英尺高，且铺

满一个十二人桌。不幸的是，他们的申请文件填错了，必须从头来过。这就是当时韩国的官僚机构，不仅对外资如此，对本国的企业也是如此。所以当时韩国政府的领导层就告诉企业，你们该干嘛干嘛，我们会给你们提供足够的帮助，换句话说，领导层运用国家的权力来压制这些管制。

从一个高度控制的体系转向一个非控制的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人犯的错误，就是跑到东欧和苏联，告诉这些国家只要建立市场、取消管制，市场自然会解决一切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产业垮掉了。有的是军工企业，有的是因为过去的供应链中断了。对于在这些经济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而言，问题尤为严重。那些长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中工作的管理者显然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和企业家都需要时间才能培育出来。

问：你很早就提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现在经济增速降低，你认为中国经济是不是更加健康和可持续了呢？

答：如果增速再降一些，我会认为更健康。经济增速下降是正常的，没有哪个国家能永远保持9%的增速。在真正实现赶超之前，赶超型国家的增速就会降下来。增速下降的原因很多，有些是可度量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我看到的一份调查说，90%的18—40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在城里打工。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转向服务业。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以前就比工业快，不过那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服务业的发展被忽视。一般来说，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后，增速会放慢。

而不可度量的原因包括一个国家的后发优势会随着发展逐步减弱。在早期，低工资是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优势之一。但随着经济发展，工资会不断上升，这在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现在需要的是

一个基于创新的经济增长。但是创新的过程中会犯错误，犯错误也会降低经济增速。

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在赶超的时候起点更低，因此中国高增长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但如果政府坚持要通过刺激政策，特别是房地产刺激政策，来维持6.5%～7%的增长，就会造成更多的经济扭曲。北京和上海的房价还在涨，但我个人以及我所尊敬的一些学者的分析显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应该保持平稳或是下降。中国现在是人为地保持高房价，这能保证钢铁的需求。中国的钢铁产量和产能已经远远超出合理范围，产能大约有11亿吨，而国内需求只有7亿吨，然后中国向全世界倾销钢铁，惹得大家都不高兴。

我认为中国能保持5%的增长率就很好了。由于人口结构方面的原因，中国不需要为了就业保持每年6%～7%的增长率。但显然政府不认可这一点。和其他外向型经济体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不能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因为中国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已经很大了。不要说因为欧美经济放缓，全球贸易本来就表现不佳，即使国际贸易增速较快，中国也不能再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过去，中国出口以20%多的速度增长了近30年，如果再以此速率增长10—20年，世界各国都只能和中国做贸易，它们彼此之间的贸易可能都没有了。

由于还存在赶超的空间，中国应该还能保持10—20年4%～5%的年均增速。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长期保持这么高的增长。当然，目前以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存在一些问题，这对我刚才的预期会产生影响。对以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人均GDP，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一个研究，采用的是城镇物价数据，这个方法容易压低中国实际的购买力平价。如果我们假设中国今天以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人均GDP达到1.2万—1.4万美元的话，任何高于5%的经济增速都需要人为地刺激，长期这样做会导致大范围的产能过剩。我觉得，如果不

改革国有企业，中国能保持5%的增长并不容易。我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国企面对竞争，也许目前正在这么做，但进展似乎不大。

问：中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深化改革的方案，但进展似乎比预期的要慢。你认为中国改革的优先领域应该是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具有开发一流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而亚洲其他地区除了日本、韩国之外都不可能做到。问题就是，中国怎样让科技和创新、创业精神相结合，使产业可以随着技术水平不断升级，并保持国际竞争力。这应该是目标。下一个问题就是私营部门能否有足够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如果中国想依靠国有企业，问题是国有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能否真正地面对竞争。

我到越南至少讲过50次课，部分讲课内容涉及国有企业。该国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希望从外界得到好的建议。和中国相比，越南是一个小国，所以我有机会和政治局委员甚至总理对话。起初，我跟他们说，如果想让国有企业成功，这些企业就必须面对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在过去的10—15年，我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个建议，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做。他们听我说，但什么也不做。在一个相当腐败的体系中，国有企业是一个现成的为支持者提供金钱和工作机会的来源。

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及政府中同盟者的政治力量，我对中国能否让国企面对竞争心中存疑，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么说过。世界上唯一能让国企有效运作的国家是新加坡，该国的国企必须面对国际竞争，如新加坡航空公司虽然是国企，却是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

我认为，中国的管制仍然过多。私人部门，甚至公共部门，想干点事情，都必须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与管制者打交道。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减少管制。我曾经给马来西亚总理写过一份政策报告，

谈到这个问题，但该国的官僚们根本不想改。中国的官僚也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

问：在明朝中晚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你也曾研究中国历史，你认为按照当时的发展势头，如果不是被清朝中断的话，中国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吗？

答：在当时，中国已经有相当复杂和发达的商业经济，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当时的贸易很发达，外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控制了远洋航运和贸易渠道，但在国内贸易中基本上没起什么作用。如果我们追溯到更早的宋朝，就可以发现中国那时就已经有发达的城市和商业经济，还有相当水准的早期工业生产和重要创新，比如钢铁和纺织。

著名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经典著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中，区分了基于科学的创新和基于“修补匠”式的创新。修补匠是那些从事实际工作和操作机器的人，他们思考的是，如果对现有技术和工艺做出一些改动，机器是否会运转得更好。英国早期的纺织业革命和蒸汽机，基本上都是修补式的创新。到了19世纪70年代，自然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催生了电气和化学工业的基础创新，并带来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兰德斯认为，没有现代科学，这些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科学对于后来的工业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你读到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史的著作时，你能发现古代中国有相当复杂和精致的创新，但也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把数学和科学观察结合起来。中国积累了很多知识和观察，但从来没有达到类似牛顿物理学的程度。如果达不到这种现代科学的水平，你永远也不可能达到19世纪70年代后欧洲的现代工业的水平。

欧洲也有很多修补式的创新，但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一批集中的修补式创新，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工业发展，然后自然科学开始发力，工业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18世纪晚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西欧各国随后跟进。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早期曾经说，创新会继续，但人口增长会赶上来，这是基于马尔萨斯的理论。如果现代科学没有发展并推动工业化继续向前，这种观点在当时其实是相当有现实意义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李嘉图错了，而亚当·斯密对创新前景的判断是正确的，因而得到赞扬。但是，斯密没有区分修补式创新和基于科学的创新，他举的钉子的例子实际上是修补式创新，即通过调整生产组织方式来提高生产率。

从上述分析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不可能出现持续的工业化。在宋朝，中国就已经有了很多高水平的、修补式的创新，并且这些技术也没有失传，而是通过典籍保存下来，有些在今天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都能看到。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中国有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发展，但不可能实现现代工业化。与宋朝相比，明朝实际上是相当反资本主义的，政府干预过多，思想上也变得非常保守，人均收入水平应该也比宋朝低。如果蒙古人没有入侵，宋朝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出现现代科学以及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跟欧洲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因为当时的欧洲也没有什么。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以色列人，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包括《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经济增长之谜》等。本次访谈内容刊登于2016年12月5日的“比较”微信公众号。

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主要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这一扩大有多少是因为全球化因素，多少是因为国内因素？

答：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基于情绪讨论问题，也可以基于证据讨论问题。目前的证据显示，贸易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效果并非大得不得了。很难给出一个具体数字，我估计25%～30%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归咎于自由贸易。

有很多研究试图发现自由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特别是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所有近期研究发现的那些机制都证明，影响是存在的，但数量都很小。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新发现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新的影响机制相当复杂，而且超越了新古典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Stolper-Samuelson effect），该效应能解释20%左右的收入差距，但总体上这些新机制的量化影响非常小。

在收入的高端，工资差距扩大得更多，在收入的低端，则反之。在美国，由于没有及时调整，最低工资的相对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这对于低收入群体产生了一些影响，工会影响力的下降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对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技术进步。不过，技术进步的量化影响也不是很大，而且是一种相关关系。在那些研发投入比率高或是技术进步影响更大的部门，收入差距的变化也大，但我们不能肯定其具体的量化影响到底是多少，但应该比贸易的影响大。当然，全球化本身也会影响技术进步，但我们不知道影响有多大。

问: 为什么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吗？

答: 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一个新现象。我并没有一个答案。这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而预测短期波动是很难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大面积出现，所以我们还不能把贸易增速的放缓归咎于贸易保护主义。不过，对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预期是存在的。比如说，英国脱欧还有美国的变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觉得需要保护自己。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证据并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但不幸的是，政治家实行的政策往往不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很难说特朗普会不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他不可预测。但在美国国会，对本国劳工的支持会上升，对国际贸易的支持会下降。

问: 在美国大选前，有400位经济学家发表公开信批评特朗普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如果他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 TA），能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吗？

答: 认为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给美国带来好处的想法是很荒谬的。其实，该协定对美国的影响没那么大，对于墨西哥的影响确实

很大。想解释清楚这一点很难，因为看到进口增加和国内工人受损很容易，但看到因为进口而带来更便宜的产品并不容易。最近《经济学季刊》刊登了一篇分析很到位的文章，其估算证明，消费品价格的长期下降对于低收入阶层的好处最大。此外，原材料也更便宜了，这会带来其他产业的扩张，并导致就业的增加和工资的上升，但这一点还没有人估算。而且，更便宜的原材料可以促进出口，因为生产成本下降了。所以，美国虽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原材料，但可以把制成品卖给欧洲和南美，这会创造就业。我们不能片面地看待经济现象并因此片面地下结论。

问：我们能否设计一种机制，使全球化的受益者可以补偿受损者？

答：实际上，我们有这样的补偿机制，但用得不够。在美国，有一个项目，是对因进口竞争而失业的工人进行重新培训。政府不是没做这件事，但是规模太小，项目资金不足，而且还存在很多浪费。我们需要给这个项目投入更多资金，帮助这些工人重新获得培训。安妮·克鲁格曾经估算，该项目培训一个工人的费用超过了这个工人重新上岗的工资。但浪费是可以避免的。

问：你曾经写过一部关于利益集团的书，前面你也说过政治家决策往往并不是基于证据，那么你认为民主制度和自由贸易相容吗？

答：只相容到一定程度。每个民主政体都有利益集团，每个专制政体也有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一直都存在，并导致结果偏向于那些更有权力的群体，而且有时候带来极高的经济成本。多数国家实行代议民主制。选民在选代表的时候，把选票捆绑在一系列政策上，如收入、税收、枪支管理、教育等等，不是只关注贸易政策。多数时候，贸易政策只占很小一部分。有时候，在一些因进口竞争而受损较大的地区，贸易会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因此，选民选的是综合的政策，总

体上这一制度运作得很好。也许，我们没有世界上最好的枪支管理政策或是最好的教育政策，问题是我们能否理性地达成妥协，而不是是否最有效率。民主永远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看看历史吧，“二战”后关贸总协定创立时的签约方基本上都是民主体制。因此，民主国家是可以达到相当程度的自由贸易的。我们可能永远不能达到完全的自由贸易，但这是可以接受的。

问：大国和小国之间，哪一个更容易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哪一个从自由贸易中获益更大？

答：小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更大。大国可以影响自身的贸易条件。如果你从自由贸易状态走向自给自足状态，肯定是大国更不易受影响。然而，所有的模拟都显示，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于大国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很小的，对于那些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如加拿大、比利时而言，影响是很大的。有些国家觉得没有国际贸易能干得更好。20世纪6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但没有取得什么好结果。20世纪70年代成功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是依靠国际市场发展起来的。

问：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制度和变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

答：它们不是外生的，但也取决于你说的时间维度。如果你为未来五年做计划，那么制度是外生的，如果你想的是未来50年，制度就不是外生的了，因为制度会发生变化，政治、经济和制度之间会相互影响。问题在于，制度变迁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以英国脱欧为例，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如果英国能成功实施的话。2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可能性，但欧盟的逐步东扩以及权力集中于布鲁塞尔使制度发生变迁，导致很多英国人认为脱欧会使他们过得更好。这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但确实包含了制度的变迁。

考希克·巴苏：经济学家的责任

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印度人，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等职。代表作包括《政策制定的艺术》《超越看不见的手：新经济学的基础》等。本次访谈内容曾刊登于2017年1月26日的“比较”微信公众号。

问：我们能否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政治家们做出正确的而不仅仅是受欢迎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而不仅仅是短期利益的决策？

答：政治家们总是愿意做受欢迎的短期决策，因为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取决于受欢迎程度。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让这种受欢迎程度与国家的长远利益一致。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为了上第二天报纸的头条，一种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一般的投票选举制度容易鼓励政治家的短视行为，他们想做些两三年内见效的事情，因为当下次投票的时候，政治家们希望当选。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改变激励机制的大思路，使政治家们考虑长远问题。

有两种解决思路。第一，即使政治家个人考虑短期利益，其所在的政党也必须考虑长远利益，因为政党的存续时间要远远超过个人。因此，如果把政党的利益摆在突出位置，那么政策就会具有长期导向。第二，我们可以通过媒体多做宣传来纠正这种短视行为。如果普通民众更加关注长远利益，这将激励政治家也这么做。所以经济学家

和媒体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让普通老百姓更加关注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问：在《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书中，你提到理念的强大，很多官员坚守一些陈腐的理念。那么当我们面临反对改革的阻力时，哪一种阻力更难克服：基于利益的反对还是基于理念的反对？

答：我书中提到的理念的强大，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曾经从一个教授和研究者转变为印度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人们总是说要改变政策很难，因为有利益和游说团体。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在印度政府工作了一两年后，我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家和官员所陷入的思维定式比所谓的利益更重要。当人陷入思维定式之后，要做出改变很难。凯恩斯在他那本名著的最后一章就是这么写的：从长期来看，理念比利益更重要。

我在印度政府工作三年之后，实际上接受了这种观点。当你向一群官员提出一个好的建议时，有些官员会代表利益集团而反对，但最大的反对声来自那些认为真理在自己手中的官员。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应该这样，货币政策应该那样，税收政策只能怎样。是这些顽固的理念成为变革的最大阻力。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建学校，让他们可以吸收新鲜的理念。我记得中国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做很好。我在印度政府工作期间，曾经到厦门访问，在一次讨论中我听说中国有这样为官员而建的学校。办好这样的学校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问：你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制定政策更容易还是更难了？例如，基于大数据，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因此可以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和有效果的政策。另一方面，更多的信息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市场可以更好地运转，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也在下降。

答：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海量数据的收集确实是一个优势，它能使你掌控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信息。不仅对于政策制定有好处，对于企业而言，这些信息也带来巨大优势。但我们必须牢记一件事：如此大的力量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从科技中获取的力量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通过某种方式扩散信息可能对人们有害。幸运的是，技术可以用来赋予人们做出更好决策的力量。例如，过去，某种产品的价格在村子和村子之间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你所卖的低价产品在另一个村子里的价格更高。现在，有了信息技术，村子里的农民可以通过手机知道其他村子的价格不一样，他们就可以尽快把产品卖到那里去。因此，技术确实让市场更加有效，技术让市场更强大，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发展，因为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才是最有效率的。而信息技术的进步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也降低了政府因矫正信息不对称而进行大力干预的必要性。

问：你认为政策制定者真的会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吗？还是他们仅仅是希望自己的想法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证实？你能否给出一个你的建议确实影响了政策的例子，或是在印度政府担任顾问的时候，或是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

答：不仅仅是政治家，所有人的天性，都是希望自己的想法和观念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证实，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学到。尽管我认为多数政治家希望经济学家认可自己的想法，但我在印度政府的经历告诉我，把一些重要的理念反复地灌输，向政治家们进行展示，在公开场合予以讨论，从长期来看，会带来改变。你要我举一个例子，我可以给你两个。

我担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时候，印度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差不多每年有10%，食品的通胀率更是高达20%，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我刚刚上任一两个星期，印度总理就让我参加一个有关控制通胀的会议。控制通胀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但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是针对食品通胀的。那时候印度有一个通过把政府库存的粮食投放到市场上以控制食品价格的政策。具体的做法是将每一千吨粮食进行拍卖，价高者得。这样的话，七八千吨的粮食就会被七八个粮商买走，然后他们再卖给普通消费者。

我在会上提出，过去印度政府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七八个粮商组成的寡头垄断，而我们从经济学理论中知道这不会足够有效地降低粮价。我建议，应该把同样多的粮食卖给七八十家粮商，而不是仅仅七八家。换句话说，政府应该一百吨一卖，而不是一千吨一卖。有这么多的粮商来竞争，价格会大幅下降。这个建议一开始遭到一些反对，但最终得到印度政府的采纳。我认为这对降低食品通胀率发挥了一定作用。

另外一个关于反腐败的建议在短期内尚未看到效果，但我希望最终会获得成功。根据印度法律，在一起贿赂案中，行贿和受贿者同罪。对我来说，在印度的贿赂案中，行贿者从来都不承认贿赂的事实毫不奇怪。这很容易理解。在印度，行贿发生之后，行贿者与受贿者的利益就完全一致了，因为如果被发现，两者都要蹲监狱。

因此我建议，印度应该修订法律，使某些贿赂行为中，普通老百姓行贿无罪。这样老百姓就不怕承认自己行贿，而受贿的官员们就会紧张。我一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反对意见很多。许多政治家批评我，认为我的观点不道德，因此这一建议未得到采纳。但现在，有些人开始接受了。印度甚至是国外的一些媒体，如《经济学人》杂志，积极地评价了我的这一建议。我希望法律最终会得到修订。

因此，建议并不总是会产生效果。但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向政治家们展示我们的意见，而且要持续不断地这样做，无论是在印度、中国，还是美国。

问：你认为经济学家能否在没有任何过往政府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可以从研究机构的学者直接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如担任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

答：我的经历告诉我，从学术研究转向重要岗位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容易。记得我当时正在度假，突然接到印度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我担任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尽管面临挑战，但总体而言这次转变好处也很大。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看问题的角度是全新的，会注意到那些有经验的官员可能忽略的问题。我会质疑那些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政策，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食品价格的例子。

我认为政府应该给局外人更多的空间，以进入政府短期工作。对某些岗位如央行的首席顾问，技术上的要求非常高，良好的学术训练以及对前沿经济学理论的掌握可能比拥有20年实践工作经验但缺乏新理念的官员更有优势。当然，官员的经验和局外人带来的新理念，我们都需要。

问：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你一定访问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并研究过它们的经验。考虑到这些国家有许多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能不能说现在我们对什么样的政策有利于、什么样的政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

答：对我来说，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与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使我能到许多很小的国家如太平洋岛国，以及复杂和庞大的经济体如印度、中国、巴西等，实地考察政策是如何在最高层决策的。你很快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允许政策多样性的存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需要和冲动。但是，广泛的、具有共同特点的经济规律和基本原则也是存在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67年用优美的文字写道：如果你出海航行，你可能不喜欢风和浪的运行规律，但如果你因此无视这些规律就太蠢了。你没有选择，你必

须与这些规律并存。经济政策也是如此。市场的某些运行规律和原则是无处不在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们，你应该了解并应对这些规律。

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需要，这一点很重要。我曾经和一位瑞典经济学家乔根·韦布尔（Jorgen Weibull）合作发表过一篇关于守时的文章。看到不同国家的民众在这一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非常有意思。历史对于塑造人的行为极为重要。例如，印度的独立靠的是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因此印度人很好地掌握了用非暴力的手段来捣乱的艺术。今天的印度人仍然在运用这一手段，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靠这个赶走了英国人。我相信中国人的行为一定也是被历史塑造的，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一定在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

问：印度当前的经济表现十分出色，原因是什么？印度经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英国的殖民统治？

答：近来，印度经济表现很好，年增长率达到7%，在全球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这种表现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概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一个是储蓄率。历史上，印度储蓄少，投资也少。实际上，我们过去常开玩笑说，身处亚洲的印度的储蓄水平更像一个拉美国家。但2001年以来，印度的储蓄和投资率显著上升，大概处于32%～38%，这当然推动了印度的经济增长。

另一个推动因素是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在推动市场自由化，给个人创造力的发挥以更大的空间，让市场运行得更有效率，更有创新性。这显著提升了印度经济的活力。

对于不同的国家，历史残留下不同的影响。我个人坚信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掠夺性的，当时印度的很多资源被输送到英国。但殖民统治也是一种对外开放，印度向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开放，从中学

到了很多。因此，资源掠夺确实存在，但部分科学和文化的输入也使印度获益。

问：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也明显上升。你认为是否需要有一个更好和更加正式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毕竟，对于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国际公共产品，我们确实有正式的协调机制。

答：我认为这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世界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商品、投资和货币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但政府和政策仍然以国家为基础。我们看到的全球市场的动荡和不满等巨大挑战均与当前世界的这一改变有关。

我在印度政府工作的时候，曾有过此方面的直接经历。我参加过二十国集团会议。那时候，通货膨胀是一个大问题，不仅在印度如此，在中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都是这样。当时，美联储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导致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在金砖国家会议中，我们讨论了发达国家政策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全世界都应该为此采取集体行动。不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必须有更多的协调，使全球经济能更加顺畅地运行。我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我知道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挑战。我可以想象某一天，美联储在决定调整利率政策之前，先咨询中国和印度央行的意见，当然，反过来也是如此，但这一天不会那么快到来。

例如，目前有六家中央银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尽管效果不显著，但没有一个国家敢加息，因为怕汇率上升和出口下降。这时候，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需要坐下来一起决定货币政策。这只是一个例子。全球化已经如此迅速地发展，对全球性政策的需求非常大。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摩擦和政治动荡。我希望，

这些政治风险可以使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聚在一起，认真考虑加强政策协调，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挑战。

论美国

为什么很多美国华人支持特朗普？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不仅因为竞选的两方不论谁当选都将创造历史，更因为选举的结果将深远地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我在美国访学期间，不可避免地要和当地人交流这方面的话题。令人意外的是，我接触到的美国华人有很多都支持特朗普，这颠覆了我以往的印象。

传统上，华人多数都支持民主党。据亚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的调查显示，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81%的华人投票给奥巴马。这是因为，民主党一向是少数族裔的代言人，共和党则更多代表白人的利益。而且，多数华人都定居在美国西海岸和东北部，这里是民主党大本营，所以华人的政治倾向也更接近民主党。有鉴于此，再考虑到特朗普本人对移民、少数族裔、妇女以及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还有这么多华人支持他，确实令人意外。

华人为何支持特朗普？我所听到的理由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现状不满，希望改变。一个朋友告诉我，如果希拉里当选，你能想象未来四年的美国还是这样，如果特朗普当选，或许会有些改变。我反问，美国的情况不好吗？从统计数据上来看，美国的经济还不错啊。朋友耸耸肩说，反正我们中产的收入已经多年没增加了。还有的朋友因为在医疗行业工作，反对奥巴马医改。

二是对民主党的社会政策不满。例如，奥巴马政府通过法令，要求所有公立学校的厕所对变性人开放，变性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就可以进什么厕所。许多华人家长对此非常反感。再比如，民主党控制的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2014年通过法案，要增加非洲裔、拉丁裔美

国学生上加州公立大学的比例，这明显损害了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学生的利益。实际上，亚裔学生往往要比其他族裔学生的分数高很多才能进同样的学校，这已经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而2016年，加州民主党人准备立法将亚裔群体进一步细分，估计是发现亚裔内部其实差距也很大。如果按照这样的划分实施社会政策，有可能会进一步损害华人的利益。

三是反对现行的移民政策。确实，华人也是移民，但他们绝大多数是合法移民。而对于那些从美墨边界过来的非法移民，华人是不同情的。特别是其中部分人享受了美国的各种社会福利，这些都是包括华人等纳税人出钱养活的。此外，对于恐怖分子可能混入移民涌进美国，也令部分华人非常担心。一个朋友告诉我，民主党近来的很多做法已经触及“华人的底线”。

经过长期的奋斗，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是美国社会中的成功人士。据美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51.9%的华人拥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而美国白人的这一比例只有29.5%；华人的年均收入比非洲裔、拉丁裔的白人高25%，住房拥有率也高20%左右。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华人普遍相信勤劳致富，在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上也偏保守。可以说，在经济、社会特征上，华人比白人还白人，比中产还中产。

尽管华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美国社会对华人歧视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比如说，华人平均收入确实高于白人，但这种差距主要是教育程度不同造成的。在同等学历下，华人的收入仍然低于白人。因此，华人还是会支持强调保护少数族裔权益的民主党。但随着华人愈发成功，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立场也在发生分化，民主党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可能会越来越损害华人的利益。网络上曾流传几个华人业主拿起枪保护自己财产、勇斗歹徒的视频，我也亲耳听到一个朋友告诉我，当地华人经常遭遇入户抢劫。许多华人都在考虑武装自己，保

护家人和财产。众所周知，“拥枪”和“禁枪”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又一大政策分歧。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华人转向支持共和党。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听到的情况或许并不能准确代表美国华人整体的看法。毕竟我接触的人非常有限，而且都是以中产和专业人士为主。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华人都实现了“美国梦”。据美国政府统计，2014年美国华人的贫困率高达15.8%，高于亚裔美国人的12%和白人的10.1%，也高于全美14.8%的平均数。换句话说，美国是一个折叠的社会，美国华人也是一个折叠的群体。他们最终将如何选择，只有时间才能回答。

（本文刊登于2016年10月28日“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微信公众号，《环球时报》予以转载）

特朗普的政策取向以及中国的应对

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后，全美国和全世界都在猜测他的政策取向。由于他在竞选中说过很多比较极端的话，不少国家都对他当选感到紧张和不安。大选当天，美国股指期货一度暴跌至触发熔断机制，但之后两天却连创历史新高。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特朗普的政策可能真的会重振美国经济，至少在短期内有很大的可能性。

我认为，特朗普在上任之后，肯定是聚焦国内问题，而且经济特别是就业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国际问题则会放在次要的位置。特朗普能够当选，靠的就是“美国优先”的竞选纲领，靠的就是大量位于“锈带”地区的中产和蓝领的支持者，他们要的是就业和收入的上升，厌恶美国无休止的对外干预。如果他还想连任的话，就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迅速采取措施，而且要见到一定效果。其具体做法是，在国内投资基础设施，放松政府管制，对外则搞贸易保护。

此次在美国访学期间，我亲身体验到美国基础设施的年久失修：道路坑坑洼洼，机场拥挤不堪，地铁站陈旧狭小。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最新报告显示，仅道路拥堵和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低效，每年给整个经济带来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美元，而美国基础设施未来7年至少需要投资3.6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在创造本地就业的同时可以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何乐而不为?

这些年，美国的政府管制也愈演愈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美国的政府管制过多而且过于复杂，尽管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无论是消费者保护、金融监管还是医疗保健，但过多的管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有研究显示，在过去60年间，美国不断增加的政府管制每年

至少降低了1%的GDP增长率。美国政府所属的小企业管理局估算，管制给小企业带来的成本平摊到每个雇员头上大概在一万美元以上。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要放松管制，包括环境保护方面的管制，尽管在长期可能会带来环境保护以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恶化，但短期内确实能够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贸易保护也是立竿见影的手段，特别是在促进就业方面。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主要受益者是资本所有者和高素质劳动力，而低技能劳动力是受损者。其实，随着其他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中产阶级的饭碗也不稳固。要解决上述问题，美国必须限制制造业产品进口，以及限制移民。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贸易伙伴不采取报复措施，贸易保护确实能在短期内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扩大就业，如19世纪末的美国和20世纪50年代的拉美。从长期看，贸易保护一定会损害经济效率。但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任期最多八年，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和放松管制能拉动美国经济，贸易保护带来的损害会得到弥补。

现在对特朗普非常有利的是，美国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保持多数，而且最高法院大法官出现空缺，特朗普可以任命新的大法官，以确保共和党人在最高法院的多数地位。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美国政治的衰败和政府能力的低下主要是因为党争。现在，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将变成三权集中，特朗普施政空间巨大。尽管在贸易、国家安全以及部分社会政策方面，特朗普与传统共和党精英有较大分歧，但这次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靠的是“特朗普效应”，因此很有可能共和党精英会支持他搞贸易保护、在国际问题上收缩，以实现经济振兴，而特朗普会在移民、同性恋婚姻、枪支控制、堕胎等社会政策方面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作为回报。如果特朗普能够连任，他有可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回归共和党传统，采取更加主动的行动。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也是商人出身的共和党人里克·斯科特就说：先振兴经济，有钱以后就可以打伊斯兰国家了。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中国采取如下对策：首先，抓住时间窗口，解决好周边的安全隐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曾评论说，在国际问题上，特朗普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有节制的人，如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他仍然会选择对外干涉。因此，我们就要利用特朗普在第一任内要聚焦国内议题这一时间窗口，综合采取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尽量消除周边的安全隐患，至少要显著抬高未来美国干涉的成本。

其次，在经济和贸易争端上斗而不破。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而且他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是定局，必然会导致双边经贸关系紧张。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会采取单方面、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国内外的利益团体和法律法规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从他的政策主张清单中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以谈判的方式、加强贸易执法的手段，使美国在贸易中获得更“公平”的待遇。即使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坚定的反华学者彼得·纳瓦罗也说，对中国产品全面征收45%的关税只是一种谈判手段，可以迫使中国主动让步，但并不会真的实施。

因此，中国要拿出坚决斗争的态度，特别是在美方理亏的方面，比如特朗普提出要命令美国财政部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但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才是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国一定要拿出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打蛇打七寸，比如制裁“锈带”地区的产业和产品。但在具体问题上是完全可以谈判协商的。特朗普是商人，他善于而且乐于达成交易。比如我们可以在贸易领域做出一定让步，但是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必须向中国企业开放。

再次，积极寻求双方加强合作的可能。特朗普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不像民主党政府那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中美之间一定有互利的、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例如，中国对美投资近年来大幅上涨，对当地就业和税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很受美国地方政府欢迎。中国可

以加大对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应该要求美国给予中国企业更多的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在安全领域，恐怖主义对两国都是巨大的威胁，过去美国民主党政府明显采取了双重标准，现在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最后，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国内经济搞活了，就不用担心国际上的动荡，甚至可以在国际秩序变革中抢得先机。同时坚持互利、包容、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原则，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占领道德制高点，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供地区和全球公共品，并为今后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做好物质、理论和人才准备。

（本文刊登于2016年11月12日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特朗普与亚洲”研讨会侧记

近日，哈佛大学研究亚洲问题的各相关机构联合举办“特朗普与亚洲”研讨会，旨在探讨特朗普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亚洲政策。会议现场异常火爆，可以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走廊和过道都站满了人，甚至一位女士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来听会，充分反映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心。

研讨会共有四位发言嘉宾，分别是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瑟夫·奈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傅高义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郭晨熹（Lynn Kuok）女士，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塔夫茨大学李晟允（Sung-Yoon Lee）教授，会议由哈佛大学日本问题专家苏珊·法尔（Susan Pharr）教授主持。

约瑟夫·奈教授首先发言。对于特朗普未来的亚洲政策，他认为很难判断，因为特朗普在竞选中说的很多话是自相矛盾的，有些话说得非常极端，当选以后又向后退。奈教授说，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系列同盟关系和国际规划基础上的，即所谓的“自由的国际秩序”，美国内部的争论仅限于是否应该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武装干预，但对于这一秩序从来没有动摇过。而特朗普在竞选中质疑了这一秩序，认为盟友做得不够，应该更多地承担自身防卫义务。但奈教授认为，特朗普应该不会摒弃这一体制，和安倍的会面就是一个例证。美日同盟不仅在战略上符合美国利益，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因为在日本维持美军军事基地的成本要比在美国低，并且日本一直以来都支付了大量的相关费用。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很难预测，他在竞选中说了很多强硬的话，但如果真要在经济上制裁中国，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中国不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过去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在多数问题上很好地管控了双边分歧。因此，过去克林顿时期制定的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塑造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的做法是正确的。奈教授说，不要低估人们犯错的能力，如果中美之间再出现类似当年南海撞机这样的意外事故，他担心特朗普的脾气和品性能否有效地化解这样的危机。

傅高义教授认为，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长是一个有经验、可靠和理性的人，也是一个在重要问题上可以劝阻特朗普的人，而提名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则是一个缺乏深度、容易相信阴谋论的人。特朗普与蔡英文的通话不是心血来潮，目前中国大陆的反应是相当温和与理性的，而这次通话的结果很可能给蔡英文带来麻烦。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可能会打“台湾牌”，这可能鼓励台湾地区为“独立”铤而走险。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傅高义教授提出三种可能情景。一、蹒跚前行。中美关系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但仍然能维持现状。特朗普将逐步了解外交政策如何运作，有可能从目前的一些极端立场后退。此外，美国的官僚体系、国内政治以及民主体制都有能力制约极端政策出台。二、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建设性力量。中国成立亚投行、倡导“一带一路”，这些都是例证。亚洲国家很可能不得不调整政策，加强与中国合作，目前菲律宾已经这样做了。三、矛盾激化。如果中国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继续施压，特朗普可能会做出强硬回应，扩大双方直接对抗的风险。当然，也可能爆发重大意外事件，如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等，冲击整个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使中美双边问题处于次要地位。

郭晨熹研究员认为，东盟可以成为避免中美冲突的缓冲带。对于东南亚而言，经济和安全是不可分的。很多国家当时为了能够加入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付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因此，美国退出TPP对东南亚成员国来说是严重打击。另外，特朗普对穆斯林的歧视性态度，不利于美国和东盟关系的改善，因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主要人口都是穆斯林。

李晟允教授认为，朴槿惠下台会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下一届韩国总统很有可能是左派，愿意积极改善和朝鲜的关系。由于朝鲜在拥有核武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遏制，加上美国阻挠韩国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较冷战时期有所下降，在这种环境的刺激下，韩国国内目前出现了发展核武器的意见。特朗普对外交的无知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可能也是一个机会，因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可塑性强。即使他的团队都是强硬派，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当年小布什也很强硬，但最后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李晟允教授还提出，在东亚，经济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杠杆。中韩贸易额已经超过美韩贸易和日韩贸易之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周边国家与中国有紧密的经贸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退出亚洲，这些国家将不得不和中国加强关系。

在问答环节，有听众问：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会否走向孤立主义？奈教授说，美国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反对孤立主义，愿意接受移民。特朗普大选胜利靠的是在中西部三个“锈带”州各不超过10万张的选票，而在整个美国输了250万张选票，所以不要过度解读特朗普大选胜利的含义。傅高义教授说，他来自中西部“锈带”州，有很多朋友投票给特朗普，但这些朋友同样愿意开展国际贸易，并不想封闭。郭晨熹女士说，无论是从国家安全还是经济贸易的角度，特朗普会发现实现“美国优先”很困难，希望他早日意识到这一点并回归亚洲。法尔教授也提出，特朗普家族的生意遍布全世界，他在采取极端政策的时候恐怕也会掂量掂量。

有听众问，特朗普显然是在恫吓中国，中国应该如何反制？傅高义教授说，希望中国能正面回应，如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可以对台湾地区施压，如经济制裁；或者借用国际组织打压。傅高义教授不建议中国和美国直接对抗，因为这会导致更大的冲突。奈教授认为，如果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全面征收45%的关税，中国可以先到世界贸易组织打官司，但这可能旷日持久。中国也可以对美国产品征税，并针对美国企业采取措施。他说，中美经贸关系之间确实有不平衡的地方，但总体上是互利的。具体到地区、产业和企业，美国有部分群体受损，但看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收益，不能只看双边贸易，还应该从全球的视角来看。

总体而言，与会专家对日美关系表示乐观，他们认为安倍很聪明，利用非正式场合成为第一个与特朗普接触的外国领导人，而且成为第一个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首相，日美同盟应该可以继续得以维系。东南亚国家和韩国，对特朗普政府普遍感到焦虑不安，认为中美关系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也认为很难对特朗普未来的举动进行预测。

通过参加此次会议，我产生了几个不成熟的想法。第一，要想进一步了解特朗普的想法和政策思路，需要加强与美国右翼，包括政界、企业界和智库的接触。哈佛大学作为美国最高学府，确实集中了很多优秀的专家学者，但哈佛传统上是美国左翼知识精英的大本营，大选前有不少人还在考虑是否加入未来的希拉里政府。特朗普的胜利对他们打击很大，一是他们对特朗普判断错误，二是对特朗普及其团队不太了解，因此对他们的观点只能姑且听之。

第二，虽然特朗普打的“台湾牌”是一步臭棋，但中国仍然要坚决反击。特朗普并不是真想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无非是漫天要价而已，他在最近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底牌。作为一种谈判技巧，漫天要价可以理解。对于中国而言，贸易、汇率、南海等问题都可以讨价还价，唯独“一个中国”原则是不能讨

价还价的。因此，特朗普及其右翼团队选择台湾问题恫吓中国是打错了算盘。尽管如此，中国仍然要坚决反击，不管特朗普是真疯还是装疯，真傻还是假傻，做错了就要受到惩罚，否则他会得寸进尺。不要怕中美对抗升级，如果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有破产之虞，他自然会退缩。

第三，要加大对美国院外游说集团的投入。游说集团，实际上就是美国政治体制中通过游说这种影响政治决策的合法渠道来表达自己政治经济诉求的团体。外国政府通过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做得最好的就是以色列，台湾当局亦深谙此道。此次蔡英文和特朗普的通话，以及1995年李登辉访美，都离不开美国游说集团的背后运作。此次大选还暴露出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体现在收入分配、医保、种族、移民、堕胎、枪支管理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上。我们也要多多关注和支持反特朗普、反民粹主义的社会组织、智库和媒体，让美国国内问题堆满特朗普在白宫的办公桌，他自然也就顾不上中国了。对于中国来说，资金不是问题，关键是要通过巧妙的方式和渠道，达到目的。

第四，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和对外投资贸易体量优势，在亚太经贸合作领域主动出击。“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美国退出TPP、亚太国家彷徨失措之际，中国应该有所作为，扛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旗。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TPP搞不成了，中国应该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但笔者认为，现在反而是中国加入TPP的有利时机。首先，这是一个现成的机制，比启动一个新机制要容易得多。其次，既然美国退出，中国加入后将成为最大的成员国，加入前有利于中国谈判，加入后有利于中国主导。最后，美国辛辛苦苦搞成TPP，却为中国做了嫁衣，既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打击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本文刊登于2016年12月14日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沿着习主席的足迹访问美国艾奥瓦州

我在美国访学期间，应中爱集团创始人赵丽娟女士、中国之窗集团总裁王骏先生的邀请，沿着习主席当年的足迹，到艾奥瓦州进行访问。

艾奥瓦州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它最出名的有两点：一是该州是美国总统大选党内初选最早开始的州，往往起到大选晴雨表的作用，许多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生涯就取决于此；二是该州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业州，玉米、大豆、猪肉和鸡蛋产量均居美国前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艾奥瓦州，不仅是因为中国是该州农产品的大买家，更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于1985年和2012年两次到这里访问。

考察的第一站是位于麦克斯韦尔镇的金伯利农场，一个当地的小伙子何亚伦陪我一起。农场的主人里克·金伯利先生向我介绍了农场的情况，并回忆了2012年习近平来这里考察的情景。里克告诉我，他的祖先于19世纪50年代从英国来到这里，他已经是第五代了。整个农场耕地面积达到4000英亩，在当地算比较大的。尽管如此，整个农场包括他在内，只有三个全职劳动力，他的儿子会利用假期回来帮忙。种植的农产品就是玉米和大豆，机械化程度很高。他带我看了他的拖拉机，里面都是电子显示屏，确实非常先进。当年习近平也曾经登上驾驶台，详细询问他如何操作。

里克回忆说，当时习近平来考察，就是想了解美国农业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看看能否给中国的农业发展带来启示。从那以后，里克多次访问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农业，并提供一些帮助。

他认为，农业生产的关键是采取先进的技术。他的祖先刚来美国的时候，就从英国进口了更好的马和耕牛，而他祖父是当地第一个买拖拉机的人。现在，他用的技术是“精准种植”，即利用GPS、大数据、自动控制等技术进行播种、施肥和收割，减少浪费，提高效率，有效保护土地肥力和自然环境。

里克告诉我，农业对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要。艾奥瓦州的农产品不仅出口到中国，墨西哥也是重要买家。对于美国新总统当选后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他并不是特别担心。他说，竞选时说的话是一回事，上任以后怎么做是另一回事。他相信，新总统会了解贸易的重要性。

告别里克之后，我来到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市的大使俱乐部，与赵丽娟女士共进午餐。赵女士告诉我，自从习近平访问之后，来这里投资、考察和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果然，我在餐厅里就看见另外两桌中国人，都由当地人陪着。在这里，我遇到俱乐部总裁兼大厨迈克尔·拉瓦尔先生，他是当年艾奥瓦州政府招待习近平官宴的主厨。他愉快地回忆起2014年和一批美国厨师访问中国，并与当地同行切磋的情形，恰巧那年是中美建交35年，他开玩笑说他们开展了“厨师外交”。我说饮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很高兴两国人民又找到一个共同点。

下午，我来到世界粮食奖基金会总部考察。2012年习近平曾在这里出席中美农业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世界粮食奖号称是食品和农业领域的诺贝尔奖，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人诺曼·博洛格博士于1986年设立，每年由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一次，目的是奖励那些“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时任中国农业部部长何康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于1993年、2004年先后获奖。

世界粮食奖基金会总裁肯尼斯·奎恩大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担任过美国驻柬埔寨大使，负责东南亚事

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退休后任现职。在展厅中，我一眼就看到一幅特殊的画作，标题是“两个有趣的故事”。奎恩大使向我介绍了这幅画的来历。

2012年习近平来这里考察的时候，和美国朋友说起他1985年第一次访美的经历。奎恩大使告诉习近平，他本人1980年在艾奥瓦州还接待过以习仲勋同志为团长的中国地方高级领导干部赴美考察团（注：当时担任代表团副团长的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并介绍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习近平听后笑着说：这是两个有趣的故事。受此启发，奎恩大使就请画家创作了以习仲勋同志和习近平访问艾奥瓦州为主题的作品，一年前刚刚完成，标题就是“两个有趣的故事”。

大使先生还特意介绍，这幅画的左上角有个英文词：AMANA。这是当地一个小地方，一批德国移民于19世纪中叶定居于此。他们成立了一个公社，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由全体社民共同拥有，连用餐都在公社食堂一起，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才改造成为股份公司，美国著名的家用电器品牌AMANA就源于此。习仲勋同志一行来艾奥瓦州的时候，曾到此地深入考察和交流。我向奎恩大使建议，下次有机会见到习主席的时候，应该把这幅画带给他看。他回答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奎恩大使对家乡的成就非常自豪。他认为，艾奥瓦州的农业之所以发达，和农村道路的畅通有很大关系，不仅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也方便孩子们上学，而且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他在东南亚担任外交官时，主张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并取得了积极效果。我向他介绍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开展的学生营养午餐项目，他听后称赞不已，并表示中国在减贫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世界粮食奖需要有更多来自中国的提名。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奎恩表示乐观。他认为，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加强合作将造福人类。

他说，未来世界新增人口的三分之一将来自非洲，怎样养活这些人口是一个重大挑战。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充分利用各自在资金、技术和经验方面的优势，与非洲国家一道，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接着，我们来到艾奥瓦州政府大楼。这是一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落成于1886年，也是美国唯一一个有五个圆顶的大楼。中间的圆顶外立面镀了一层23K金，大约每30年都要重新镀一次，所需黄金在两公斤左右。大楼内部的装饰也非常有特色，可惜当天是退伍军人节，政府放假，无缘参观。2012年习近平曾在这里会见艾奥瓦州州长，出席州政府举行的欢迎晚宴并致辞。赵丽娟女士当时也在场。她告诉我，习近平脱稿演讲，风度翩翩，令现场的美国人耳目一新。

到了艾奥瓦州，就不能不去马斯卡廷市。这是一个位于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城市，1985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主席曾来这里考察，并住在当地人家中，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2年，他在百忙之中又专程来这里，看望了当年的老朋友们。他当年住过的房子已经被当地政府命名为“中美友谊屋”，供人参观，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华文化世界行”2016马斯卡廷中国文化周活动在当地一所高中举行。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们表演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引起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参与热情。而高中合唱团的学生们也为大家演唱了一首中文歌曲：《情愿留住永恒的记忆》，这首歌最早由彭丽媛女士提议，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女士作词作曲。优美的歌声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家为学生们的精彩表演热烈鼓掌。

此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中国之窗集团总裁王骏告诉我，他们来马斯卡廷投资已经三年多了。他们希望更多地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并借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总体上，美国中西部地区相对保守和闭塞，据说有将近80%的人没有护照，不要说出国，很多人一辈子连本州都没

有出过。因此，中国之窗集团一开始拓展业务也很困难，好在通过他们的努力，情况已经越来越好。我很钦佩地对他说，你们做的工作很有意义，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有效果。

在后面的活动中，我见到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85年和2012年两次接待习近平访问的莎拉·兰迪女士。莎拉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走到哪里都是焦点。本来我想问她几个问题，结果一上来她就问了我一堆问题。她问我对中美关系怎么看。我说我是乐观派，作为两个大国，双方在政府层面为了国家利益出现争执是很正常的，但这并不影响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莎拉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中国，她认为研究其他文化的意义在于，认识到别人和你不同，你不一定因此要喜欢对方，但认识到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很重要。她说美国也有不少右翼分子对她推动中美关系提出质疑，她说她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她就是要推动中美人民的友好交往。回忆起和习主席交往的经历，她说习主席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非常念旧的人，虽然在平时的新闻报道中感觉习主席很强硬，但他要管理那么大一个国家，不这样怎么行呢？她说，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一定要把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传递给年轻一代。我说是的，年轻人才是我们的未来，现在中国年轻人来美国留学的非常多，下一步我们得让更多的美国年轻人到中国来访问和学习。

不止一个美国朋友曾告诉我，纽约那种地方太都市化、太国际化，而中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这里的人有些淳朴，但也有些保守，他们才是美国文化和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捍卫者。习主席说过，中美友好的大厦需要两国人民共同构建。未来我们推动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不能只盯着美国的大城市和东西海岸，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广大的腹地。这是我第一次来艾奥瓦州，收获和感想非常多，对美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艾奥瓦州又译爱荷华州或衣阿华

州，我个人更喜欢爱荷华这个译法，因为它既有“爱”，又有“华”。愿习主席当年在这里播下的种子，成长为中美友谊的长青之树。

（本文刊登于2016年11月18日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美国物价的高与低

来美国的中国人，常常会有一种美国东西很便宜的感觉，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中国游客每次都大包小包地带东西回国，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从事海外代购业务。有不少人写过相关的文章，比较中美两国的物价水平，近来关于中国制造业成本过高导致中国企业转而投资美国的讨论也非常热烈。笔者利用此次在美国访学的机会，也就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观察与思考。

以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衣食住行为例，同样的产品美国往往要比中国便宜。同样的服装品牌，美国比中国便宜一半甚至更多，这也是中国游客到美国采购的重点。食品当中，美国的粮食作物和肉蛋奶油都比中国便宜，中国也是美国相关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至于住房，纽约市中心房屋均价是1.3万美元/平方米，相当于9万人民币/平方米，与北京二环内的房价差不多。相同品牌的汽车，也是中国比美国贵很多。例如，一辆排量1.8的大众帕萨特，在国内售价为人民币23万左右，在美国是2.3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6万元，豪华品牌汽车的差价更大。汽油售价的差距也是如此。美国普通标号的汽油每加仑2.2美元，相当于人民币每升4.2元，而类似规格的中国92号汽油，价格是每升6.4元左右。

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条“一价定律”，即扣除运输成本之后，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按照汇率折算后价格应该相同，如果价格不同，可能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关税和国内税率的差异。美国的进口关税水平远低于中国，国内虽然有销售税，但没有增值税，而中国不但有增值税，还有奢侈品税。首都机场免税店的很多商品要比美国机场免税店的便宜，说明税收是导致中国某些商品比美国价格

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市场结构不同，美国很多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降低成本，而中国很多产品和服务市场准入门槛高，竞争不充分，产品价格也高。三是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的差异，比如，一些国外普通品牌的产品，被中国消费者视作奢侈品，跨国公司就对同样产品在不同市场实行“差别定价”，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考虑到美国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如果物价还比中国低，那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岂不是太高了？可是深入观察美国社会，也会经常看到美国老百姓的生活十分拮据，很多低收入群体要打两份工才能维持生计，中产阶级也是精打细算过日子。显然，美国也有很多东西是很昂贵的，老百姓也得花很多钱。

比如说，前面提到美国的食品很便宜，但大多数蔬菜和水果比中国贵。这是因为，作为农业大国，美国粮食种植业和畜牧业十分发达，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经营，但蔬菜、水果仍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而美国劳动力价格远远高于中国。同样的道理，外出就餐价格就不低，麦当劳餐厅的巨无霸汉堡价格将近中国价格的两倍，一份快餐价格一般都要在10美元以上。房子的价格是不高，但是美国有房产税，每年要交房产估值的1%～2%，相当于五六十年又买了一套房子。汽车和汽油是很便宜，但乘坐公交车和出租车的费用很贵。波士顿地铁单程票要2.75美元，我从哈佛大学打车去波士顿机场，13公里左右的路程要40美元。这说明，美国真正贵的是服务，因为服务主要是靠人来提供的，而美国的劳动力价格非常高。有一次，我住的地方洗衣机坏了，请维修工来修，20分钟修好，要价140美元。

“一价定律”只适用于可贸易部门，而服务业多数属于不可贸易部门。经济学中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说的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也高，因此其总体物价水平也高。

据笔者观察，美国服务业中最贵的是高等教育和医疗卫生。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的。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2014—2015年度全日制大学每个学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平均为2.1万美元，其中，公立院校每人费用平均为1.6万美元，私立为3.7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自孩子一出生就为其建立“大学储蓄基金”，很多人工作了十几年还在还大学时期的学生贷款，民主党人桑德斯提出上大学不要钱获得了那么多年轻人的支持。

美国的医疗服务也非常昂贵，每年医疗开支占GDP的17%左右，是全世界占比最高的。美国没有政府提供的全民医保，多数人要上商业健康保险。在“奥巴马医改法案”出台之前，有40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医改法案出台以后，虽然未参保人数有所下降，但总体保费出现一定幅度上升，给不少家庭和中小企业带来压力，也是此次美国大选的焦点问题之一。我此次赴美访学四个多月，按照美国国务院规定，所有访问学者都必须购买医疗保险。我选了一个最便宜的产品，也花了将近900美元。

当然，前述讨论没有考虑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异。美国的医疗服务和高等教育非常昂贵，但也是全世界质量最高的，所以仍然有很多外国人来美国看病和留学。反之，中国也有很多物美价廉的产品，很多外国游客和海外华人到了北京也会去秀水和天意市场大肆采购。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但其收入水平高、劳动生产率高、生活水平高，这也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努力的方向。

（本文刊登于2016年12月29日的《中国经济时报》）

在美国坐飞机的体验

近日，微信被美联航粗暴对待乘客的事件刷屏。2016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多次搭乘美国本地航空公司的航班去各地交流考察，美联航、美国航空、达美航空三大航空公司的航班都坐过，确实有一些和国内不同的体验，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美国飞机的上座率很高。无论什么时段，平时还是节假日，我搭乘的大部分航班都是满座，只有少部分情况下会有空余座位。我坐的最空的一次是美国总统大选的那一天，目测飞机上只坐了一半人。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美国当地人，为什么美国飞机的上座率这么高。朋友认为，这是航空公司市场调查和用户需求做得好，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形成的结果。美国的飞机种类多样，大飞机有，一排三人座、四人座的支线飞机也很多，而且有时候在大城市之间也飞这样的支线飞机，估计就是为了保证上座率并降低成本吧。当然，超售机票可能也是上座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幸运的是，这半年我从来没遇到过一次因为超售而需要旅客“自愿”下机的情况。

第二，美国飞机的准点率比较高，我乘坐的航班有时候还提前降落。FLIGHTSTATS网站的统计显示，美国三大航空公司的正点率在80%以上，而中国主要航空公司在70%以下。有一次我坐飞机，正在登机时突然下起大雪，很快窗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以为一定要晚点了，谁知机场马上出动设备，很快把机场的雪清理干净，虽然起飞稍晚了一点，但最终降落是准时的。大家都知道美国包括机场在内的基础设施比较陈旧，比如一架飞机，下飞机乘客和上飞机乘客都使用一个登机口，因此总是显得非常拥挤。但在这种情况下，飞机能保持较高正点率，应该说明其管理水平高。当然我也遇到过两次晚点，而且是严

重晚点，都是在芝加哥机场，也是这次美联航事件的发生地。有中国朋友到美国中部出差，宁肯走美国东部或西部转机也不愿在更近的芝加哥转机，也是因为有过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第三，在美国坐飞机，免费提供的服务很少，这一点让国内旅客很不习惯。比如在机场，行李手推车要钱；托运行李，一件要25美元，所以美国人都是提着小拉杆箱上飞机；上了飞机，吃饭要钱，只有饮料和小吃免费提供；最有意思的是，看飞机上播出的娱乐节目时用的耳机也要钱，好在付钱之后耳机就归自己所有，下次乘坐的时候还可以用。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美国人简直穷疯了，怎么什么都收钱。但是后来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把这些免费服务取消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把机票价格压低吸引乘客，如果你想要这些服务可以付费，这样可以把不同顾客的需求区分出来。

第四，在美国坐飞机真是等级森严，登机的时候最明显。在国内，一般只分两个档次，头等舱、公务舱和高级别的常旅客优先登机，经济舱其次。而美国航空公司根据舱位、常旅客级别把乘客分为五组，按顺序登机。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更有秩序，但因为托运行李收费，乘客都愿意携带拉杆箱，后登机的旅客会发现行李架已经满了。像我这样既不是常旅客，又买便宜机票的人肯定是第五组，登机后往往是坐最后一排。其实我心里也犯过嘀咕，总让我坐最后一排是不是种族歧视啊？不过，看到周围有很多白人我也就不说啥了。此外，老人和带小孩的旅客优先登机，这一点和国内是一样的。但美国有一种做法必须点赞，就是所有现役军人及其家属也可以优先登机，而且排在头等舱之前。在美国，军人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以后有机会我再专门写这方面的文章。

最后，虽然各种服务都要收费，但在美国坐飞机有一个好处，就是手机可以开机，只要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即可。在空中还可以上网，当然要付费。有的航空公司还提供手机版的空中

娱乐系统，即下载相应手机软件之后可以在自己手机上直接观看航空公司的娱乐节目，包括电影电视等，这样用自己的耳机就可以了。

总体感觉上，美国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应该是比较激烈的。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曾说过，他从来不买航空公司的股票，因为美国航空业近百年创造的净利润是零。但2016年以来，他大举买入美国航空股，成为好几家航空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这说明美国航空企业的效益非常好。希望这种效益的提升不是以损害乘客利益为前提的，否则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我建议，等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还是请他们全家体验一下中国的高铁吧。

论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把激励搞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在2016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供给侧改革的理念、思路和一些具体内容也出现在峰会的议程和会后发布的公报中，充分说明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适用性。然而，再好的改革方案，关键还是要靠落实。正确理解并落实和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我们“把激励搞对”。

一、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激励搞对”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针对的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过度依赖总需求管理政策来维持甚至刺激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总需求管理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短期政策，当经济遭受意外冲击造成总需求大幅波动的时候，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反周期工具熨平这一波动是可以增进经济总体福利的。但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特定时期取得的成功使政府迷恋上这一手段，逐步将这一短期政策长期化、临时政策常态化。这就造成两个后果：一是过于关注需求侧，忽略供给侧；二是提升了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自信心和能力，其干预范围日趋扩大，压抑了市场主体自身的发展。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取决于供给侧，尤其是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扩张和质量上的提升。长期使用总需

求管理政策，本身就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而对供给侧的抑制，削弱了对市场主体的激励，造成经济发展动力不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迷信总需求管理政策，并实行繁苛的产业管制，造成70年代经济的“滞胀”现象，后来靠供给侧改革才走出困境。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也是释放了供给侧的活力，才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固然有需求侧扩张乏力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微观主体的激励不足，导致供给侧也出了问题。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使经济重新走上有活力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上。

二、不合理的体制导致错误的激励，错误的激励导致错误的行为

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人都是理性和自利的，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正确的激励导致正确的行为，错误的激励导致错误的行为。例如，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短期内的供给可以看作是固定不变的，但仍然可以通过改变其用途来提升其产出效益。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土地资源并不丰裕，但通过集约方式利用土地或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扩大土地要素的供给仍然是可能的。

在实践中，现有的体制对不同土地用途做了严格划分，对土地流转做出很多限制，使土地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城镇土地属于国有，政府成为土地的唯一卖家。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土地价格一路走高并带动房地产价格上升，造成十分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一方面，高房价和高地价抬升企业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和后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房价泡沫化导致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给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稳定带来风险。同时，社会财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发较大的社会问题。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虽然承包给农民，但个人并不能将其流转。一方面，这限制了土地供

应，阻碍了城市化发展，同时阻碍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农民无法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收益，也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

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囿于各方面压力屡次采取抑制房价的措施，但每次都从需求端着手，采用限购甚至控制土地供应等措施，结果是南辕北辙，越调控房价越高，还造成为获得购房资格而离婚的荒唐现象。如果从供给侧着手，积极扩大土地供应，地价和房价都能得到有效抑制。但政府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原因就是这不符合其利益，缺乏这样做的激励。在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土地出让金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激励通过控制土地供给实现卖地收入最大化。同样的道理，如果投资房地产的回报远远高于投资实业，而且风险和麻烦要少得多，理性的企业家自然会做出这一选择。而居民面对飞涨的房价和相对缩水的存款，也不得不为了获得买房的资格而选择离婚。

可见，是不合理的制度导致错误的激励，错误的激励导致错误的行为和不利的后果。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改变不合理的制度，通过正确的激励，引发正确的行为和有利的结果。如改革央地财政关系，让两者财权事权更加匹配，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不损害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开拓新的收入来源；改革房地产宏观调控思路，由抑制需求改为扩大供给；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允许农村集体用地入市，确权颁证之后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自由流转等。

在劳动力市场，由于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提前到来，劳动要素数量的扩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很小。通过大力投资教育和健康以提升劳动力的质量仍然大有可为。此外，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劳动者本身的福利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特别是要允许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行业、从低劳动生产率地区向高

劳动生产率地区流动。但是，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将农民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户籍制度又抬升了农民落户城市的难度。由于户籍制度与基本公共服务挂钩，大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工作，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既不利于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涌现也不利于未来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可以说政治上不公平，经济上无效率。

尽管计划生育政策正在逐步放宽，但由于育儿成本显著上升和生育观念的改变，目前的效果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却依然没有时间表，原因就在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培养了一批既得利益者，尽管其人数非常少，但为了自身生存而顽强抵抗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且没有有效解决基本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基本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也是地方统筹，人口流入地政府有很强的动机接纳外来劳动人口但不提供公共服务。而且，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只解决了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障碍，但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仍然是被严格禁止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的效益提升和福利改善仍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因此，为了扩大和提升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一是要全面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放弃对人口数量目标的控制，并转向鼓励生育，大力投资教育和健康，以提升人力资本为主要目标，将计生部门职能转变为保障优生优育和人口素质的提升；二是要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脱钩，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中央财政予以保障。考虑到改革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上述改革可以分阶段完成，但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且时间不能太长。

三、政府干预是造成激励扭曲的重要原因

再以资本要素的供给为例。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任务远未完成，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中国虽然有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但资本供给仍然无法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尽管资本相对稀缺，但其使用和配置效率并不高。因为有政府显性或隐性的担保，效益差、回报低的企业和项目往往能以较低的成本拿到资金，而没有政府支持的效益好、回报高的企业和项目却往往要以很高的成本才能拿到资金甚至根本拿不到资金。

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当前存在与经济学基本理论明显不符的若干“悖论”。如经济走势处于下行阶段，但劳动力价格仍然不断上升，资金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原因就在于政府支持的部门对价格不敏感，依然在追求规模扩张，其对劳动和资本的需求对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形成挤出效应，抬高了整体经济的成本，导致上述悖论出现。由于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都不是最优的，长此以往，稀缺的资本被浪费，整个经济不得不通过不断加杠杆来实现有限的增长目标，造成金融风险不断上升。

问题在于，将资金优先分配给政府支持的企业和项目，完全是金融机构在现有激励机制下的理性选择。金融机构本身也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并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没有动力将资金按照效益原则进行分配。要想彻底改变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一是要让政府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干预，在项目和资质审批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将其改造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三是放开市场准入特别是金融市场准入，允许民营企业和民营金融机构自由进入，充分参与竞争。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在这一点，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已经达成共识。我国对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投入连年增加，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当前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决策，比如通过各种产业政策、科技扶持政策、财税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创新和研发活动，影响这些活动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分布，导致出现扭曲行为和不利后果。比如，大规模补贴电动汽车，造成大面积骗补现象，给财政带来巨大损失，也并没有因此使电动汽车行业在技术上出现突破。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赶超心态，每当看到发达国家提出新概念、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开始着急，生怕中国错过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但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是不可预测的，只能在发生以后被确认。第一次工业革命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200年了，到今天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还在争论促成这次革命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连过去的事情都没搞清楚，怎么可能成功地预测未来？如果下一次工业革命是无法预测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押宝式政策可能要打水漂。

尽管如此，我们的政府官员仍然热衷于制定各种规划，搞财政补贴，制定产业目录，出台各种扶持政策，希望中国能够在新技术领域弯道超车，一举赶超发达国家。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曾写道，计划体制下的官员只有少数人是真正相信计划优于市场，多数官员热衷于规划和审批的原因是这些权力可以给他们个人带来好处。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许多权力部门仍然掌握了极大的干预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能力，而且市场经济使官员手中的权力能更好地变现，因此他们往往打着发展经济、鼓励创新等名义制定各种规划和扶持政策，通过设置审批权限等手段设租寻租。

这种扶持政策造成严重的腐败，而且往往是无效的。通过产业扶持政策来促进某些产业的发展，既会扭曲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也会扭曲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一个朝阳产业，即使没有政府扶持，也会有很多企业进入，如果让它们公平竞争，结合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特有的规模优势，完全有可能产生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产品和技术。但是政府一扶持，就会有过多的企业进入，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好企业也无法脱颖而出，反而延误了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时机。现在，产能过剩不但出现在国有企业为主的传统产业，也出现在私人企业为主的新兴产业，不能不说是拜这种扶持政策所赐。

设计不合理的扶持政策还会扭曲对企业的激励，使其把获得政府补贴作为主要目的，而不是真正去搞创新。根据财政部对电动汽车骗补的调查显示，骗补的既有无资质、无技术、无市场的三无企业，也有不少民族汽车行业中的希望之星。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写道，如果私人部门从“寻租”中获得的好处大于从生产中获得的好处，这种激励将指挥其致力于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因此，要想真正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政府应退出在微观层面的决策，特别是要放弃押宝式的扶持和促进政策，让市场自主选择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业布局，并通过公平和充分的竞争产生赢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实际上有很多工作可做。一是要大力投入基础研究。重大的创新和技术进步都是建立在基础理论和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和突破之上，而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一般不会对其投入，必须以政府为主投入。二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不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就无从谈起。三是塑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破坏市场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应通过加强监管来矫正。四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改革教育体系，把培养具有创造力、好奇心、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置于优先位置。换句话说，政府要供给基

础知识、法律保障、市场环境和人才培养，这才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四、推进供给侧改革，本身也需要正确的激励

推进供给侧改革将不可避免地给既得利益者带来巨大损失，如果不树立正确的激励，既得利益者有很强的动机反对或阻挠改革，而改革受益者也可能不会积极地推动改革，从而造成改革的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指出，有很多理论上非常正确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旦运用到贫困国家就失效了，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激励搞对”，使官员们没有动力实施这些政策。

过去一段时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通过简政放权，为政府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什么不能干、干了会得到什么处罚，领导干部们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有许多负面典型在时刻提醒着他们。现在，负面激励已经有了，我们还需要通过正面激励让领导干部们自发地推动改革。否则，官员的选择就是“不作为”。

以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的“去产能”为例。我们现在的做法仍然是通过行政手段施压，而不是让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去产能的主体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由于财政和就业的压力，去产能并不符合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何况谁先去产能谁吃亏。因此，去产能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主体责任，毕竟当初这些过剩的产能也都是中央政府批准的，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将去产能所产生的正溢出效应内部化。中央政府可以宣布对所有失业问题兜底，免去地方的后顾之忧，然后通过干部任免、财政补贴等手段奖励主动去产能的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惩罚那些不主动去产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这样的政策机制

是“激励相容”的，意思是使对方的利益和你一致，对方才会按照你的意愿从事。而且，也只有承担了主要责任，中央政府才会认真反思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或许会下定决心改革投融资体制，甚至彻底放弃相关权力，把决策权还给市场。

因此，只有“把激励搞对”，供给侧改革才能有效推进，并早日产生积极的效果。

（本文收录于滕泰主编，东方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的《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一书）

推进改革需补三个短板

十八届三中全会过去已经两年多时间[注]，各项改革措施不断出台，但总体上推进速度和实施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根据“木桶原理”，一个木桶装水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我们知道，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改革可能也需要补短板。

补认识的短板。“知识信念行动”理论告诉我们，人首先要从认识上发生转变，才会有态度的转变，进而带来行为的转变。只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人们才有可能支持并参与改革。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因此中央提出改革开放，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并激发了他们以无限热情投入到这一事业当中。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速掉到4%以下，再加上苏联和东欧剧变，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被孤立的危险。邓小平同志因此强调，不改革死路一条，在他的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又掀起了新的改革开放高潮。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均收入稳居中上等收入组别。经济增速虽然显著回落，但速度仍然不低。尽管我们强调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但毕竟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在这种情况下，让人们产生改革的紧迫感并不容易，除非我们把道理跟大家讲清楚——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光明的，但这一光明是建立在顺利推进改革的前提下：不改革，没有出路；不改革，前功尽弃；不改革，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遥遥无期。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当前对改革意义的认识短板，才能真正凝聚支持改革的力量。

补能力的短板。和过去相比，改革的难度、复杂性以及外部约束都在上升，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都是全新的挑战。如果说过去我们还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石头已经摸不到了。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四种能力，即领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

其中，领导和谋划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自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我们现在有很多政策，尽管出发点很好，但在决策过程中没有进行科学的论证，也没有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结果政策出台后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老百姓也不买账，最后执行不下去，使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损，导致“塔西陀陷阱”的产生。

正是因为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不断上升，我们在决策过程中才应该更加依靠科学的理论，运用科学的方法，遵循科学的程序。正是因为改革会带来利益的分化和重新分配，我们才应该更加重视决策的民主化，广泛听取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而且，民主决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相互沟通的过程。通过这种沟通，各方意见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每一方都可以了解政府以及其他各方的关切，更容易凝聚共识。因此，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不仅有利于提升改革的领导和谋划能力，对提升推动和落实改革的能力也会发挥积极作用。

补激励的短板。改革本身是一件难度很大、风险也很大的事业，面临着陈旧观念的束缚和固有利益格局的阻碍，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者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的经历就是明证。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可以让坏人干好事，一个差的激励机制可能迫使好人不干事，甚至干坏事。

比如说，对那些锐意改革、敢于担当、取得实绩的干部予以提拔和重用，将其树立为改革典型，不仅可以激励其再接再厉，还可以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激励更多的后来者见贤思齐，而且可以借此发出强烈的信号，展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决心。

因此，在加深对改革的认识、提升改革的能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给改革者正确和充足的激励。激励机制设计得好，甚至可以把改革的反对者转化为改革的同盟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正能量。"

（本文刊登于2016年6月27日的《中国经济时报》）

---

1. 相对于写作本文的时间。

像消灭僵尸一样消灭“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指的是那些长期入不敷出，只能靠政府或银行“输血”才能维持的企业。最早，“僵尸企业”的概念出现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出现了一大批资不抵债的企业，但银行继续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只要它们能够还息，银行账面上的资产还在，就不需要将其作为坏账减记。这些企业因此不需要破产，但也没有能力进行新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只能勉强维持，是为“僵尸企业”。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在三期叠加效应的影响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也出现了相当一批“僵尸企业”。如何处置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涅槃重生的关键。或许，我们可以从僵尸电影中寻找灵感。

电影中的僵尸，也被称为“活死人”，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一种病毒，人感染后会变成僵尸。之后，僵尸成为一个无意识的行尸走肉，只保留强烈的进食本能，往往通过嗅觉和听觉发现其他人类，然后扑上去撕咬，被咬中的人也会变成僵尸，从而造成病毒的不断扩散。随着僵尸越来越多，人类面临被毁灭的危险，只有坚决反击、消灭僵尸，才能存活下去。不过，僵尸很难被杀死。它没有意识、没有感情，不知道什么是疼痛，即使被大卸八块也能动，还想吃人。唯一的办法是爆头，把控制僵尸的大脑中枢神经破坏掉，僵尸才会彻底死亡。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联想到，“僵尸企业”也要进食，僵尸吃的是人，“僵尸企业”吃的是财政补贴、银行贷款以及其他的实物和人力资源。这些宝贵的资金和资源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正常和健康运行的企业，现在却被“僵尸企业”用掉了，实际上挤压了正常企业的生存空

间。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发现，正是因为大量资金投入了低效甚至无效的企业（如“僵尸企业”），才造成了经济下行的同时实际利率却居高不下的怪现象。

而且，正如僵尸会传染一样，“僵尸企业”也会传染。如果让一个健康的企业去兼并重组“僵尸企业”，其结果很可能是健康企业被拖垮、拖死，也变成了“僵尸企业”。而银行持续不断地给“僵尸企业”输血，早晚有一天会变成“僵尸银行”。如果一个地方总是不断地给“僵尸企业”补贴，这个地方的经济早晚也会变成“僵尸经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从“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和积极地处置“僵尸企业”，造成整个经济活力的丧失。

不要和“僵尸企业”讲感情，不管它历史上多么辉煌，做出过多少贡献。电影中不乏这样的情节：有人看到亲朋好友变成了僵尸，因为感情原因不忍下手，结果对方继续感染别人，甚至连自己也被咬而变成僵尸。也不要心存幻想，尝试去挽救“僵尸企业”。从定义上来说，“僵尸企业”是无可挽救的。几乎所有僵尸电影中都设定僵尸是不可逆的，部分作品里确实有人发明了抗体，使人可以对僵尸免疫，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更好地与僵尸斗争，最终目的还是要消灭僵尸。考虑到“僵尸企业”的危害性，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它尽快破产、“入土为安”。

不过，这里面有个难点：如何判断谁是“僵尸企业”？不是所有资不抵债、入不敷出的企业都无法挽救。当遇到一次性或周期性冲击的时候，部分企业也会陷入困境，当前述冲击扭转之后，这些企业仍能恢复活力。如何把这些企业和“僵尸企业”区分开呢？在僵尸电影里，一个人如果被僵尸咬了，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变成僵尸。因此，任何从野外回来的或是身上有伤口的人，都要被隔离观察，如果观察期间没事就是正常人，变成僵尸了那就立即消灭。因此，对疑似“僵

尸企业”也可以考虑设立一个观察期限。如果一个企业长期经营不善，即使行业总体处于景气时也是如此，在经济下行周期的时候更加扭亏无望，可以判定为“僵尸企业”。

如前所述，杀死僵尸必须破坏其大脑中枢神经，控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的中枢神经又是什么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应该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银行暴露坏账的担忧。考虑到处置“僵尸企业”、维护社会稳定和金融稳定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这项工作理应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责任，才能将这一外部性内部化。其原则应该是中央政府负责组织协调，承担总体风险；地方政府和银行负责执行落实，承担个体风险；极端风险由中央政府兜底。对积极处置“僵尸企业”的要奖励，对不积极的要惩罚。只有这样，才能斩断“僵尸企业”的中枢神经，将其彻底消灭。

但是，仅仅消灭“僵尸企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杜绝“僵尸企业”产生的根源。正如僵尸多半都是人类出于狂妄和无知，开展某种违反自然规律的生化实验所制造出来的怪胎，“僵尸企业”也往往是政府不尊重经济规律，对经济运行、产业发展、企业经营过度干预的产物。有鉴于此，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微观层面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将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造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健全社会安全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僵尸企业”周而复始地产生。

（本文刊登于2016年5月30日的《中国经济时报》）

货币政策要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经济主体在微观层面的行为，并作用到经济指标在宏观层面的变化上，宏观调控政策也因此要对这些变化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例如，去产能、去杠杆将造成总需求的萎缩，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要素市场改革将带来总供给的扩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下降和总供给上升意味着物价水平的走低，持续的物价走低可能造成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必须对此做出适应性的调整。

日前，人民银行下调了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全面降准的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力度还应该更大一些。

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进一步宽松，一直以来都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造成的，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依靠货币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政策进行刺激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有可能造成资产价格泡沫。

确实，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是改革开放长时期停滞不前造成的各种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对经济周期性的下行压力视而不见。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始终脆弱而不稳定，各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全球贸易陷入负增长，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美元加息带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这些都给中国经济运行

带来负面影响。中国GDP增速从过去的两位数下降到目前的不到7%，而且仍未企稳，PPI连续47个月负增长，2015年CPI全年增幅为1.4%，远低于年初设定的3%的目标，考虑到GDP平减指数为负，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通缩。

通货紧缩对经济的损害非常大。物价持续走低会使企业推迟生产，居民推迟消费，经济活动萎缩。而且，通货紧缩会导致实际利率上升，借贷成本高企，债务实际余额的上升也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去杠杆化。

现代央行诞生以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应对通胀，因此对通货紧缩的风险认识不足。货币学派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鸿篇巨制《美国货币史》一书中证明，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与美联储当时过紧的货币政策有很大关系。幸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美联储掌舵人伯南克吸取了大萧条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通货紧缩的教训，果断地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避免美国经济再度陷入深渊。

因此，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货币政策是一个有效的反周期政策工具。面对过热的经济和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在2010年11月之后的一年里先后四次加息、六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使得CPI在15个月中就从6.5%下降到1.7%，效果十分显著。如果说“通货膨胀处处是一个货币现象”，那么“通货紧缩也处处是一个货币现象”。面对通缩风险，央行理应采取足够宽松的货币政策。

至于货币政策要不要对资产价格泡沫负责，这确实是一个从理论和政策上都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价格稳定，资产价格泡沫完全可以通过财税、监管等其他政策工具来应对。经济学中的“丁伯根法则”指出，应运用至少N种独立的工具进行配合以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如果让货币政策承担太多的政策目标，最后很可能哪一个都实现不了。

反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人民币汇率贬值以及资本外流。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选项。弗里德曼猜测，美联储之所以在大萧条期间没有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部分原因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维护外部稳定优先于维护内部稳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优先于汇率稳定。考虑到中国目前并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对资本管制和汇率水平做出灵活调整是有一定操作空间的。比如说，可以对短期跨境流动资本开征托宾税等。

即使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汇率贬值，但如果人民币计价的各类资产出现升值，且升值幅度大于汇率贬值幅度，也不一定会导致资本的净外流。关键是宽松的力度要足够大，态度要足够坚决，才能扭转经济下行和人民币资产贬值的预期。建议一次性大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同时利用好2016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国主办G20峰会的契机，加强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进行协调的力度，说服各国同步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美国推迟加息。

总之，供给侧改革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解决短期的周期性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在改革上无所作为，一味地依靠总需求管理政策刺激经济。现在，这样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了。但我们也要避免另一种错误，即用结构性政策工具去解决周期性问题，如为了稳增长，我们不去动货币政策，却削弱去产能、去杠杆的力度，不但延误了改革，也无法改善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期，最终稳定汇率的目标可能也实现不了。正确的政策组合应该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解决好周期性问题的同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换句话说，货币政策要适应供给侧改革，反之则谬。

（本文刊登于2016年3月11日的《中国经济时报》）

财政政策要在供给侧改革中发力

财政政策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总需求管理的主要工具。宏观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认为，当私人部门有效需求不足时，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可以实现经济和就业增长。但过去几十年来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表明，由于财政政策存在一定时滞，货币政策是一个更好的反周期工具。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对供给侧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可以改变商品、服务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进而达到影响资源配置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指出，利用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消除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福利改进是相当有限的，但利用财政政策获得供给侧长期的福利改进还存在巨大潜力。

最近，中国政府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并提出在政策上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恰恰是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

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支出政策，二是税收政策。支出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端，而税收政策短期内影响需求，长期则影响供给。一个更深层次的区别在于，支出政策等于是把微观层面配置资源的权力交给了政府官员，而税收政策则是把决策权交给企业和居民。一方面，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往往低于私人部门；另一方面，政府掌握过多配置资源的权力容易导致寻租活动。例如，2008年面对深不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及时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对于遏制危机蔓延和经济深度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该计

划主要是由支出政策构成，在政府主导的审批制下，造成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和腐败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出现在供给侧，通过财政政策尤其是减税手段降低制度成本，矫正要素扭曲，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扩大有效供给，可以使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轨道。同时，减税也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刺激投资和消费，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的要求。因此，实施以减税为核心的财政政策可以实现稳宏观、促改革的双重目标，这是货币政策以及以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政策所不具备的。

通过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推进供给侧改革，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减税要注重永久性，减少临时性措施。如果仅是临时性减税，微观主体只不过将决策进行跨时的替代，总体效果可能是零。例如，2015年四季度政府出台了临时性的汽车购置税减半的措施，确实刺激了汽车购买，但这很可能透支了未来的消费，一旦该措施到期，汽车购买量可能会下滑。而永久性减税可以形成稳定预期，彻底改变微观主体行为，力度明显更大。二是要注重减税的普惠性，减少特惠性政策。普惠性政策减少扭曲，特惠性政策增加扭曲。要尽量将配置资源的决策权交给企业和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员。三是减税应和财税体制改革并举。永久性减税固然可以刺激微观主体行为，但改变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同样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财税体制改革早已提上议事日程，这次不妨借供给侧改革的东风，和减税措施一同出台。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政策：

降低增值税率。过高的增值税率容易引发避税行为，且不利于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建议一次性下调增值税率2—4个百分点。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发债，此次减税的成本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可以上调地方政府在增值税收入的分成比例，从现在的25%增加到30%~35%。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社会保险费率过高使企业负担过重，且不利于扩大就业。建议一次性下调养老保险缴费比例7个百分点，其中个人缴费下调2个百分点，企业缴费比例下调5个百分点。由此造成的社保基金缺口可以通过划拨国有资本补足。

降低和简化个人所得税，将目前实施的七级超额累进所得税减为四级，取消最低两级和最高一级所得税档次。个体工商户所得由当前的五级减为三级，取消最低两档税收档次。推进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在减轻老百姓税负的同时，让税收制度更加合理、公平。

清理、整顿非税收入，对现有收费项目进行第三方评估，不合理的该清除就清除。对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乱摊派行为要建立惩罚机制，惩罚金额可以达到乱收费数额的数倍以上。

这样的减税力度比较大，应该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考虑到中央政府总体债务水平较低，应该采取发行国债的方式为减税融资。目前我国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不到18%，无论是和其他国家比还是和自身偿付能力比，都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特别是当前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未来有进一步走低的可能，采取债务融资的手段成本低。只要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6.5%以上的增长率，国债利率保持在4%以下，通货膨胀率在1.5%左右，中国政府可以保持每年4%（占GDP的比例）左右的赤字水平，并使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不出现上升，财政风险总体可控。因此，关键还是要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刊登于2016年2月22日的《中国经济时报》）

供给经济学的前世今生

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遭遇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导致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一方面，该理论被认为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该理论无法解释也无力解决滞胀问题。因此，当时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指引西方走出困境。

在这种形势下，以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作为诸多挑战凯恩斯主义正统地位的理论之一，供给学派经济学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只强调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却忽视了对相对价格、经济主体行为和总供给的影响，而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恰恰是供给方面的因素。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采取各种手段提高总供给，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减税。

以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命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形象地说明了供给学派的理论精髓及政策主张。该曲线讲述的是这样一个命题：由于高税率严重抑制了经济活动（使税基大大缩小），一旦进行相当程度的减税，因此而释放出来的经济能力（税基增加）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因减税而增加！

20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为刺激经济曾采取较大幅度的永久性减税措施，规模相当于GDP的2%，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政府预算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基本实现了平衡。尽管肯尼迪政府减税的出发点完全是受凯恩斯主义理论所引导，目的是为了刺激总需求，但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对当时的经济扩张贡献更大，因货币

政策也同时保持扩张，但部分供给主义者却视“肯尼迪减税”后税收收入增长为拉弗曲线的佐证。

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采纳，减税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核心经济政策。里根政府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而且使所得税税收档次的基数与通货膨胀挂钩，大大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为刺激投资，还实行了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企业所得税也被大幅削减。此外，税制整体上得到简化，许多税收特惠被取消，在提高效率和公平的同时，堵塞了税收漏洞。

因此，“里根减税”不仅仅是减税，而且是改革。减税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同样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其真正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带领美国走出滞胀，而是要彻底扭转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恢复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以实现美国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但事实的发展和供给学派的预期有很大出入。由于减税和军费开支的激增，美国财政预算状况显著恶化，赤字占GDP比重达到“二战”后的最高点，国债余额也大幅上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这段时期的增长实际上是典型的凯恩斯式的增长，而拉弗曲线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随后，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先后增税，20世纪90年代美国却实现了预算盈余，因此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认为，“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终于成了一种近乎反面的教材”。

尽管供给学派经济学随着里根政府退出了政策舞台，但其思想和力量并没有消逝。首先，供给学派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由来已久，其理论渊源实际上来自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成本、生产率等供给因素视为增长的源泉，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马丁·费尔德斯坦在1986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中撰文写到，供给主义不过就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思

想，扩大生产能力、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个人创造力。所以费尔德斯坦说，在听说供给学派这个名词之前，包括他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早已是供给主义者了。而在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中，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储蓄、人均资本、技术、人口以及人力资本等供给要素。因此，所谓的供给学派的兴起虽然是在20世纪70年代，但其理论根基早已存在，并一直贯穿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当中。

因此费尔德斯坦认为，供给主义有“新”、“老”之分，像他这样的是“老”供给主义者，大家所熟知的供给学派是“新”供给主义者。两者在政策主张上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在对供给政策的预期和实际效果上。“老”供给主义者认为，减税等激励政策是长期政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起显著作用。而“新”供给主义者对于供给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乐观，认为可以不付出失业代价而降低通货膨胀，减税也不会造成预算赤字，等等。正是由于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使供给学派从理论到实践都给了别人质疑的机会。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新”供给主义的预言与实际不符，就说供给学派的理论是失败的。

而且，供给学派的批评者过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减税政策上。实际上，供给主义反对凯恩斯理论，支持所有提高市场效率、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除减税之外，供给主义者还一致主张缩小政府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放松产业管制以及紧缩货币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除了政府开支因军费增加而没有实质减少之外，其他主张都得到了里根政府的贯彻和实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仅仅因为拉弗曲线没有得到验证就断定供给学派理论失败了，有失片面。

之后，对于供给政策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有一批学者研究税收对资本存量的影响。他们估计，取消资本所得税将使美国资本存量增加35%，总的福利改进相当于

一生消费的1%。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于1990年的计算表明，这等同于降低10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改进的两倍，消除整个美国战后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福利改进的20倍，或是消除美国所有产品市场垄断行为所带来的福利改进的10倍。因此他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确实是一顿很好的“免费午餐”。

另一位诺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则从劳动供给的角度研究了税收的影响。他发现，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包括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率）比主要欧洲国家多50%，而在20世纪70年代情况正好相反，欧洲人工作时间比美国人长。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欧洲劳动供给水平低主要是就业市场僵化的机制造成的，但他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模拟和估计发现，双方工作时间的差异和转变几乎完全可以用税收来解释。在经过“里根减税”之后，美国人劳动收入的边际税率已大大低于欧洲主要国家，因此美国人的总体工作时间有所提升，而欧洲国家下降。如果欧洲国家也采取了与美国相当的税率，其劳动供给也会和美国相近。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曼昆是这样总结财政政策作用的：在短期内，经济是凯恩斯式的，由于经济主体错觉、黏性工资和价格的存在，减税将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和总需求，进而提高国民收入。在长期内，经济是古典式的，宏观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得到纠正，因此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无效，只有通过影响供给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卢卡斯在2003年也明确提出，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防范经济大萧条的学问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利用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消除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福利改进是相当有限的，但利用财政政策获得供给侧的长期福利改进还存在巨大潜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使世界经济避免陷入第二次大萧条，证明了卢卡斯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西方国家普遍债台高筑，通过财政政策改善长期供给侧状况

的努力尚未出现。但我们也要思考，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出现在美国？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时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都高达10%，而现在欧洲没有显著改善，美国失业率却已经降到5%？这之间的差别，是不是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呢？

最近，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加强供给侧改革”，这是对改革精神的回归和深化改革的必然。由于计划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中国改革从一开始的着力点就是要扩大供给。改革使得个人可以多劳多得、发家致富，企业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开放则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理念，亿万中国人的供给潜力得以释放，才有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对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干预明显增多，在宏观层面则过度地刺激总需求来实现增长。结果政府干预多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且无法化解，而政府管制多的行业却有效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刺激总需求收效甚微。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新激发国人创业、就业、创新的热情，再塑中国经济奇迹。

（本文最先刊登于2015年12月26日“比较”微信公众号，后收录于吴敬琏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的《供给侧改革》一书）

推进供给侧改革，政府应避免“父爱主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经济增长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实际数量的增长，即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个是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效率的增长，如生产要素质量的改进（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资本运用新技术），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造成的市场缺陷的减少，或者由于组织变革使市场的不完善得以消除。

诺思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方的崛起正是因为那里出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非常低效率的经济体系，资源严重错配，企业和个人完全没有动力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有限的资源可以流向更有效率、回报更高的地方，高效率的经济增长就出现了。因此，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来源非常重要，只有不断进行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要素效率，经济才会出现增长。中国目前经济增速的放缓，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改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停滞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启了改革进程，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实，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再上台阶。

因此，经济增长从来都来自于供给侧，而且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也是一个长期问题。而需求侧管理是一个短期概念，是伴随着宏观经济学理论出现而产生的。当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巨大的供给过剩时，凯恩斯提出，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可以提升就业和增长。不过凯恩斯强调，他只考虑短期问题，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经过了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的检验之后，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通过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主张及其必要性和有效性，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识。再加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经济迎来了增长的黄金时期，西方政府和学者志得意满，认为已经掌握了经济增长的诀窍。连凯恩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时候也不得不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与宏观经济学同步出现的，是对国民经济活动的统计，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概念的发明。GDP有三种度量方法，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其中，支出法是按照总需求的概念来定义的，包括消费、投资、净出口三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三驾马车”。由于从统计上来说支出法比收入法更可靠，人们主要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指标代替了目标。英文有句谚语：我们度量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we become what we measure）。人们把总需求管理这一短期手段当作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工具，造成了唯GDP论，短期内可能实现了GDP的高增长，但长期内则损害了经济增长。

尽管如此，政府天然都喜欢需求侧管理，因为需求侧管理主要是靠政府直接干预，特别是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实现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使同样是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政府也更倾向于用增加开支的政策，而不是减税。这是因为，增加的开支百分之百可以花掉，而减税给居民带来的部分收入会被储蓄起来，削弱了乘数效应。而且，开支政策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他们可以决定怎么用，给谁用，但减税会将消费和投资决策权交给个人和企业。相比之下，供

给侧的改变是长期的，制度变迁是有成本的，改革的受损者会反对，政府不一定能够从中得利。即使改革成功，效果往往也很难跟政府政绩挂钩。

西方国家长期搞需求侧管理的结果就是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需求侧管理已无法解决问题，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才大行其道。其中，“胀”是通过紧缩货币解决的，而“滞”是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等手段来扩大总供给解决的。

在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因此改革开放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而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放慢了改革步伐，转而频繁使用总需求管理来维持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后果。现在，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非常及时和必要，这是对过去一段时期内过度使用需求侧政策管理手段的反思，也是对改革精神的回归。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国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滞缩”，而不是滞胀，那么供给经济学的药方还管用吗？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而不是简单的采用供给经济学提出的扩大总供给这一药方，是有大智慧的，是充分了解和分析了中国特有的问题之后提出的政策主张。中国特有的问题是什么？是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存在：有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甚至拖累整个经济进入通缩状态；有些行业有效供给不足，满足不了市场需求，逼得中国消费者满世界去购物。在一个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内，局部的产能过剩或是不足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如果因为短期冲击造成比较严重的全面不足或过剩，可以用总需求管理手段来平滑。但中国是一个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还非常多。在相当一部分行业，许多企业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主体，不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运作，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而不是追求利润和效益的增长。在经济总体向好的环境下，这些企业大肆扩张而且得

到了政府的支持，一旦经济向下就陷入困境，但政府又不允许这些企业倒闭，即使亏本也继续生产，导致产能过剩且无法化解。还有很多行业，政府设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提升了企业的开办和经营成本，即使市场需求很旺盛，但有效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刺激总需求对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用。因此中央才提出供给侧改革，对过剩部门要压缩供给，对不足部门要扩大供给。

解决产能过剩，需要标本兼治、长短结合。一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让企业成为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对价格、成本、供需状况敏感，经营不善的该倒闭就倒闭，向产能过剩行业和僵尸企业不计代价输血的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同样如此。二是明确划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政府不再干预产业发展等微观层面的决策，企业投资也不需要经过政府审批。这些举措是治本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明显效果。既然产能过剩绝大部分是政府审批出来的，要想短期内化解产能过剩也要依靠行政手段。就如1998年，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与“压锭”同步进行。

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带来的GDP不是真实的经济增长，维系其存在得不偿失，由此造成的失业问题应一分为二对待。首先，大部分过剩产能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职工数量相对有限。其次，大部分国企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职工是以市场化原则聘用的，经营不善导致失业很正常，许多处于过剩产能行业的大型民营企业也都关门倒闭了。再次，对失业职工的权益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保障。考虑到过剩产能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干预造成的，如果压缩过剩产能导致大面积失业，政府应出台特殊政策予以兜底。

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计划生育制度、教育体制、科技体制、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以及减税、简政放权、降低企业负担，扫清一切不利于创业、就业、创新的制度性障碍，可以有效扩大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创新等生产要素的供给

并提升其使用效率，使企业和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供给侧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至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应由市场决定，政府切忌越俎代庖。任何国家参与国际竞争都需要遵循比较优势，我们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进口我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供给有问题（当然比较优势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再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转换的过程中，一个经济体的主导产业和消费结构都会发生巨大变化，供需结构出现暂时的错配是有可能的。中国经济无疑处于发展阶段的转变之中，当这种阶段的转变稳定之后，错配会通过市场力量得以消除。

因此，基于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的经济体而言，采用供给侧改革，而不是照搬西方供给经济学的概念和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一定不要把供给侧改革变成供给侧管理甚至供给侧计划，让一群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官员替中国13亿多老百姓以及数千万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决定企业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技术生产、谁有资格来生产。政府有时候真的是为企业和老百姓操碎了心，这是计划体制之下长期形成的“父爱主义”的体现。借用微信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有一种冷叫作你妈觉得你冷”。据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务院曾经开会讨论月饼的生产和供应问题，生怕老百姓中秋节吃不上月饼。这是一个供给方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在早已解决。谁解决的呢？市场。如果今天国务院还要为月饼生产开会，那也就别干别的了。

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扫清一切障碍，建立好的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的制度，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在遇到严重的经济波动时采用总需求管理政策应对，然后把微观层面的决策留给企业和消费者自己。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一看到国外有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或消费模式，就着急，就要求政府部门制定规划，财政拿钱，投到相关领域去，造成盲目投资，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而且也不是供给侧改革。如果该行业发展条件不成熟，无利可图，政府再鼓励也没

有用。如果条件成熟且有利可图，企业自己就会进入，无须政府鼓励；如果企业无法进入，这很可能是因为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政府需要做的只是消除障碍。

（本文收录于滕泰、范必等著，东方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供给侧改革》一书）

推进改革需要树立榜样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上指出，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要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着力解决好改革方案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利益调整中的阻力问题、推动改革落实的责任担当问题，把改革落准落细落实，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

笔者认为，上述思路抓住了推进改革的一个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不算少，但从实际落实的情况来看，似乎并没有达到当初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基层改革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因此我们也听到了各种政府不作为的传闻。现在中央给了精神，我们要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基层政府和官员敢于担当、勇于探索、突破阻力、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呢？笔者建议，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树立榜样。

美国好莱坞在2001年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兵临城下》（Enemy at the Gates），讲的是“二战”时期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故事。战役初期，苏军节节败退，士气低落。苏军指挥官问有什么办法提振士气。在听到了一堆馊主意之后，一个年轻的政工干部站出来说：应该树立一个英雄做榜样，向士兵们证明德军是可以被打败的，给他们以希望。后来，苏军树立了年轻的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为榜样，他一个人就干掉了上百个德军，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爱国热情和勇敢战斗的精神。

为什么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榜样可以起到很强的示范作用，让更多的人去学习和效仿。改革是一个风险很大、难度也很大的事业，面临着陈旧观念的束缚和固有利益格局的阻碍。过去一段时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什么不能干、如果干了会有什么处罚，干部们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有许多负面典型在时刻提醒着他们。但是对于什么应该干、干了有什么奖励，似乎不是很清楚。通过树立正面典型，我们可以证明改革是可行的、有效的，改革的经验将得到推广，改革者将得到重用，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万里同志在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当地农民偷偷搞包产到户，这是连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都没有允许的做法。但万里同志顶着压力，支持和推广了这一基层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当时的人们亲切地说：要吃米、找万里。很快，万里同志调中央担任国家农委主任，之后又担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在他的主持下，包产到户规范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全国推广，使中国农村改革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

树立榜样还可以发出强烈的信号，展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决心。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基层政府、普通老百姓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央推进改革的精神和决心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改革的成功需要基层的落实，需要民众的支持，还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通过树立一个榜样，发出明确的信号，可能比无数文件都管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年广九靠炒瓜子发家致富，其品牌“傻子瓜子”家喻户晓。但当时的政策和舆论环境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远没有今天这么宽容。1984年傻子瓜子雇工超过一百人，被认为是剥削，年广九差点被抓起来。邓小平同志对此专门讲话，要放一放、看一看，不要怕。1992年南方谈话的时候，小平同志再次提到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

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年广九对小平同志非常感激，但他也认识到，这个话不是讲给他一个人听的，而是对千千万万个“傻子”说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改革的两个关键时点，通过对傻子瓜子这个典型的表态，发出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明确信号，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鼓励和支持作用。最近，香港商人李嘉诚深陷“撤资”的舆论漩涡。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会发出正确的信号，产生积极的影响；处理不好，则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产生消极的影响。

去哪里找榜样呢？这也是电影《兵临城下》里苏军指挥员问那个年轻政工干部的问题。古人云：“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中国这么大，几个正面典型还找不出来吗？有没有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地方呢？有没有在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和探索的城市呢？有没有将保护自然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成功案例呢？一定有。如果找到的榜样不够理想和完美，我们降低一些要求也行。正如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所说的那样，连马骨头都愿意花重金购买，何愁千里马不来呢？

（本文刊登于2016年10月16日的《中国经济时报》）

明斯基如何分析中国股市

美国有一个不太出名的经济学家叫海曼·明斯基，他建立了一个模型，用来分析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泡沫破裂后引发的金融危机。由于这个模型不是用数学公式写的，而且其隐含着市场并非有效的假设，明斯基的理论始终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不过，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明斯基的理论却情有独钟，在他所著的《金融危机史》一书中，一直用明斯基模型来分析从16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到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历次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家突然发现，明斯基模型对此次危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进而又发现该模型对历次危机都有很好的解释力，这下明斯基想不出名都难。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气惊人得相似。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尽管每次危机的细节不同，但其结构是一样的。现在，他们两位已经作古，但如果用他们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此轮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你一定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明斯基认为，泡沫的产生往往源自于一个外部冲击，这个冲击可能是战争，可能是一项发明创造的广泛应用（如铁路、互联网），也可能是货币政策出人意料的变化，等等。如果这个冲击规模足够大，影响足够广，就会导致人们对宏观经济或者某种资产的预期变得乐观，进而开始大举投资。回忆一下本轮中国股市的外部冲击是什么？当然是2014年11月22日人民银行的降息，这是时隔两年多来的第一次降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使得美国股市走牛，中国投资者对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抱着同样的希望，有人评论说“天下苦秦久矣！”。股

市在短短三周内上涨26%，成交量迅速突破万亿，拉开了牛市的大幕。不过，这一阶段的投资者还是理性的，是根据外部冲击带来的预期变化所进行的合理投资。

明斯基分析，资产价格上升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场，造成价格进一步攀升，这时就产生了正向的连锁反应。身边人的赚钱效应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会使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参与到投机当中。金融机构看到资产价格不断上涨，也逐步放松信贷，降低抵押物的要求，结果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到这一阶段，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并脱离了经济基本面，但多数投资者对此并不介意，他们投资纯粹就是为了资本收益。这时候，泡沫已经吹得很大了。

金德尔伯格说：通货膨胀取决于货币增速，资产价格泡沫取决于信贷增速。和历史上多次泡沫不同，中国这轮牛市是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处于通缩的边缘，货币和信贷政策依然偏紧。但由于融资业务、伞形信托以及场外配资的迅速发展，这轮牛市成为中国股市的第一次“杠杆牛”。股市成交量不仅突破了两万亿，开户总人数也屡创新高，而且80后、90后是主力，据统计有31%的在校大学生炒股，“大众创新”还没实现，“大众炒股”却成为现实。很多人炒股只知道股票代码，连公司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但在牛市之中，这并不妨碍他们赚钱。媒体中充斥着“国家牛市”的报道和对股市创历史新高的预测，这时候，市场情绪已经极度乐观。

那么，泡沫是怎么破灭的呢？这往往又是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这个事件可以小到一个企业的破产，或是某个造假丑闻的揭露，也可以大到国家政策的转变。由于情绪的极度亢奋，多数投资者一开始对这个事件视若无睹，但聪明的内部投资者开始出货。内部投资者指的是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人，他们知道资产的真实情况，知道政策什么时候转向，因此他们总能买在低点、卖在高点，而外部投资者（即多数的普通投资者）则相反。实际上，内部投资者的卖出往往就能构成一

个导致泡沫破灭的事件。当多数投资者突然发现，牛市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装而争相卖出的时候，泡沫就破灭了。

在我看来，这次股市转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5月26日中央汇金公司减持大盘银行股。没有比汇金公司更内部的投资者了，这可是1800点时护盘的定海神针啊！然后是上市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的疯狂减持，仅6月上半月就达到2200亿元，显然这些内部人认为自己公司的股票是不值那么多钱的。当然，货币政策偏紧也是一个原因。特别是有迹象显示下半年经济会企稳，这意味着本轮牛市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转向。在股市开始下跌的时候，有关部门还一个劲地安抚投资者说，经济会向好，让投资者保持信心。殊不知，你越这么说，股市就越下跌。当然，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对杠杆业务的收紧。面对疯狂的股市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监管者予以降温是正确的，但往往事与愿违，发生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这就好比一个活动的主办方一开始怕观众太少，大量免费请人来，结果来的人太多，主办方怕出事，就把一部分人往外赶，结果大家都往门口挤，踩踏就发生了。

对于泡沫破灭之后什么时候见底，明斯基也给出了三个可能性。一、任由价格下跌，直到价格过低，人们愿意再度买入。二、政府限制价格下跌的幅度，关闭交易所，或者终止交易。三、最后贷款人（央行）成功说服市场，表明有足够的资金满足流动性需求。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个选项已经被否决了。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在某些方面有点儿第二、第三条的意思。未来股市如何发展，政策如何演变，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于2015年7月6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有意义的经济总量第一

据世界银行估算，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14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息传来，国内的普遍反应是不以为然。有人认为，中国统计数据有造假嫌疑，而且购买力平价方法本身有缺陷，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水平。还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而且老百姓并没有从增长中得到足够的好处，这样的第一不要也罢。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确实都存在，不论是统计上的还是增长方式上的，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解决。但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的积极意义。

首先，第一肯定比第二好，第二肯定比第七好。由于购买力平价确实不太靠谱，我们就以市场汇率计算的规模来做比较。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总量排世界第七，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预计到今（2014年）年底，中国GDP总量将是日本的两倍。这肯定不是坏事吧？只要中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超过美国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只是时间问题。

其次，总量是由个体构成的，总量的增长是由个体的增长加总得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无数企业和消费者在一定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下，为扩大利润和增进个人福利所做出的选择和采取的行动的集合。

有人说，总量第一不算什么，人均第一才了不起。但由于中国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而人口增长率又很低，GDP总量排名提升一定是人均

GDP不断增长的结果。中国要想实现人均世界第一，必然会先实现总量世界第一，如果总量不第一，人均第一就更遥遥无期了，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再次，经济总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总量的提升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尽管我们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但由于经济总量大，我们可以拿出很少部分的钱做很多高收入国家都做不了的事情。

比如，一艘航母造价200亿美元，国家只要拿出年国民总收入的千分之二就够了，相当于每个中国老百姓交90元人民币。而一些国家，尽管人均GDP是中国的九倍十倍，但由于经济总量太小，根本无力投入这样的大工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富裕小国不得不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结成政治和军事联盟以求保护。

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也是因为我们经济总量大了，对世界的影响也大了，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没有中国参与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经济的不断增长带动了国家财力的增长，使得中国的军费投入也显著增加，部队的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得到大大提升。

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想造航母，可当时国家真拿不出钱。民生投入也是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提出上世纪末要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但直到2012年才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今天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哪个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使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受损。这些问题有的是体制原因造成的，那就需要我们通过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有些问题是发展阶段决定的，那就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比如说，没有工业就没有工业污染，有了工业就有工业污染，这是发展阶段决定的。但有了污染却长期得不到解决，这就是体制问题了。

经济增长不是万能的，唯GDP论更是错误，但经济增长确实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也是万万不能的。不回避存在的问题，也不讳言取得的成绩，这才是面对“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这类新闻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文于2014年5月9日发表于新浪财经专栏）

经济发展不能本末倒置

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发现，我国90%以上的地级市正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有12个省会城市共规划建设55个新城新区，其中一个省会城市要新建13个城区。不仅如此，部分新城新区规划面积逐年增加，例如某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3个新区、5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7.8倍。

大规模造城运动背后的逻辑是，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实际上是误解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城市的扩张是随着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步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都提出，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因此，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用人为的城镇化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种因果倒置的举措，不但不会取得成功，反而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好比一个人看到有钱人都开宝马，就误以为有宝马就可以成为有钱人，于是砸锅卖铁、东拼西凑买了一辆。他会因此变成有钱人吗？当然不会，而且由于超出自身能力和收入水平去消费，他现在的生活质量也会下降。

大规模的造城运动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重要原因，不仅给当地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困难，也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风险。

经常看到有人拿发达国家的经济特征和相关指标来衡量现在的中国，两者之间如果有差距就认为中国的指标不合理，应该通过政策予以修正，似乎不这样做中国就不能成为发达国家。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说中国投资率太高，接近50%，发达国家投资率不到20%，与之相应的是说中国的消费率太低，因此提出中国应该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殊不知，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起飞阶段投资率也很高，现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更新高峰期已过，当然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

因此，消费率升高、投资率下降是一个经济体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步完成后进入发达阶段的结果。那种不考虑经济发展阶段，人为地提升消费和抑制投资的政策，同样是因果倒置，只会使经济发展走弯路。

当然，中国的高投资率中有不合理成分。一方面，很多投资决策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所做，其目标往往是追求规模而不是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存在诸多管制，资本价格被人为压低，变相刺激了投资。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让政府退出市场可以决定的投资领域，并放松金融管制，让资本价格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在这些体制性障碍消除之后，中国的投资率可能会出现下降，但也可能因为私人部门的活力被激发而上升。不管上升还是下降，都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政府无须为此操心。

由于现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城镇化率很可能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但我们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其出发点是提升要素的分配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并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城镇化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很多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高于中国，但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或经济结构不合理，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造成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城镇化。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只有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中国的城镇化才能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本文于2014年5月1日发表于新浪财经专栏）

论开放

G20杭州峰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近日在杭州闭幕。会议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作为东道主，在做好细致周到的接待工作的同时，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版的解决方案，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笔者看来，此次峰会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G20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是G20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转折点。

首先，G20再次确立了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G20峰会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物。随着金融危机逐步退潮，各国携手加强合作的意愿有所减弱，当初承诺的一些改革和政策措施也往往得不到落实，G20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一度受到质疑。但过去一段时期，世界金融市场波动不已，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风险显著上升，各国应对乏力，加强合作共渡难关的愿望再度上升。

杭州峰会中，各方深刻认识到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形势，重申愿意发挥G20的领导力，提出了旨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和措施”的“杭州共识”。峰会发布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为原来各国分散、独立、自愿的行动提供了国家间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层次的保障机制。此外，峰会第一次提出团结一致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意味着G20议题从经济问题延伸到安全问题，为G20未来发展为全球全面治理平台埋下了伏笔。

其次，尽管此次峰会内容丰富，但G20仍然把经济增长置于核心和优先位置。经济增长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经济增长是万万不能的。当

今世界面临的很多挑战，包括一些社会、安全领域的问题，从根源上看仍然是经济增长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造成的。峰会提出要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可以说既立足于当下，又着眼于长远，在短期内为世界经济增长打了一针强心剂，从长期看则是为世界经济增长找到了病根和解决良方，也预示着G20从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平台向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的转变。

再次，峰会再次强调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做出多项具体承诺，以促进更强劲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由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各主要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导致危机加剧，G20历次峰会都注重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增速甚至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拖累了全球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全球化发展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杭州峰会对保护主义做出有力回击，并对产能过剩问题做出部署，无疑是务实和有效的。

最后，杭州峰会彰显中国领导力，中国版解决方案做出巨大贡献。中国是G20创始成员国，但一开始只是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一个对话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候，也是因为得到中国的支持，G20才升格成为领导人峰会。中国成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国后，各方对此高度期待。原因在于G20没有常设的办事和协调机构，因此每一届东道主都会对议题设置产生很大影响。而中国本身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在国内正坚定不移地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并推行中国版的解决方案，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证明，中国在这次峰会中发挥了极其特殊和重要的作用。不仅中国关心和支持的重要议题如可持续发展、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数字经济、反恐等被放入议程，更重要的是，中国关于发展的一些重要理念，如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结构性改革等成为G20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凸显

中国软实力和话语权的提升，也证明中国模式的广泛适用性。此外，中美两国在峰会期间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展现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改善双边关系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雄心和决心。

杭州峰会成果丰硕，但最大的挑战仍在落实。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让“二十国集团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这一点仍然要依靠中国等大国承担起主体责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本文刊登于2016年10月10日的《中国经济时报》）

论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

《比较》2012年第5期《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获得了2015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这篇文章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展开了比较研究，对两次危机爆发的背景、诱因、应对和影响等方面的异同点进行了分析。文章提出，“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而当危机爆发之后，“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又使得“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而且，“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文章所担心的民粹主义已经在全球兴起，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英国脱欧派的胜利，当然还有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的脱颖而出。什么是民粹主义？为什么民粹主义会在全球兴起？民粹主义兴起的后果是什么？本文试着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主张普通民众的权益，相信普罗大众的智慧。民粹主义针对精英主义，认为掌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因此民粹主义者往往都是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民粹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对普通民众不利，对统治精英有利，因此也反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上长期受西方的殖民和压榨，民粹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反西方，这与反精英、反全球化是一致的。

民粹主义一般在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国家会有较大发展。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只有通过选票才有可能改变他们反对的政府和政策。但也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往往会被一些有野心的政治家利用，成为他们谋取个人利益的一种政治手段。这些政治家一般都有较强的个人魅力，总是讲老百姓爱听的话，并做出许多不切实际的承诺以求当选。有意思的是，这些政治家往往本人是民粹主义者所反对的精英中的一员，比如像特朗普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这样的巨富，但他们却能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这或是因为他们的经历能引起民众的共鸣，比如说出身平民却取得了成功；或是因为他们的成功让老百姓认为他们有能力解决问题；或是因为老百姓只是在追星，他们真正反对的不是精英，而是自己不能成为精英。

也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其政策主张只反映当时民众的心理状态和流行观点。民粹主义的政策主张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政治长期被民粹主义左右，20世纪30—40年代右翼民粹主义占上风，而到了50—60年代却是左翼民粹主义占上风，之后又出现过反复。在目前的美国大选中，许多人只关注到了特朗普的崛起，他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表，却忘了美国民主党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左翼民粹主义的代表桑德斯险些把希拉里拉下马。

尽管民粹主义者反对全球化，但并不代表民粹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认为民族利益至上。从这点看，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张更接近。英国脱欧支持者都说要“赢回英国”，和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异曲同工。很多脱欧支持者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他们反对的是移民和难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了威胁，而是他们感觉本民族（种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威胁。左翼政党一般都反对自由贸易，但由于他们坚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却不反对移民。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右翼的保守党有很多人支持脱欧，反而是左翼的工党支持留欧。

二、为什么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

普通民众总认为受到了统治精英的不公正对待，因此民粹主义的土壤永远是存在的。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较好且普通民众能够分享到发展成果的时候，民粹主义不太容易抬头。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好，但普通民众认为自己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的时候，左翼民粹主义容易兴起，对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民众福利的呼声会越来越高，比如新世纪以来油价上涨时期的委内瑞拉。当经济发展不好、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右翼民粹主义更容易占上风，把矛头指向外国人或外部势力，或是国内某个少数族群，国内精英首当其冲，毕竟他们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今天不少发达国家。

但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必然是有什么共同因素在发挥作用。过去40多年来，全世界最主要的共同趋势是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是国内自由化向外的延伸）和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尽管这一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但增长的成果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同一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由于资本的流动性要高于劳动力，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最优配置，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回报率会上升，资本拥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会显著扩大。信息化则意味着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教育的回报会上升，高素质劳动力相对于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1979—2009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美国收入的比重从8%上升到17%，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份额出现了下降。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高收入者受到一定打击，但随后的量化宽松政策使资产价格大幅回升，高收入家庭占总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这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左翼民粹主义的民意基础。

与此同时，精英阶层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视为理所当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曾感叹，他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率比他的秘书还低，遭到了华尔街精英无情的嘲笑：既然觉得税太低，你可以多缴啊！没人拦着你！美国酒店业女大亨利昂娜·赫尔姆斯利曾经不屑一顾地说：我们不缴税，只有小人物才缴税。精英阶层不仅对民众的呼声不闻不问，反而想方设法固化既得利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3年的研究显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向上流动性最差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父母辈是穷人，子女将来有很大的可能性仍然是穷人，“美国梦”早已不在。唯一比美国更差的是英国。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发达国家中的特殊利益集团高度强大和有组织性，使得任何违反他们利益的政策都无法通过。正如《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所指出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

虽然资本的流动性大于劳动，但人的移动始终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一轮全球化中，大量人口从欧洲移民到北美和大洋洲，奠定了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今天的移民和19世纪的移民没有本质不同，都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躲避国内的政治迫害或战乱。和那时候一样，移民的到来确实威胁到了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移民是通过有组织的强大武力征服了原住民，今天的移民中夹杂的恐怖主义活动只是一个附带品。但不管怎样，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构成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崛起的民意基础。

三、民粹主义兴起的后果

从上述分析看，民众的不满是合情合理的，精英的错误也是不能回避的，但民粹主义开出的药方却是错误的。贸易保护、劫富济贫、孤立主义实行起来很痛快，甚至在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一定不利于国家发展。民众希望自己的诉求能够迅速、有效、免于

付出地得到满足，但任何有责任、有担当的政治家都会知道，改变现有的体制是一个长期、深刻、痛苦的过程，而且难度会非常大。只有不择手段的野心家才会轻易地做出承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从历史经验看，民粹主义成为社会主流，其代表人物当选为政治领袖之后，长期实行民粹主义政策将会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导致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萎缩，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容易引发资本外流和投资下降。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会不断深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对此，民粹主义政客会利用这种矛盾，甚至制造矛盾，如把矛头指向外国人或国内某个群体。这样一是转移视线，二是利用民众追求安全稳定的心理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预言，民主制度的最终结局就是民粹政客上台，最后利用社会动荡建立暴君政治，而人们也愿意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很多美国人半开玩笑地预言，特朗普将是最后一任美国总统，并把他比喻成希特勒。

另一种可能性是民粹主义政策不会完全实施，一是因为精英主导的利益集团力量十分强大，会阻挠这些政策的完全实施；二是双方有可能达成妥协，民粹主义政治家保证精英阶层的基本利益，并换取对方的支持，同时精英阶层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在增量部分。例如，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从表面上看是贸易保护，不利于外国产品和外国企业，但已经在拉美投资的外资企业同样得到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得以维持和固化。希特勒当年的支持者以中产阶级和部分工人为主，但实际上在他上台前夕就和德国大资本家达成了妥协，双方互相支持，确保对方利益，后来的发展也确实如此，最终受损的还是普通民众。

在对外政策上，民粹主义的总体倾向是孤立主义。普通老百姓的排外情绪主要是源于他们认为外国产品、外国资本和外国移民对他们的生计造成了威胁，他们不会主动想着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占领

其他国家的市场。因此，民粹主义即使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也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扩张性的。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民粹主义的政策从长期来看注定是失败的，不排除政治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掩盖自己的失误而引发对外冲突。如1982年阿根廷出兵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引发英阿战争。这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在有领土纠纷、历史恩怨和处于战略对峙的国家之间，可能性是存在的。

不过，孤立主义会让自己安全于一时，不会让自己安全于一世，80年前美国已经吃过这个亏。今天，西方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这实际上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如果是防小偷，修围墙会起作用，因为小偷只好去偷下一家。但如果是防仇人，修围墙不会动摇对方报仇的决心，仇人还是会想方设法进来。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将导致全球化倒退、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上升，各国互信合作的基础被削弱，以及国际公共品供给不足，这反而给恐怖主义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以更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如果一些国家能够克服民粹主义的诱惑，实现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其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会得到有效提升，并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中占据有利地位。

（本文刊登于2016年6月28日的“比较”微信公众号）

“一带一路”的成绩、问题与对策

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一年来“一带一路”取得的成绩，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梳理：

一、政府高层频频出访，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达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多次出访“一带一路”国家，并在出访过程中介绍“一带一路”的理念、内容、方针，和这些国家的领导达成了合作共识。到目前为止，已有70多个国家经济体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想与中国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的意愿，已有3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具体的合作协议。

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很大进展。无论是铁路运输、高铁建设、能源管道建设、电力建设，很多项目都已经得到顺利实施和启动。

三、“一带一路”金融支撑基本到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已经正式营业。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正式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提款权篮子。

四、国际产能合作取得一定成绩。中国和20个国家签订了机制化的国际产能合作协议，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战略合作伙伴建立双边合作的基金。

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在“一带一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我们在一些项目实施过程中急于求成，有时候不注重经济效益，很多时候过度依赖政府和政策支持。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有时候过于强调“一带一路”对中国的作用和意义，单纯追求企业的商业利

益，忽略所在国家、民众和当地企业的利益关切。还有，有些国家看到我们这么积极地推进“一带一路”，也愿意参与，但是它自己不肯做贡献，对我们漫天要价。最后一点，不管是“一带一路”沿线，还是区域外的地区性大国，对我们推进“一带一路”仍然是心存疑虑，不配合、不参与甚至下绊子。

出现这些问题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自己在对外沟通、投入方法上有些不到位的地方，比如我们对“一带一路”的概念有很多不同解释，复杂多样，让外人无所适从。另外，我们没有做好利益相关方的分析，从而制定不同的策略。中国参与“一带一路”的有政府、企业、媒体、智库四大主体，他们就是中国参与“一带一路”的四个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参与主体也是政府、企业、民众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主体，但我们过去把工作和关注点只放在这些国家的政府身上，对他们的企业、民众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利益关注不够。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做好“一带一路”的利益相关方分析，搞清楚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利益相关者分析做好以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沟通交流策略和政策，以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目前全球各种挑战日益复杂，国际合作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要先建立利益共同体，让国际社会知道与我们合作可以实现利益，而且利益是共享的。然后，打造责任共同体，鼓励参与国都要出力，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各尽其责，同时建立好合作机制。最终才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首先，我们不要回避中国自己的利益。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君子不言利”，总是讲一些大道理。别人就觉得，越不讲实话背后就越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其实，既然“一带一

路”是中国首倡的，而且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来的国际倡议，肯定在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国际化、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对中国都有很多好处，这个我们不必讳言，应该理直气壮地去讲。“一带一路”首先是经济发展战略，政策的着力点、实施的重点也是经济发展。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和其他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会更加密切，基础设施进一步互联互通，人员往来不断深化。在双边经济不断发展以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巩固是很自然的事情，符合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外交往的基本逻辑和事实。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是什么？要看到，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对经济发展的需求非常强烈，基础设施存在很大短板。正因为如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才能得到他们强烈的回应。我们不光要重视这些国家政府的利益，还要关注他们的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利益，然后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让他们真正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第三，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外国家的利益。本来“一带一路”就不是纯地理概念，它是开放的。一开始因为有互联互通的需求，我们政策实施的项目主要在“一带一路”国家，所以“一带一路”外国家短期内可能享受不到太多利益，但是他们也是有利益可享的。“一带一路”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所有国家都会受益。其实，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我们没有单方面去设定时间表、路线图，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决策机制在里面，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地选择加入方式、合作手段。过去的国际合作体系是大国主导，有一些强制性的、机制性的安排，包容性不够，开放性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我们提出设立亚投行时美国的反对那么强烈。因为美国真正感到威胁的不是通过“一带一路”和这些国家改善了关系，而是中国提出了完全

不同的理念，对它的全球领导力产生了重大挑战。这是“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机制改善做出的巨大贡献。

如何把区域外的国家拉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利益共同体？例如，美国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虽然现在没参加也没表态，但是它的态度和中美关系的互动，肯定会对“一带一路”产生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繁荣稳定肯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很多美国大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有投资的，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当地企业一起合作，才能真正形成最广泛、最全面、各方积极参与和支持的“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

（本文刊登于2016年4月6日“丝路联盟”微信公众号）

西方文明或将再度亡于“蛮族”之手

公元476年，日耳曼蛮族将领奥多塞克废黜了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自立为意大利国王。一个曾创造出璀璨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帝国灭亡了，欧洲也陷入了长达一千年的黑暗之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天毁灭的。在公元二世纪末达到顶峰以后，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内部政争加剧，外部威胁不断，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精英生活腐化，民众贪图安逸。与此同时，民族大迁徙导致以日耳曼人为首的蛮族不断进入帝国的北部边境。为了弥补下降的人口，罗马允许这些难民定居，但双方却因为各种原因不断产生摩擦并导致战争。蛮族不断地涌入，与罗马时而融合，时而斗争，时而联合起来对付其他蛮族。到了后期，西罗马帝国境内已经出现多个独立的蛮族王国，数次攻打并洗劫罗马城。帝国的军权也逐步落入蛮族出身的将领手中，皇帝沦为傀儡，直到最终灭亡。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一直都是西方历史学家深入探究的问题。《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认为，罗马亡于蛮族之手只是表象，根本原因还是来自其内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等多方面原因。但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希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指出，这些内部问题很早就存在，真正的变数还是来自蛮族的入侵，而罗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导致了自身的灭亡。一个强调内因，一个突出外因，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正因为罗马的内部问题多，导致其无法投入足够的资源来处理外部的蛮族问题，而蛮族的不断涌入加剧了罗马内部问题的恶化，使其体制更加无法维持，形成了恶性循环。

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明重新崛起，并称霸世界。但正如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鼎盛的西方文明孕育着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严重消耗了西方内部的力量，导致权力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欧洲国家痛定思痛成立了欧盟，但由于机制上的缺陷，决策效率低，官僚气息重。而且，人口老化和高福利制度，政府债台高筑，经济缺乏活力，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扩大，欧洲老态龙钟。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始终面临着外部威胁。冷战时期是苏联，现在则源自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由来已久，但过去只是在外部威胁西方的利益。但以“9·11”事件为标志，恐怖分子已经把战火烧到了西方国家的本土，外部威胁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内部威胁，2015年的巴黎恐怖袭击只是一个最新例证。西方国家是最富裕的国家，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强大的军队，反恐战争打了那么多年，但为什么消灭不了拿着AK47和自制炸弹的恐怖分子，恐怖活动反而愈演愈烈呢？

首先，这是因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性，其本身就在不断制造新的敌人。西方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征服了很多国家，奴役了很多民族，尽管后来从殖民地撤出，但仍然通过国际规则的制定以及扶植亲西方的政府，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而且，西方认为自己的文明不但是先进的，而且是普世的，总是利用各种手段向其他国家输出自身的文化和体制，如果拒绝就在那些国家推动政权更替。近现代以来，中东地区的乱局基本上都是西方国家一手造成的。你要问一个普通阿拉伯人为什么恨西方，他列出来的单子绝对不比努尔哈赤反明时列出的“七大恨”少。再比如，本来西方国家已经取得了对苏联的冷战胜利，但竟然不断在实力大为削弱的俄罗斯周边搞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生生把俄罗斯逼成了对手。现在，面临崛起的中国，西方国家又在热炒“中国威胁论”，大有再树立一个强敌的架势。

当年的罗马帝国的扩张成性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到公元二世纪其边境线已经基本稳定，但由于历史上多次与周边的蛮族、波斯和帕提亚等国打仗，双方结下的仇恨很深，不安全感都很高，这些国家和民族一旦强大起来首先就要攻击罗马。当西哥特人以难民身份逃到罗马的时候，虽然得到了接纳，却遭受歧视和压榨，这才导致他们的反抗。当蛮族进攻罗马城的时候，打开城门的总是奴隶（罗马后期的奴隶都不是本国公民，多数是被征服民族的俘虏）。因此，罗马的敌人都是罗马自己制造的。正如吉本所说：罗马的失败就源于罗马的成功。

其次，尽管敌人越打越多，但西方并没有找准真正的敌人。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西方仍然在瞄准有组织的敌对势力进行打击。不论是当年的基地组织还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或是今天的伊斯兰国，西方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一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预言的“文明的冲突”。波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费利克斯·科奈克兹尼（Feliks Koneczny）认为，两个生机勃勃的文明比邻而居的时候，一定会为消灭对方而战斗。而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一种文明压倒另一种文明，强行融合只会导致文明的衰败和解体。罗马帝国的边界不仅仅是地理和行政上的边界，也是文明的边界。当蛮族涌入之后，尽管他们可能学会了罗马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加入罗马军队，改信基督教，但他们仍然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最终取代罗马。今天，大量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移民和难民来到了欧洲，但他们来这里是因为经济原因，他们可以拿欧洲国家的护照，但并不想成为西方人，相反，他们很想把西方人改造成像他们一样的人，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愿意为此自杀和杀人。

有人会说，不是还有美国吗？美国经济依然有活力，人口出生率也不低，军事和科技的霸主地位无可动摇，虽然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毕竟远离中东。确实，当初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东罗马帝国还在。东罗马帝国经济更发达，文化更繁荣，再加上地理原因，躲过

了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对于西罗马的困境，东罗马不但见死不救，还经常暗地支持蛮族与西罗马作对。奥多塞克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却奉东罗马帝国皇帝为尊，最后被东罗马皇帝背信弃义地杀害。可惜，东罗马帝国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领土面积不断遭到外敌的蚕食，内部统治也非常混乱，最终被奥斯曼帝国所灭。美国和欧洲会不会重蹈东西罗马帝国的覆辙呢？

美国既然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前面提到的西方所存在的问题，它也都有，只不过程度上与欧洲有差别而已。美国也有移民问题，这些移民有自己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出生率高于美国本土居民，改变美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甚至准备在边境上修建当代的"万里长城"以阻挡非法移民进入。我曾经和一个墨西哥教授讨论这个问题，他耸耸肩告诉我，美国西部和南部大片领土都是从墨西哥抢来的，这是我们夺回领土的一种方式。尽管远离中东，但既然是文明的冲突，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对于恐怖分子而言，美国依然是头号敌人，在全球化条件下，完全可以把战火烧到美国去，只不过难度会大一些而已。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文明就像一个有机体，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一个文明的兴起首先是因为它能有效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其衰落则是因为它丧失了应对内外部问题和挑战的能力。今天的西方文明，仍然在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也很多。如果再不改弦更张，或许有再度亡于蛮族之手的那一天。

（本文于2015年11月17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面对TPP，请保持镇定

2015年国庆长假期间，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这条消息引爆了中国的社交媒体，评论铺天盖地而来，对中国被排斥在外，分析多以悲观结论为主。很多从来没听说过TPP的朋友都来问我：是真的吗？怎么办呢？

我的回答是：请保持镇定。TPP不是一夜之间从天而降，中国对此也不是一无所知、毫无准备。TPP最早由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于2005年发起，到今天已经整整10年。2008年，美国加入并开始主导TPP，明确排斥中国参加。此后，中国政府就开始密切关注其谈判进程，分析对中国的影响，并研究和部署应对之策，有些对策已经开始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首先，中国政府已经几次表态，对TPP持开放态度并乐见其成。TPP涵盖了多个亚太国家，是一个在现有区域贸易体系之上的更大范围、更高标准、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安排，是对日益成长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打击，将对全球贸易体系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尚未参与，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受益者、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对TPP当然乐见其成。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与中国刚刚宣布成立亚投行，某些国家立即跳出来反对而且鼓动别的国家不参加，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中国具备加入TPP的能力，当然这需要一定时间。和传统自由贸易协定（FTA）不同的是，TPP不但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上是更全面的开放，在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和环境保护

等方面也做出了更为具体和严格的规定。实事求是地说，即使中国参加了TPP谈判，目前也难以满足这些要求。但我们回顾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最近发布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就会发现TPP的要求和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精神、方向、原则，甚至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和内容上都非常接近。双边投资协定（BIT），中国已经在和美国谈判，这一建立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基础上的投资协定蓝本，和TPP关于投资自由化方面的规定是基本一致的。我2015年2月在纽约参加的一个中美企业家圆桌会上，亲耳听到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说，如果中美之间能谈成BIT，中国就已经基本符合TPP投资规则的要求。随着各项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政策的陆续出台和落实，中国加入TPP的能力将逐步具备。其实，连越南都能加入TPP，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作为一个仍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进口国，即使不加入TPP，世界各国仍然会和中国做生意，以抓住中国增长带来的机遇。如果中国通过上述努力变得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有什么理由将中国排斥在主要的自由贸易安排之外呢？美国之所以在初始谈判时不让中国参与，是因为它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规则制定权和谈判主导权，而在亚太地区，只有中国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这一地位。现在初始谈判结束，美国尽享规则制定者的利益，现在它要考虑的是怎样运用这些规则来打开中国市场，实现利益最大化。我们想一想，TPP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条款是针对谁的呢？当然是中国。现在TPP成员国中才有几个国有企业？如果不把中国拉入TPP，这条款不白设了吗？

再次，对于TPP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正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TPP对中国短期内的最大影响是贸易转移效应。由于TPP成员之间实行零关税，彼此的贸易成本大幅降低，原来从中国购买的产品可能转向其他TPP国家。为此，中国也加快了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一方面，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争取在更大范围

内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谋求和区域内的贸易伙伴签署FTA，除了美、日、加、墨之外，中国和其他八个PPP成员国均有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历时十年2015年终于成功签署，不得不说是拜TPP的压力所致。此外，中国与韩国2015年也签署了FTA，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FTA谈判也再度启动。动态来看，只要中国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不断提升，无惧任何贸易转移效应。例如，《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曾经描述过一个现象：墨西哥紧挨着美国，和美国同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成员，而中国与美国隔着太平洋，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优惠性贸易安排，但中国对美出口竞争力却远超墨西哥。

最后，TPP确实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动力。对于美国而言，推动TPP确实是一招很漂亮的棋，不仅排除了主要竞争对手中国，而且成功地按照自身意愿和利益改写了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一旦这些规则得到全面推广，中国将再度沦为规则的遵守者和追随者，而不是制定者。造成这一局面，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有一段时间，我们坐享入世红利而不自知，再加上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没有动力推进多边和区域贸易自由化。如上面提到的中澳自贸区和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谈了几轮就因为一些小问题谈不下去了。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面对日益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们也不够积极主动，总指望其他国家来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结果，美国人另起炉灶了。

好在，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大的热情再度启动改革开放。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投行的成立，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怕再做一回国际规则的追随者。本来，通过引入外部约束条件迫使国内改革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成功经验，在当前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再度显现。而且，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

家，规则虽然是别人制定的，但我们完全有能力把规则吃透、用好，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足以证明这一点。

现在，你镇定了吗？

（本文于2015年10月8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以双向开放实现“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

过去30多年来，中国通过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最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对外投资来源地之一。可以说，中国是上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佳，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上升，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显著恶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急需制定和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改善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及逐步实施，将对中国、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跨国的合作倡议，因此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作用更加明显和直接。

第一，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中国的对外开放变得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尽管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伊始就是全面对外开放，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开放重心主要是面向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又是重中之重。从地理方位来说，可以说是以“向东开放”为主。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需要在“向南”、“向西”、“向北”开放上下功夫，形成真正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的作用正在于此。

第二，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提升沿边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促进其发展。过去的“向东开放”，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了率先发展，这是有其经济合理性的，但客观上也造成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不高，经济发展落后，进而带来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一带一路”使中国的开放重点西移，在体制、政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都将会加大对内陆地区的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其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观念和意识的转变，带动其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以更高的水平参与国际竞争。

第三，“一带一路”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广度和深度。除了加强贸易和投资等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之外，“一带一路”还将积极拓展服务贸易、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并着重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信息和知识共享、人文交流与民心沟通等领域加大投入，为中国对外开放注入了新的内涵，全面提升了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

第四，“一带一路”为树立开放、务实、包容、共赢的国际合作模式树立了典范。“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沿线国家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这和一些排他性的国际合作机制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带一路”不刻意追求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不单方面设立时间表、路线图，而是从项目合作出发，逐步夯实合作基础，沿线国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选择加入的时间、领域和方式，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者，坚持平等合作的原则，在积极主动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和作用，力争实现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逐步推进，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领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当前复杂困难的国际环境下，“一带一路”

的建设也将成为各国通过开放、合作、共赢，实现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的新的推动力量。

以“一带一路”引领我国未来的对外开放战略，仍然要坚持过去对外开放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那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但是，目前在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中，我们更多的是听到如何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等，政策建议也更多的是从这些角度出发去设计。换句话说，我们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如何“走出去”、利用国内资源、开发国外市场，对如何“引进来”、利用外部资源、开发国内市场谈得较少。

当然，强调“走出去”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刚刚打开，我们急需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知识和资金来发展自己，同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资金的积累以及竞争力的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要求凸显，“走出去”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在刚刚公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榜单上，中国有106家企业入围，数量上仅次于美国的128家，但从很多指标上来看，中国企业“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国际化程度不高。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接近甚至超过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这是中国经济成熟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上升的重要标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上与中国有紧密联系，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中国企业努力寻求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机会，积极开拓当地市场，既符合国家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也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支撑，同时也反映出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然而，只强调“走出去”是不够的。尽管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可以给东道国带来就业、税收和资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在很多地方，人们认为中国企业攫取了资源，破坏了

环境，大量倾销廉价产品导致当地企业倒闭等，好处都被中国人得到了。特别是，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大量投资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的一些重大项目，沿线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这个倡议心存疑虑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外输出中国价值观，就更是一个敏感问题。毫无疑问，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可以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中国和平崛起塑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并助推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但在任何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都是一个受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使中国文化能顺利地走出去，我们采取的方式不能太直接、太明显、太高调，而应该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接受。

除了在方式方法上更加讲究技巧、更加关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关切之外，我们必须让别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一带一路”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倡议。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将从中得到的好处，但一定要让其他国家也能从中受益，并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

中国有两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我们在要求其他国家对我们开放的同时，必须加大自身的开放力度。具体而言，我们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向其他国家的资金和产品开放国内市场；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也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是单方面的要求别人向我们开放，“一带一路”是走不远的。只有双向和相互的开放，才能真正实现“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

首先，我们应加快与沿线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国产品打开市场的同时，积极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65个“一带一路”国家中，有50个和中国双边贸易处于逆差状态。中国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制造业有较强的竞争力，适当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

扩大进口不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压力。例如，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超过12年[注]，进展缓慢。考虑到这些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应克服国内阻力，尽快达成协议。对于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注]，我们要积极响应，采取主动策略，尽快促成。对于其他国家，如中亚、南亚、东欧的沿线国家，我们也要积极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为未来启动相关谈判打下基础。对于部分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可以单方面减免其进口产品关税，为这些国家扩大对华出口打开方便之门。

其次，有侧重地支持中国产业走出去，同时采取措施扩大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与其鼓励中国企业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领域对外投资，不如鼓励那些有助于提升东道国出口能力、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的投资，这样更有利于当地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可持续，中国投资带来的好处就更明显。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不多，而且集中在少数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依然保持中速增长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市场机遇和潜力巨大，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希望分享中国增长带来的机遇，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应该优先考虑“一带一路”国家。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推广活动，对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进一步提供服务、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在投资审批、企业注册等环节上提供便利，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设立专门的产业园区，加强与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合作，扩大资本市场对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开放力度等。

再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人文领域的双向交流。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认真研究、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基本国情。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确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佼佼者，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向别人学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卫生、科技、

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经验和成就，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我们想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就可以借鉴印度是怎样把“宝莱坞”打入“好莱坞”的。我们可以在旅游、文化、体育、智库等领域加强合作，为从事上述领域工作的沿线国家人员来华交流提供便利，鼓励中国学者、学生到这些国家访问、学习。中国已经宣布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那么我们完全也应该每年向中国留学生提供1万个去这些国家学习的奖学金名额。这样一方面为国内培养了大批了解沿线国家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可以提供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经验和多样文化的机会，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交往，真正实现“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奠定民意基础。

（本文刊登于2015年8月“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第一届年会会刊）

---

1.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是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简称海湾合作委员会或海合会。海合会成立于1981年5月，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成员国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
2.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即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若RCEP谈成，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自由贸易打败了拿破仑

200年前的今天（6月18日），在一个叫滑铁卢的地方，拿破仑带领的法军被反法联军击败，欧洲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黯然退场。不过，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拿破仑的失败实际上始于1812年对俄国的远征。当时，拿破仑集结全欧洲60万大军入侵俄国。俄军实行避实击虚、坚壁清野的战略，利用广袤的国土和严寒的冬天活活把法军拖垮、拖死，侵略者最后活下来的不到10万人。拿破仑最终失败的结局因此注定。

问题是，拿破仑为什么要远征俄国呢？毕竟，当时整个欧洲大陆都已经臣服在他脚下，如果他能巩固已有成果，不轻启战端，法兰西第一帝国或许会延续至今，而欧洲人恐怕都要讲法语了。原来，法俄之所以开战，是因为俄国恢复了与英国的正常贸易往来，从而打破了拿破仑建立的、旨在对英国实行经济绞杀的“大陆封锁”体系（Continental System）。自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一直都是反法同盟的主力，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源源不断地给欧洲列强输血，使得每次反法同盟都可以在失败之后迅速卷土重来。尽管拿破仑在欧洲大陆上已无敌手，但只要英国不屈服，他的统治是不稳固的。由于英国海军具有压倒性优势，跨海进攻英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拿破仑于1806年建立了“大陆封锁”体系，强令欧洲所有国家都不得和英国进行贸易，力图从经济上搞垮英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贸易一直是其财富的主要来源和生命线。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物美价廉的制成品行销全欧洲。同时，它把来自新世界的各种特产如烟草、蔗糖输往欧洲大陆，

并从欧洲大陆输入粮食和原材料。应该说，大陆封锁确实给英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困难。英国对欧出口显著下滑，部分企业破产、工资下降、工时缩短。粮食进口减少，价格上涨，再加上有几年国内农业歉收，英国局部甚至出现了饥荒。但英国并没有屈服，它一方面利用强大的皇家海军反封锁法国，另一方面积极开拓美洲、亚洲等新兴市场，取得了巨大成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贝蒂·俄林详细研究了大陆封锁体系之后认为，封锁只是增加了英国经济的波动，但没有对英国经济的发展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

相比之下，大陆封锁体系却越来越难以维系。封锁给法国自己也带来了很大损失，尤其是和贸易、航运相关的行业。老百姓的生活也受到影响，如糖价在几年间上涨了数倍。法国的关税收入锐减，1809年的关税收入只有1807年的1/6。为了得到英国的黄金，拿破仑也不得不一度放松法国粮食出口到英国。而走私活动的猖獗，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封锁的力度。贸易本来就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封锁导致其利润暴涨，即使有再大的风险，商人们也趋之若鹜。连拿破仑的弟弟路易当了荷兰国王之后，也允许荷兰商人向英国走私。

那些和英国经贸关系密切、特别是依赖英国市场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英国一直都是俄国和东欧国家农产品和木材的主要出口市场以及工业制成品来源地。例如，1804年彼得堡35%的进口和63%的出口是英国商人完成的。大陆封锁给俄国造成巨大损失。地处欧洲西南边陲的小国葡萄牙和英国经贸关系紧密（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解释比较优势理论的时候，用的就是英国和葡萄牙贸易的例子），是欧洲大陆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大陆封锁体系的国家，结果遭到法国入侵和镇压，但葡萄牙王室逃到巴西，继续抵抗。封锁的难点在于，要想有效果，就不能有一丝的漏洞。为了控制西班牙的港口，法国又赶走了西班牙王室。这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英国也派出远征军支援，使得30万法军精锐部队深陷在伊比

利亚半岛，埋下了拿破仑失败的伏笔。当然，致命的一击是俄国退出大陆封锁，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和拿破仑最终的失败。

显然，拿破仑对于贸易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贸易从来都是双向的，而且是互利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是人类社会所共有且特有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尽管经济学流派和理论众多，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贸易的互利性。拿破仑以为英国是贸易大国特别是出口大国，卡住了英国的工业品出口和转口贸易，英国经济就崩溃了，但是他没有看到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从进口中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斯密也说过，“在一个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由于封锁，巴黎的糖价是伦敦的六倍，老百姓对此不满，拿破仑曾不屑地说：有人竟认为欧洲的命运取决于一桶糖！但结果还真是这样。

贸易封锁给英国造成的损失有多大，给欧洲造成的损失就有多大。如果说法国的损失还可以通过对其他国家横征暴敛或指望最终战胜英国来弥补，那么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则完全是净损失。如果损失大到一定程度，那么宁肯和当时最强大的法国兵戎相见，也要捍卫自由贸易的权利。19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曾经说过：如果商品不能跨越边界，那么军队就会跨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二战”初期的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第四条就明确提出：“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这说明，当时的英美两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贸易壁垒是导致“二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战后必须建立自由贸易体系。后来的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都是依据这一原则建立的，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见，贸易封锁、贸易禁运、打贸易战都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而且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在200年前国与国贸易往来还不是很密切的时候尚且如此，在今天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候就更是这样。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美国极力要制裁俄罗斯，因为美俄贸易仅占美国贸易额的1%。但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贸易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反对严厉制裁。最终的结果是隔靴搔痒，俄罗斯所失与所得相比不值一提。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50多年，尽管双方的经济体量悬殊，也给古巴带来了很多困难，但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近终于决定和古巴恢复正常关系。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国家曾经对中国实行禁运，但仍然无法实现全面封锁。首先，香港就留了一个口子，很多物资通过香港进口运到了朝鲜前线。其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和我们进行正常的贸易。再次，部分西方国家及其企业愿意和中国做生意，我们借此引进了不少先进技术和设备，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较少，其他国家封锁我们也不觉得有多大损失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是“世界工厂”和主要资源产品的第一大进口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谁还能封锁中国？谁又愿意封锁中国？退一万步说，有人利用海上优势在东面成功地对我们进行了封锁，但如果我们通过“一带一路”，把向北、向西、向南的通道全部打通，那么这种封锁就将毫无意义，因此就更加不可能发生。

越开放，才越安全；越封闭，就越危险。拿破仑遭遇了滑铁卢，但实际上是败给了自由贸易。

（本文于2015年6月18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打不过中国，就加入中国

3月31号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申请截止日期。根据最新统计，共有46个国家提交了创始成员国意向申请，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4个，世界前10大经济体中的8个，代表新兴大国的所有金砖国家。还有很多国家正在考虑加入。这样的发展势头，超出了中国最乐观的预期。一个星期以前，中国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还表示，预计创始成员国可以达到35个，而事实上达到了46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积极申请加入一个全新的、由中国倡议发起的、以投资亚洲基础设施为主要目的的多边机构呢？借用前一阵解释中国A股暴涨时常说的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

众所周知，美国主导的、所谓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框架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诞生于70年前“二战”结束之际，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就拿现有的几个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来说，世界银行以减贫为主要宗旨，可有多少贫困人口是因为世界银行的项目脱贫的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维护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为己任，可哪次金融危机被成功预测并防范到了呢？而且，当发展中国家试图采取相应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危机的时候，却常常受到IMF的制止甚至惩罚，仅仅因为这些政策不符合所谓的宏观审慎或者市场经济原则。但当发达国家遇到金融危机采取相同政策的时候，IMF却大开绿灯。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发放贷款才100亿美元，与亚洲国家数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许多发达国家都强烈呼吁改革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随后的世界银行和IMF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为了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的份额，欧洲发达国家让出了自己的部分份额，而美国仍然保持着一家独大、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即使是这样，IMF改革方案仍被美国国会否决，至今未能通过。

当前，世界经济依然低迷，全球化停滞不前，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信息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现有的机制不彰，美国的领导力在下降，各国对现状的不满、对变革的期待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才会出现中国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局面。尽管有美国的公开而强烈的反对，美国的盟友仍纷纷选择加入，连其最坚定的盟友日本也动摇了。

美国之所以选择不加入亚投行并强烈反对其盟友加入，是因为它敏锐地意识到，亚投行的成立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首先，亚投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绕过现有治理体系、另起炉灶的一个重要尝试，美国即使加入也不可能拥有主导权。其次，各国的踊跃加入，特别是美国盟友的加入，以及其他多边机构纷纷表示加强合作的意愿，将使亚投行这一新生机构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更加稳固，并可以更好地获得成功运行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亚投行越成功，美国主导的现行体系和现有机构的影响力就越会下降。再次，尽管亚投行将借鉴现有多边机构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好做法，但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上可能创新出一套新的规则和标准。如果照搬现行机构的做法，另起炉灶还有什么意义呢？规则制定权的丧失，才是美国最担心的。这就是为什么当美国解释不加入亚投行的理由时，也是拿规则和标准说事儿。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把亚投行扼杀于萌芽之中，如果扼杀不了，就让它做不起来、做不大。但正如上面所分析

的，随着众多国家纷纷加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美国反而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假如美国真盼着亚投行失败，在里面捣乱也比在外面干着急强。按照目前的设想，亚投行将给亚洲国家留75%的份额，给非亚洲国家留25%的份额。如果我们浏览一下目前报名参加亚投行的名单就会发现，无论是以人均GDP还是GDP总量来衡量，美国的盟友将占据非亚洲国家绝大部分份额。而亚洲国家当中，如果日本也加入进来，美国的盟友就将占据很大份额。不论是维护自身利益，还是搅局，他们都是不能小觑的力量。

不过，中国也不怕别人捣乱。中国倡议并发起成立亚投行，主观上并没有想挑战谁、颠覆谁。中国这么做，一是符合自身利益，为本国的资金寻求更好的回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为和平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符合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大家对于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有强烈的需求，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底牌，也是亚投行未来成功的基础。何况，如果真的有人把亚投行搅和得没法有效运转，别忘了中国还有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呢！大不了把那两个机构做大做强就行了，一样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英文中有句俗语：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意思是不能逆潮流而行，应顺势而为。开放、合作、共赢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封闭、吃独食和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当年中国曾长期游离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吃了不少亏，最终选择了加入。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学习，到熟练掌握，到今天成为国际规则制定者之一，这才是行王道！现在，在亚投行的问题上，美国既然打不过中国，不如就加入中国以及其他45个国家，一起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吧！

（本文于2015年4月1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油价下跌与资源之赌

近期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出乎多数人的预料。仅仅六年前，油价还创出了147美元一桶的历史高位，尽管后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油价曾一度跌破40美元，但很快又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回升。事实上，以年度平均价计算，过去三年油价均在100美元以上，属于历史最高水平。对于油价在短短几个月内暴跌50%，很多人都不适应，于是各种阴谋论出台了。有的说油价下跌是美国的阴谋，目的是要打击俄罗斯。有的说油价下跌是沙特阿拉伯的阴谋，目的是要打击美国的页岩油。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端着历史规律的望远镜来看问题。回顾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原油价格已经经历过几轮大起大落了。20世纪70年代，油价从每桶2美元上涨到40美元，然后一路下跌到1986年的8美元。1991年由于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油价又回升到40美元，然后到1998年又跌到10美元。之后油价一直低位徘徊，从2003年起开始攀升，直到创出147美元的历史新高。可以看出，前两次下跌，低点和高点时间间隔都在六七年，跌幅在75%~80%。这次下跌，距离2008年高点已经过去6年，而跌幅只有60%多。从这个角度看，油价可能还没跌到位。

油价为什么会大跌呢？尽管石油是一种战略物资，尽管其资源分布极为不均且集中于少数地缘政治不稳定地区，尽管部分产油国联合起来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并以调整产量为主要手段试图掌握国际石油的定价权，但同所有商品一样，石油的价格归根结底是由其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

20世纪70年代，油价上涨了20倍，其他大宗商品如农产品、贵金属、工业金属价格也都大幅上涨，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大冲击。恰好此时，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很多人都认为，能源资源即将枯竭，其价格将持续上涨，甚至西方文明都会因此终结。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曾经忧心忡忡地说，除非美国大幅削减石油消费量，否则10年内美国将无法从任何国家获得石油。著名生物和环境学家、《人口爆炸》一书的作者保罗·埃里希甚至愿意和别人按一比一的赔率打赌，到2000年的时候英国将不复存在。

这时候，一个叫朱利安·西蒙的经济学家站出来了。他愿意和埃里希打赌，由对方选择任何五种资源产品，赌这五种产品到1990年时的价格将低于1980年的水平。埃里希接受了这一赌注，并选择了五种资源产品，他认为随着资源逐步枯竭这些产品价格将大幅上涨。这就是著名的“资源之赌”。

最后的结果是西蒙赢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所有大宗商品基本上都大幅下跌，而且跌势持续到90年代。西蒙赢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随着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人们一定会加大开发力度，发展节能技术，并寻找其替代品，最后必然导致其价格的下跌。

油价上涨带来的结果也是一样。日本的原油进口依存度高达99%，在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大力发展节能技术，后来其石油消费量长期都是负增长。新世纪以来油价大幅上涨之后，很多人都说廉价石油的时代结束了，油价将涨到200美元，甚至300美元一桶，殊不知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美国的岩页油气革命就悄然发生了，而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随着供求形势逆转，油价下跌也就不足为奇了。

反过来说，如果油价持续低迷，对新油田的开发，对节能技术和新能源的投入就会减少甚至被束之高阁，而消费者和石油下游产业也

会采取更加耗能的生活和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本轮油价下跌是否已见底，但已经有人预言高油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大多数人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并因此做出相应的消费和投资决策的时候，油价离新一轮上涨也就不远了。

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和规律所在，而违背这一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惩罚的。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10年前的中航油事件？当时油价已经低迷了十几年，刚刚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中航油新加坡负责人认为油价已经过高，擅自决定做空，而且随着油价上涨不断加大做空力度，最后爆仓了，不仅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损失，自己也身陷囹圄。

再以铁矿石为例。铁矿石供应的集中度比石油还高，基本上由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三大矿业公司控制，他们的谈判能力显然很强。新世纪以来，铁矿石价格大涨使中国钢铁企业吃了不小的亏，媒体和公众普遍质疑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钢铁企业那样和三大矿业公司签订长期供货合同？殊不知，20世纪90年代铁矿石价格低迷的时候，这些矿业公司曾经求着中国钢企签订长期合同，他们不求赚钱，只要能保本维持矿山运转就行。可我们的钢铁企业很干脆地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铁矿石价格还要跌。后来铁矿石价格暴涨，中国钢企满世界找矿买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结果怎么样呢？铁矿石价格又暴跌了。

可惜，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很多人就是不接受，他们总要想出各种复杂的故事来解释价格的变动，比如阴谋论。10年前油价上涨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美国的阴谋，目的是要打击中国经济。现在油价下跌了，他们说这还是美国的阴谋，目的是要打击俄罗斯经济。

确实，由于原油的供应和需求在国家之间高度不均衡，每次油价大涨，都意味着巨量财富从石油进口国转向石油出口国，油价大跌则

相反。10年前，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增长迅速，但仍仅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2004—2008年，油价每桶平均上涨60美元，美国因此每年多支出270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名义GDP增幅的55%；而中国每年因此多支出667亿美元，相当于每年名义GDP增幅的13%。因此，不论是从绝对还是相对的指标来看，油价上涨对美国的损害远远大于中国。中国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增长时期，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更不用说油价上涨挽救了陷于困境的俄罗斯，使其重新崛起，并成为美国的有力对手。

现在，中国原油进口量即将超过美国，经济增速也下来了，油价大跌简直就是给中国送的价值上千亿美元的大礼包。相反，油价继续下跌可能会造成美国所谓的“页岩气革命”夭折，建立在低能源价格之上的“再工业化”恐怕也会成为泡影。真不知道美国负责制定阴谋的究竟是什么人？不会是咱们的余则成同志吧？

当然，油价下跌肯定会对俄罗斯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当年油价上涨给其带来了巨大红利一样。在应对油价涨跌方面，部分中东石油生产国做得比较好，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油价大跌和90年代的低迷之后，这些国家吸取了教训：一是在生产和定价方面加强协调，减少以前互相拆台的做法，而且重视和主要石油进口国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二是积谷防饥，把石油收益的一部分储存起来，做多元化的长期投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地花掉。如果其他产油国，包括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仅仅因为油价的再度下跌经济就垮了，那他们谁也赖不了，只能赖自己。

（本文于2014年12月23日发表于新浪财经专栏）

如何更有效地输出中华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软实力建设方面还比较滞后。一个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文化和价值观的感召力、国家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三力所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就是软实力。这种影响力如果运用得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一国的外部环境，提升其国际地位。按照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划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分为三种：政治软实力、外交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指的就是一个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而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资源恰恰是非常丰富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有效地将其输出出去。

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让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多种方式，包括对外公关和宣传、对外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产品的出口。不同于一般商品，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具有商业价值，还传播并建构着文化价值。消费文化产品的过程，除了享受其物理功能之外，还能享受其文化功能。扩大文化产品出口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三个更为显著的优势。

首先，文化产品出口覆盖的群体更广泛、更大众。中国的文化商品和服务，特别是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包罗万象，被销售到世界各地，其购买者既有社会精英也有普通民众。而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本身受制于经费和内容的限制，只能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受众非常有限。

其次，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方式更加隐蔽，更容易被对方接受。在任何国家，文化安全都受到高度重视。因此，让中华文化走出去需

要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喋喋不休地说教和宣传很可能适得其反。例如，2011年初在美国时代广场播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因为我们过去太缺乏对自身的宣传。但宣传片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据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扫描（BBC-Globe Scan）的调查显示，广告播出后，对中国持好感的美国人从29%上升至36%，上升7个百分点；而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者，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51%。相比之下，文化出口意味着外国消费者是自己心甘情愿花钱购买的文化商品和服务，说明对方存在这个需求，而且掏了钱就会更加珍惜。这显然和强迫对方消费（哪怕是免费的）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再次，文化产品出口可以在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同时获得经济效益，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双提升。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同时，我们获得了销售收入，增强了我国文化企业的发展能力。而且，为了打开国际市场，我们必然要学习和参考国际通行的、有效的、先进的市场营销、管理和技术手段，反过来也可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促进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例如，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大的军事、科技和经济等硬实力之上，也建立在其文化软实力之上，建立在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麦当劳等蕴含着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价值观的出口产品上。在绝大多数美国大片中，处处体现着美国式生活的舒适与便捷，宣扬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和完善，个人价值得以充分展示和提升，等等。这比通过经济或军事的手段直接生硬地向别国输出其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更隐蔽，也更容易被接受。因此，好莱坞不仅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同感，成功地实现了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目前，中国在全球文化市场特别是内容方面的份额还比较小，在全球文化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也不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扩大文化出口，一方面需要我们练好内功，做大做强国内的文化产业，逐步提升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让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顺利地“走出去”。

首先，由于自身文化产业还不够发达，我们需要学习其他国家文化产业先进的经营理念、技术和营销手段。其次，我们对海外文化市场的需求了解的还不够，渠道还不畅通，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帮助我们拓展海外市场，特别是在各国都比较重视文化安全的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可能也必须要借助于外部力量。再次，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意产品，其生产和营销更加依赖人力资本的投入，我们要让自己的文化产品走出去，需要吸纳高素质的外部人才，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目的。

利用好外部资源，首先要利用好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文化资源。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文化一脉相承，港澳台地区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但由于历史原因又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本地文化。如香港的文化产业相当发达，在全球文化产品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香港的电影业一度被称为“东方好莱坞”，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有很强的辐射力。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实际上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对外传播者之一。台湾和澳门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共同促进了彼此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一方面，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产品和人才、文化经营理念和方法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内地文化的产业化、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相通、血缘相近、人缘相亲，内地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又首先把港澳台地区作

为走出去的目的地乃至进军国际市场的跳板。同时，借助于内地的广阔市场，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产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合作，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文化是维系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同胞的无形纽带。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全实现，但文化上的融合和统一可以先行一步。通过加强与港澳台地区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及相互开放，不仅可以增强区域内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更可以密切彼此的认知和了解，以文化统一促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大陆文化市场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港澳台地区。为了获得在大陆市场发展的机遇，已经有许多台湾演艺界人士放弃原先支持台独势力的立场，转而积极参加大陆举办的各项公益活动和文化活动，对“反独促统”以及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积极贡献。这说明，港澳台地区可以在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极其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

同样的道理，扩大文化产品出口、有效输出中华文化要善用广大海外华人的力量。海外华人总数高达5000万，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同样是炎黄子孙，是祖国的宝贵财富。正是由于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多数海外华人的身上至今都镌刻着中华文化的烙印。在当地外国人眼中，海外华人实际上就是中国和中国人的代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中华文化的体现。同时，由于海外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实际上也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最佳途径之一。我国很多文化产品，实际上都是先打开海外华人市场，再通过他们扩散到当地市场。

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第一大电影生产国，但因为印度电影自身文化特色过于鲜明，很难打开南亚地区以外的国际市场。近年来，随着海外印度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印度电影通过他们被带进了西方主流社会并逐渐得到认可，印度

电影不仅堂而皇之地在主流院线上映，印度演员参演以及印度题材的影视节目也越来越多，“宝莱坞”终于在好莱坞成功地站稳脚跟。

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华人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大力吸引文化界海外华人回国创业或参与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扶持海外华人在国外文化界的发展，提升其影响力。最后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许多海外华人秉承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优良传统，在国外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成功。在文艺界，也有很多成功的海外华人，在各自领域成为佼佼者，并拥有巨大影响力。他们的成功，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的极好宣传，但如果我们能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市场机遇、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多的荣誉，让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就更突出、影响力更大，并且自觉自愿地传播中华文化，这对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最后，扩大文化产品出口还要利用好发达国家特别是文化大国的力量。主要发达国家均是文化生产和消费大国，特别是美国，更是文化产业最发达、文化市场最广阔、文化国际影响力最强的国家。中国文化产品要走出去，需要在发达国家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但由于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和中西文化自身的差异性，中国文化和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正面竞争是很困难的。这时候，我们需要学会“借鸡生蛋”。比如，好莱坞利用中国的文化题材拍成了《花木兰》《功夫熊猫》，赚了很多钱，但也免费为中华文化做了宣传。同样的题材由中国的电影公司来拍，能不能打开美国乃至全球市场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电影制作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都很欠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学会借别人的“势”。

因此，我们不但不应该眼红外国人利用中华文化素材赚钱，相反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鼓励他们用中华文化的内容，鼓励他们用中华文化的表现形式，鼓励他们到中国来获取创作灵感，鼓励他们用中国

（华人）演员和创作人员。具体的鼓励措施可以包括提供工作上的便利、物质奖励甚至财政补贴，当然也可以鼓励国内企业与外国企业合作合资等。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政策，鼓励外国电影公司到本地拍摄，因为这不仅可以直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当地做免费宣传，带来长久的经济回报以及影响力的提升。

不过，随着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主要的文化产品市场，国外制作的文化产品已经越来越主动地增加中国元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出台类似鼓励政策的时候，也要对相关文艺作品的内容和潜在影响把好关。关键是要弘扬中华文化之精华，摈弃其糟粕。中华文明历时五千年之久，其间有辉煌、也有黑暗；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包罗万象，有精华、也有糟粕；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仍有很多缺点和不足。很多外国人本来就因为不了解中国而对中国有偏见，如果我们的文化产品不但没有起到纠偏的作用，甚至为了赚钱迎合西方的低级趣味或是政治目的，不但不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扩大文化产品出口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出口而出口，而是要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输出。最终目的是要让外国消费者在享受中国产品带来的各种娱乐功能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潜移默化地了解、接受和认同中国、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真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本文于2014年12月26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援助

据商务部统计，建国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建设了2700多个成套工程项目。又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

每当谈到对外援助这个问题，很多国人都不是十分理解。尽管这些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接近一亿的贫困人口，很多基本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于自身的民生建设和发展而要援助给外国呢？

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就是，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我们不得不在生产什么（武器还是食品）？怎样生产（用机器还是手工）？为谁生产（为自己人还是外人）？这样的问题上进行选择，不论是个人、家庭、还是政府，都是如此。

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国防、外交、法治，以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这些公共产品老百姓都需要，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不可能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部满足大家，必须权衡取舍。

外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外援助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就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对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增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毛主席曾经说过，新中国能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很大程度上是非洲兄弟们把我们“抬进去”的。

当前，对发展援助的国际需求仍然很大。按联合国标准，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仍高达14亿，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污染、传染疫病等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如此巨大的国际援助需求，陷入债务危机的发达国家已力不从心。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威胁到了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对华战略明显转向遏制。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采取积极进取的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果中国能适时扩大对外援助，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而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虽说我们国家自身的发展任务依然繁重，但一个国家对外援助能力取决于其综合国力。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发展水平更落后，人均收入更低，却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财力用于对外援助。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50—1978年，我国对外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73%，其中1971—1975年占比高达5.88%。今天，我们国家的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只拿出很少一部分钱，就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2010—2012年三年时间不到900亿的援助额，仅相当于同期我国财政收入的0.4%。不论是和过去的投入相比，还是和潜在的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利益相比，中国的对外援助额并不算多。

当然，做好对外援助是有技巧的，光砸钱不算本事。我们还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扩大对外援助范围。中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中国许多社会和人类发展指标如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科技发展水平等，与中高收入国家相比，都不遑多让，中国在这些方面不但有条件援助比自己收入低的国家，也有能力援助比自己收入高的部分国家。援助领域也要不断扩大，从以经济援助为主逐步向经济、社会、环保、文化等全方位援助过渡。

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对其进口产品减免关税。总体而言，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强，国内市场大，产业门类齐全，除了部分东亚经济体和少数能源和资源出口国以外，中国与全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是顺差。向其开放市场，促进这些国家产品的出口，可以提升其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有助于他们获得发展急需的资金和外汇。而对于中国而言，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资源和原材料，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改善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

三、注重中国软实力的输出。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仅仅包括资金、技术、设备、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援助，也包括人力资源这样的“软”支持。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政府成立了“和平队”（Peace Corps），以志愿者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派遣教师、医生、技术人员，对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输出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在我国援外医疗队取得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建立一套自己的志愿者对外服务和援助系统，这不仅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还可以培养一批能够吃苦耐劳、具有国际视野、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专业技能的年轻人才，打造出一支中国的“发展队”。

（本文于2014年12月9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不必再讳言和平崛起

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结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对APEC和中国而言，都是一个分水岭。APEC不再是一个政治时装秀，而变成一个能够产生丰硕的实质性成果、真正供各国领导人讨论如何设计并实施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蓝图的沟通平台。而中国也第一次主动在一个包括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大国参与的多边机制中担当主角和领导者，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甘当配角和追随者。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已经不必讳言“和平崛起”。

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首次提出中国要“和平崛起”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国的崛起将不同于近代史上的大国崛起，不是依靠军事力量对外扩张、掠夺资源、争夺霸权，而是靠扩大内需、改革创新、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即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

提出“和平崛起”的本意是强调“和平”，以打消西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带来的疑虑。但国内很多人认为，“崛起”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国际格局，把“和平崛起”作为一种对外政策进行宣传，不符合“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因此，“和平发展”很快就取代了“和平崛起”出现在正式文件里。

但是，修辞的变化不会改变中国崛起的事实。从2007年起，中国就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游客出境国。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将有望第

一次超过外资吸收额。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国将在2020年之后的几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有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外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感受尤其强烈。在本次APEC会议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演讲，表示“欢迎一个繁荣、和平和稳定的中国崛起”，他已经多次这样表态，是不是他的真心话，当然是另一回事，但也说明，其他国家都在认真谈论和对待中国崛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现在，只有我们自己不愿公开承认而已。

有人认为，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亿多贫困人口，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大量的问题。但是，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是其综合国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尽管我们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我们经济总量大，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影响也大，自然就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卢森堡的人均收入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估计没有几个国家认为该国能影响全球事务。说到国内问题，西方国家当年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比我们只多不少，比如社会动乱、革命、内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代表一个国家不能崛起，恰恰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成为这些国家成功崛起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

有人担心，公开提“崛起”会提醒和刺激外国人，招致打压。问题是，铃声已经响了，我们捂住耳朵，别人就听不见了吗？我们用和平发展代替了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不一样愈演愈烈吗？美国不是照样提出了“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吗？奥巴马说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不欢迎中国“非和平”崛起。我们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中国崛起的事实，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和平”两个字上。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发展和崛起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发展指的是绝对力量的增长，而且侧重于经济社会方面；崛起则代表国家之间相对力量的此消彼长，强调其政治和战略含义。

重提和平崛起，不是一个简单的修辞变化，反映的是我们的战略意图乃至行动的可能变化方向。承认基本事实，清晰地描述自身意图，才能真正地取得其他国家的信任，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只有这样，中国老百姓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拿出数千亿美元进行对外援助和投资。

习近平主席在此次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发言指出：“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今天的中国，需要大格局和大智慧，真的不必再讳言“和平崛起”。

（本文于2014年11月11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动了谁的奶酪？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亚投行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不过，几个主要的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却没有加入亚投行，原因就在于美国作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近日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克里直接给澳财政部长打电话，要求澳大利亚不要加入亚投行。《纽约时报》也报道称，美国官员“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游说”反对该银行，“极力劝说重要盟友拒绝该项目”。

基础设施薄弱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短板，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往往能带来巨大的长期收益，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证明这一点。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2020年，亚洲需要对各国以及跨国基础设施投入8.3万亿美元，而这些投入将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带来13万亿美元的实际收入。因此，亚投行在这个时候筹备与成立，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美国每次解释为什么要实施“重返亚洲”或“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时候，都说其目的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而是为了支持亚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分享这一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带来的机遇，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反对亚投行这样一个对亚洲经济发展可以做出积极贡献的机构呢？西方媒体的报道或许揭开了谜底。美联社认为，亚投行的成立是为了抗衡西方支持的多边发展援助机构。路透社的报道更具体，直

接说亚投行将成为世界银行的对手。说严重点儿，是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要动美国的奶酪。

众所周知，在“二战”结束前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三大机构，分别负责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金融稳定、支持经济落后国家发展、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之后又推动建立了若干区域性的国际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

六十多年过去了，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巨大变化，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出现的新的全球性挑战，也不能充分反映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事实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发达国家为了换得新兴国家的支持以联手应对危机，也做出一定让步。在世界银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15.85%）和日本（6.84%）的比重。而相类似的IMF的改革方案由于遭到美国国会的否决，迄今没有落实。

如果不肯让渡权力，现有机制能真正解决问题也可以，但这恰恰是当前国际多边机构最受诟病的地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可以说是有史以来金融最为动荡的时期，哪一次IMF到场了？反而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还经常帮倒忙。而曾经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已经十多年没有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导致各国纷纷转向区域贸易安排，其权威性受到严重削弱。

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发展援助机构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挥了多少积极作用呢？据统计，“二战”后50年，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

援助机构给非洲投入了上万亿美元，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贫穷落后的面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甚至出现了绝对的下降。

反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加强对非洲的贸易、投资和援助，带动了该地区的发展，使得非洲经济快速发展，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也保持了增长。而以往当欧美经济“打喷嚏”的时候，非洲可是要“感冒”的。西方国家对于近些年中国对非洲大力投资和援助总是持负面态度。对此，一位欧洲籍的前IMF高管曾表示，既然我们的方法没有取得效果，为什么不让别人来试试呢？

为什么西方及其主导的机构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呢？一方面，这些机构往往并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情况和需求，总是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教条给发展中国家开药方，结果是南辕北辙。另一方面，西方从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出发，往往给援助附带了很多前提条件，要求受援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不接受就得不到援助，而接受的话可能会给受援国的发展带来更多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所需的资金而言，西方国家真的是力不从心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和人口老龄化，多数西方国家都债台高筑，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日本国债余额占GDP比重超过200%，美国一度因为国债问题甚至导致联邦政府停摆，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削减对外援助的开支。美国国会之所以否决IMF改革方案，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拿不出钱来用于IMF的增资扩股。

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和储蓄率高，积累了大量资金。据IMF统计，全球1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8.3万亿美元掌握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手中，其中中国就有近4万亿美元。这么大一笔钱，除了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低风险、低收益的金融资产之外，拿出一部分用于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

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获得比较可观的收益，而且可以促进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为自身的和平发展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利人利己的好事情。更重要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经历，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因此非常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需求，投入的资金和项目往往能对症下药，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且，中国非常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对投资和援助提出那么多的附加条件。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第一次提出建立亚投行的设想之后，能够得到这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在短短一年内成功启动。尽管西方媒体想把亚投行描绘成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但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却指出，这可能是个联合投资的机会，且有利于亚洲新兴国家实现持续增长。而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经错过了机会，当国际多边机构改革时，美国应该给予中国更大的权力，这样至少中国仍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发挥作用，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另起炉灶。

相比之下，中国对亚投行的发展一直持开放的态度，尽管美国阻挠其他国家参与，但中国仍然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随时加入。美国的奶酪，中国是不会动的，因为我们手里有更好的东西。

（本文于2014年10月26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在不在？

今天是“9・11”恐怖袭击13周年，美国到处都在降半旗，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对于美国来说，“9・11”是个分水岭，美国不再是原来的美国，世界也不再是原来的世界。对于中国而言，“9・11”意味着此前不断增强的美国战略压力骤然缩小，使中国的崛起迎来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事实上，在2000年前后，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就已经提出新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头一个10年的情况来看，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一阶段，中国崛起的势头还没有那么突出，而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形势也不错，西方对自己也比较自信，再加上“9・11”事件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注意力被反恐战争所吸引，也顾不上中国。因此，外部环境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非常有利于中国，中国也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应该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在奥运会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使深陷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西方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感觉不能对中国的崛起无动于衷、无所作为了。于是乎，各种关于中国不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崛起损害了西方的利益的论调开始频繁在西方媒体出现。比如，中国抢走了西方工人的饭碗、窃取了西方的技术，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再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是因为中国不肯承担相应的责任，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失败是因为中国不愿实行强制碳减排，中国阻挠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等等。

在2010年之前，中国和多数邻国的关系非常友好。这既是源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所建立的信任感，也是因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使邻国广泛受益。但在美国高调提出“重返亚洲”之后，中国与邻国之间搁置多年的领土纠纷突然浮出水面且不断升级，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急剧恶化。美国政府总是“不偏不倚”地表示在相关领土纠纷中不持特定立场，希望有关各方协商解决，但转过头来就和这些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除了中国之外。美国的学者和官员也私下里对中国人说：“过去的战略机遇期是我们给你们的，今后不会再有了。”许多外国观察家也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结束了”。

不仅外部环境显著恶化，中国自身也遇到很多困难。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陡然下滑，从之前的两位数下跌到7.5%左右，对外贸易、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速大幅放缓，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若隐若现。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环境污染、贪污腐败、暴力恐怖活动等问题不断挑战着民众的心理，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大中央新一届领导履新之后，提出“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显示出强大的自信和勇气。

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2014年3月，随着地处东欧的乌克兰政局动荡，俄罗斯突然出兵并吞并克里米亚，形成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东西方对峙。美国原本以为欧洲是和平和稳定的，因此才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矛头直指中国。现在西方又重新把俄罗斯列为头号对手，美国“重返亚洲”的策略被彻底打乱了。有中国网民高呼：普京送给中国十年战略机遇期，正如“9·11”事件一样。最近，中东和伊拉克的乱局更是把美国搞得焦头烂额。

或许若干年后，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分析中国如何成功崛起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说：中国人的运气太好了！每到关键时刻，

就有人横插一杠子，打乱美国的部署。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美国这次之所以把战略机遇期“送”给中国，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美国在取得冷战胜利之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以为可以不受约束，自由行动，四面出击，结果四面受敌？乌克兰政局之所以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在俄罗斯周围搞颜色革命，并把军事力量通过北约东扩直接部署到俄罗斯家门口，这次终于把俄罗斯惹急了。恐怖主义的起因很复杂，但本·拉登策划“9·11”事件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长期在沙特阿拉伯驻军，被认为是亵渎了在那里的伊斯兰教圣地。

要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霸主国必然要面对一堆的挑战和一堆的挑战者，最后难免顾此失彼。当年的英国何其强大，面对德国等新兴势力的挑战，虽然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却把世界霸主地位拱手让给美国。今天的美国固然想遏制中国，但受制于自身内政外交上的诸多挑战，已经是力不从心。因此，笔者可以很有信心地说，中国再度迎来了战略机遇期。

但这个机遇能不能把握住是另外一个问题。抓住了这个机遇，我们对内实现改革发展，对外实现开放共赢，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阻挡。抓不住这个机遇，对内经济不发展，对外关系一团糟，很可能既不能崛起，也得不到和平。因此，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机遇期，实现和平崛起，更多地将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本文于2014年9月12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一战”百年祭

今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把原属于德国在中国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外，“一战”是遥远而陌生的。但如果环顾当今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现和一百年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是中国已经不再是看客，而是主角之一。因此，我们不由得不心生警惕。

一、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不代表战争不会爆发

“一战”爆发前，欧洲已经享受了近百年的和平。拿破仑被彻底击败之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奠定了欧洲稳定的政治格局。尽管之后，列强之间也出现过数次战争，如英法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但战争的频率和长度、参与国家的数量远远低于之前的两个世纪。总体上，欧洲国家享受了长久的和平，两次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成为时代的标志，人类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就在这种普遍乐观的情绪下，战争出人意料地爆发了，不但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也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轨迹。

今天的世界同样经历了长时期的和平与繁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化把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能力进一步增强，但谁能保证这一切不会戛然而止？一百年前的世界，表面上是和平的，实际上地区热点问题不断，而且背后都有大国在角

力，所以一起看似偶然的刺杀事件就会把列强纷纷卷入，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而且越来越不太平。霸权主义不断上升，恐怖主义依然肆虐，领土争端此起彼伏。谁又能保证今天的某个局部争端不会上升为大国之间的直接较量呢？

二、大国之间缺乏互信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关于“一战”的书籍大约有五千部之多，研究不可谓不透彻，但学者们依然在为“一战”的爆发原因争论不休。笔者倾向于认为，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要大国之间缺乏互信。

德国在经历了国家统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总体实力迅速增长。有鉴于实力差距越来越大，法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和俄国结盟。从表面上看，这一同盟是防御性的。两国希望迫使德国在面临两线作战的威胁下放弃进攻性政策。但对于地处欧洲中部、历史上饱受周边列强欺压的德国来说，法俄同盟实际上大大恶化了德国的安全形势。德国不得不选择和俄国有矛盾的奥地利结盟。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英国加入法俄一方。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一战”的根本原因是英德争霸。到了1913年，德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面超越英国，在对外贸易和海洋运输方面的实力也已接近英国。假以时日，英国霸权旁落是大概率事件。因此，英德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现行的世界霸主和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的关系。不过，两者当时是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的。由于文化和民族的渊源，且英国在争夺海外殖民地上和法国、俄国的矛盾更深，英国一度想和德国结盟。但在德国着手建立强大的海军以维护自身的海外利益之后，英国为了遏制德国，确保自身在海上的绝对优势，毅然加入了法俄阵营。

如果当初法德之间能够达成谅解，保证彼此不攻击对方，则法俄同盟和德奥同盟实属多余。如果英国相信德国发展海军不是针对自己，则英德之间依然可以和平共处。很多学者都认为，“一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列强之间并没有非要打个你死我活的矛盾。也正因为如此，“一战”的爆发才更具有悲剧性。

今天的大国关系再度走到十字路口。由于自身政策的失误和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想独霸全球早已力不从心，而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美国霸权旁落成为一种愈发清晰的可能。尽管美国口头上欢迎中国崛起，而且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双边问题上和中国有广泛的合作，但由于几乎所有中国的敌对势力，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得到美国明里暗里的支持，中国不得不认为美国实际上在遏制中国崛起。因此，中国不断加强军事和外交投入，以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受损。但这样做，又强化了美国认为中国要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观点，进而采取进一步遏制中国的措施。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两国之间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全面对抗就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期”，正如当年的英德关系一样。

三、结盟反而增加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结盟的本意是使己方的实力足够强大，可以威慑敌方不发动进攻，从而减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提升自身的安全系数。但如果同盟成员面临不同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某个成员的轻举妄动反而会把整个同盟拖入不希望发生的战争。

我们都知道，“一战”爆发源于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一个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暗杀了奥匈帝国王储。但从王储被刺到战争爆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英法德三个主要国家并没有试图利用这一事件去发动战争。反而是奥地利和俄国，两个日薄西山的老牌帝国，国内问题成

堆，总想利用外部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结果，奥地利轻率地向塞尔维亚宣战，而俄国作为塞尔维亚的传统盟友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德国和奥地利是同盟国，在要求俄国撤销总动员未果之后向俄国宣战，考虑到法俄是同盟关系，德国索性对法国也宣战，以抢占先机。然后法国、英国参战，就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今天的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拉拢了一帮小兄弟来给中国制造麻烦。美国当然不想和中国打仗，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后果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兵家最高境界。但如果美国被某个心怀叵测的小兄弟给拖下水了，比如日本，正如当年的奥地利把德国、俄国、英法拖下水一样，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反而会上升。同样的道理，在美国步步紧逼下，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不断靠拢，在国际事务中一致行动的次数越来越多，结盟的趋势愈发明显。但两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和目标有很大差异，如果有一天俄罗斯和西方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虽然这种可能性目前看来不大，但可能性确实存在且日益上升。那么，中国应该何去何从？

面对当前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政治家们更需要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来应对，以避免一百年前的悲剧重演。

（本文于2014年7月29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中国应以强者面目参与全球治理

乌克兰事件的一个后果是，俄罗斯被开除出了八国集团，但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应该抓住新的战略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诞生于“二战”之后，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是建立在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之上。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是西方主导、大国协调与多边协调并存。

1998年，为了奖励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选择了“西方式民主”道路，同时增加新兴国家的代表性，七国集团（G7）邀请俄罗斯正式加入为八国集团(G8)。但由于俄罗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又是新兴国家的唯一代表，因此在八国集团中基本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发展迅猛，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这就要求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和内容都做出改变，以充分反映当前新兴经济体崛起这一事实。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G20)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对话平台，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向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协商转变。

尽管在八国集团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毕竟这是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直接对话的一个平台。如今，俄罗斯被踢出八国集团，且与西方的对峙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俄罗斯将更加注重与新兴经济体的协调与沟通，更加依赖新兴经济体占多数的二十国集团这一全球治理平台。这

为包括新兴大国之间加强对话与合作，形成合力来维护自身利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一员，不但经济规模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其影响和作用更加受人关注，已经成为许多重大的全球问题的关键协调主体。

从有利的一面看，综合国力的上升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要想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必须有坚强的实力做后盾。

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增长、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重大的全球经济治理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难以得到妥善有效的解决。只要主观上愿意，中国完全可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准备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或是因为认识误区，或是因为能力欠缺，我们并没有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好准备。

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在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方面进展缓慢，使一度形成的主动权逐步丧失。在多边贸易自由化领域，我们一直都扮演“搭便车”的角色，很少积极作为。在区域贸易安排方面，我们往往会因为担心局部利益甚至是个别企业的利益受损，而无法与重要贸易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严重影响了中国构建良好外部经贸环境的进程。

美国学者克莱因曾经用下列公式表达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国家实力=[（人口+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

按照这个公式，我们即使有再多的人口和土地，有不断提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那我们的国家实力还是等于零，我们在全球中的地位很可能也会排在很多总量比我们小的经济体之后。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心态。

一是要树立强者心态。过去我们总认为，自身实力很弱，对国际事务没影响，因此不愿意有所作为。金融危机爆发后，力量对比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前述心态已经比较少见。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许多初级产品的最大买家，许多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参与根本无法解决。因此，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应该有弱者心态，而应该以强者面目出现。

二是要树立受益者心态。过去我们总认为，国际秩序由发达国家主导，其规则必然对发达国家有利，对中国不利。发达国家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对付中国，一些新出台的规则也要防范和反对。这样的心态容易使中国扮演一个破坏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建设性的角色。西方国家提出的有些问题是针对中国的，甚至是伪命题，中国当然该反对就反对。但实际上，中国是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那么，中国作为受益者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第一是维护现有规则；第二是提供全球公共品；第三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三是树立新兴大国的自信心态，摆脱过去那种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较少发挥主动作用的心态。中国的利益早已延伸到境外，中国不能坐等别的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已成为众矢之的，中国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改变这一局面。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主动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也在上升。

因此，加强能力建设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好对外宣传。软实力如果运用

得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国家的外部环境，提升国际地位。软实力概念创造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近再度提出：未来世界的赢家不仅是看谁的GDP高，还要看谁会“讲故事”。

下一步，我们要大力加强软实力建设，加大对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国际问题领域的研究投入，加强相关问题的理论储备，对重大的国际经济问题如气候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多哈回合谈判等提出中国版的解决方案和中国自身的行动方案。也就是说，要有故事可讲。

（本文于2014年04月02日发表于新浪财经专栏）